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第3期

ISSN 1671-2811



2024年9月 第3期(总第103期) 第26卷
No.3 (Sum 103) Vol.26 Sept.2024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年9月第3期(总第103期) 第26卷

彰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寻路：走向西南联大》中译本序

龙美光

时势造英雄，时势著历史。

日寇的全面侵华，直接触发了中华儿女全民族抗战的爱国激情，铸就了我国抗敌史上不朽的篇章。西南联大，就是这一不朽篇章中辉煌壮丽的一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学府纷遭罹难，南开大学更被夷为废墟。然而，面对强寇的暴行，南开校长张伯苓公开发表演讲：“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张伯苓所言新生命、新规模，当然指在四川、重庆等地兴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同时也当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行将迁校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

1939年1月15日至16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战争中中国高校内迁的情形。其中说：“虽然各大学、专门学校通过联合或者合并等方式实现开学，但都面临着校舍紧张、设备不足或者因多次迁校导致学生容纳力激减等问题。……据说更早已通过迁校的方式开学的西南联大，虽然这个新学期的申请者超过6000人，但是获得入学许可的人数不超过500人。大学的状况已然如此，中等学校以下就更不用说了。”从中多少透着侵略者丑恶的自得神态与幸灾乐祸的嘴脸。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受战争残酷压迫而不得不迁校的大学和中等学校，不仅没有日渐缩减衰落，反而是愈挫愈勇，愈办愈强，最终都成了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西南联大的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系当时正式办成的两所临时联合大学之一。另一所是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名，名副其实，只存在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却是师生们突破一切艰难险阻，汇聚在文化抗战最前沿的三个月；也是师生们看清抗战形势，播撒救亡种子，在求同存异中精诚团结的三个月。它奠定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爱国师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抗战到底、联合到底的办学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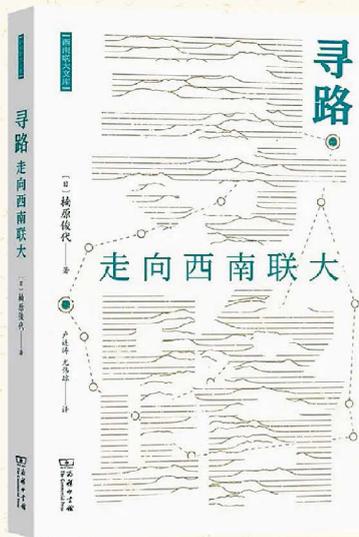
我们可以说，没有全面抗战，就没有长沙临时大学；没有长沙临时大学，就没有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联合得好，实则源于长沙临时大学从开始就联合得好；西南联大办得成功，也是源于长沙临时大学一开始就办得成功。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临时”而为“联合”，从中表达着中国高等教育誓与全民族抗战相始终，克底于成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因之，这三个月的临时大学以及八年间愈办愈好、愈办愈强的西南联大，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就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也是联大在昆明完全立足后，将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时间1937年11月1日定为建校日的原因。

不过，长沙临时大学建立前，三校、广大师生乃至教职员亲属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波折？三校精英荟聚长沙后，是如何完成真正的学术文化大联合？三个月的短暂办学后，长沙临大是怎样决策迁校和怎样迁校？其迁校情形又是怎样的？这些，是关心西南联大播迁情形的每一位朋友势必关心的问题。自然，也是我们揭开长沙临时大学办学的种种谜团，读懂西南联大这所战时大学的办学精神，所应探求的历史真实。

日本同志社大学楠原俊代教授的《寻路：走向西南联大》（日文原名《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知識人研究——もうひとつの長征・国立西南聯合大学への道》），就是这样一部探究长沙临时大学办学历史的著作。她翔实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上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客观实在地书写了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文化抗战史、教育抗战史。

这本著作，用不少笔墨追溯了战时中国高校内迁的背景，尤其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平津迁到湖南的种种



(下转封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

2024年9月第3期(总第103期)第26卷

本刊顾问

于千千 徐彬 苏莉 李玛琳 张宽寿
杨洋 李学林 杨晓红 高峰

编辑委员会

主任:岳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主任:杨春禄 谢灿坤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瑛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芳 魏贵华

主编:何云葵

副主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任:杨松禄

副主任:罗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郭周静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 第26卷

1999年创刊

目次

●纪念邓小平诞辰 120 周年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当代启示 刘雪璟 (5)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王晓青, 陆 森 (13)

●统战理论与实践

数字技术牵引下统战组织变革研究

——以浙江为例 李 腾 (20)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境遇、核心要义及当代启示

——基于《论联合政府》的文本解读 颜苗苗 (29)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探究

——以“三三制”为视角 许奕锋, 曹 璐 (39)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侧重点和优化路径

——基于 L 省和 N 市各民主党派的实证研究 崔晓彤, 王 君 (49)

新时代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路径创新研究 史世奎, 李浩然 (58)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4*2024-0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新时代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探索与实践 张志远 (66)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古滇文明价值探析 薛昊, 陶佳娜, 贾莉莉 (76)
-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的消解研究 陆姝彤 (83)
- 茶旅融合视域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为例 付永丽 (91)

●学习与思考

-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与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罗洪启 (97)
- 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三维耦合性探究 余昊东, 余俊李 (106)
- “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 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观点综述
..... 李亚强, 罗雷 (116)
- 彰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寻路: 走向西南联大》中译本序 龙美光 (封二三)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3 (Sum 103) Vol.26 Jul.2024

Contents

To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Birth

- Important Contribu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of
Social-Ethical Progress Liu Xuejing (5)
-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Wang Xiaoqing, Lu Sen (13)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 Genera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aking Zhejiang as An Example Li Teng (20)
- Historical Context, Core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On the United Government" Yan Miaomiao (29)
- A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Front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War Period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Part Division"
Mechanism Xu Yifeng, Cao Lu (39)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 Focus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within Democratic Par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emocratic Parties in Province L and City N Cui Xiaotong, Wang Jun (49)
- Research on Innovative Paths for CPPCC Members to Connect with the Masses from Various Sectors in the
New Era Shi Shikui, Li Haoran (58)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n Border Areas of the New Era: The "Yunnan Model"
..... Zhang Zhiyuan (66)
- Exploring the Value of Ancient Yunn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Xue Hao, Tao Jiana, Jia Lili (76)
- On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and Removing Pover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Lu Shutong (83)
- A Study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Tourism Integration: A Case of Shuangjiang Autonomous County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Lahu, Wa,
Bulang and Dai in Yunnan Province Fu Yongli (91)

Learning and Thinking

-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on the Publication and Disclosure of the CPC's Local Regulations
..... Luo Hongqi (97)
- Exploration of the Tri-dimensional Coupling between Cultivation-Reading 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 Yu Haodong, Yu Junli (106)
- Summary of the Experts' Forum on "Strengthe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United Front
Studi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Journals" Li Yaqiang, Luo Lei (116)
- Highlighting the Indomitable Spiritual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nding a Path: Journey to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 Long Meiguang (Cover Page 2&3)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当代启示

刘雪璟

摘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谋划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结合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命题，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关系和互动规律。深入领会这一理论的历史性贡献、理论性贡献、实践性贡献，对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05-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①其中，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是需要一以贯之继续抓好的时代课题。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谋划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结合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关系和互动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化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并长期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理论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全新命题，并根据发展着的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升华。

（一）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研究”（23CKS028）。

作者简介：刘雪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时深刻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①,对人才还要有适当的政治要求,“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②。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及学风问题时强调了世界观的改造:“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③,表明应当对当时的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主观认识。随后,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智慧、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④。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⑤,“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对于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政治质量和科学文化素养,……,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都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⑥。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具有较高觉悟的工人阶级能在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中起到重要作用,工会要教育工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管理、技术、文化水平”,“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⑦。这些思想观点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生成奠定了认识前提和思想基础。

(二) 在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中丰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⑧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⑨同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内涵作出科学界定:“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法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⑩这一界定,表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和论述有了理论雏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正确的,把“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战略方针也同样是正确的。

1982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专题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10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题。首先，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党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正式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次，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的深刻内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②。最后，从基本原理、具体内容、方针方法等方面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论证和阐述，标志着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得到深化。

1983年，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进一步拓展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③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同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就思想领域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和“不纯问题”提出“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④，突显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净化思想、矫正偏差的重要作用。

（三）在结合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深化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邓小平深刻洞察和把握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和时代背景，提出重视和抓好全党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着眼处在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⑤，强调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团结稳定的思想条件和环境氛围。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地位、重要任务和基本方针，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引向深入。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其中，“文明”主要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既是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支柱，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系列重要谈话，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写进党的章程，明确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标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总体规划，并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一形式，全面部署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②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思想、目标任务、重大措施。这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地位和重要贡献。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并深刻阐明和拓展完善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在历史、理论、实践三个向度上作出重要贡献。

（一）历史性贡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准确定位和产生深远影响

邓小平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战略目标提了出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对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历史性影响集中表现为确立和坚持了正确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凝聚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共识。

首先，在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①，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②，必须从事关大局、事关根本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如果放弃或背离马克思主义，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把握就容易发生偏离。

其次，在根本任务上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重要方面。邓小平指出：“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③，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道德、纪律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科学文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获得高尚趣味的精神享受。“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④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互为统一体，直接影响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建设“高度文明”的必要途径。

最后，在根本保证上强调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一来端正党风，二来带动社风。邓小平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⑤“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⑥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高度的精神文明建设体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确保党不变质和不变色，最终实现长期执政。

总之，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冲破西方制裁而保持了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进程，是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部署密不可分的。

（二）理论性贡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深刻把握和阐释丰富内涵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精辟论述，创造性探索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精神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页。

④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文明建设系列基本问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性贡献，在本质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上彰显出深刻的规律性认识。

在本质论上，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特征，以及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超越。一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②。另一方面，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③。这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条件和精神体现，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显著优越性。

在认识论上，这一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⑤。这表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确保物质文明沿着正确方向进步发展的思想保证。同时，精神文明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旨在坚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并一以贯之。

在价值论上，这一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凝聚、激励、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⑥为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有了坚定理想、崇高道德、优秀文化和可靠纪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能团结起来，促成革命成功和事业发展。

在方法论上，这一理论提出了继承与发展统一、说服教育与民主法制统一、培养人才与人才担当统一、党风建设引领社风建设等科学思维方法和具体工作方法。一是指向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党的文化等问题。邓小平认为任何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要辩证扬弃，反对封建残余思想、抑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克服党内官僚主义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弘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二是指向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这项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善于运用说服教育争取人心、争取共识，必要时结合法治手段辅助解决。三是指向思想战线上各类人才专家培养以及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人尽其才，共担责任，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指向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不仅要从物质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还要从精神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狠抓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以端正的党风引领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三）实践性贡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提供遵循和取得重要成就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党和国家根据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发展变化，带领全党全社会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

④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力, 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①,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 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整体上看, 通过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 全党全社会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 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等理念和行动开始形成潮流, 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展开, 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具体来看, 1982年到1987年,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 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 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步实施。^② 1987年到1992年, 在纠正“一手比较硬, 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③, 积极发展宣传文化事业, 大力繁荣文化市场, 推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④ 1992年到1997年,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可喜成绩, 宣传舆论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 爱国统一战线和各民族大团结都得到巩固发展。^⑤ 1997年到2012年, 党和国家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根本性的变化,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极大提升,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实践充分证明,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既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开放式理论, 也是能够用以指导精神文明建设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 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传承中华文明, 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对于我们厚植现代化的精神条件和增强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党的作风相统一

实践和理论都能证明, 精神文明建设关乎政党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民族精神独立,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必须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不仅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还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在宣传思想、意识形态、新闻舆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

①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8月23日,第2版。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④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74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好不好，党的作风建设好不好，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的执政地位。任何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不仅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者，还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以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保证党执政的长期性、稳固性。

（二）坚持人民至上与群众首创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①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显著标志，在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由谁评判”等重大问题。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念，才能真正构筑起中国人民的精神之基，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要把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体现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把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和卓越智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获得感、幸福感、价值感，尊重和激活人民群众首创精神，鼓舞人民群众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共同奋斗。

（三）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②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聚焦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充分激活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正向能动性，深化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区域、城乡、群体文化资源配置，创造性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引导全社会学习掌握同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自然科学知识，学习掌握同社会进步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科学知识，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得益彰，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全方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双向奔赴，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发展。

（四）坚持理想信念与思想道德相支撑

理想信念是强大的力量，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精神上团结制胜的重要支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键在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加固，需要有思想认识和道德规范作基础、作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提增思想觉悟、提升精神境界、提纯品性修养、提高审美水准，消除愚昧落后，抵制腐朽庸俗，让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行为操守，为坚定理想

^① 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第11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信念提供丰厚道德滋养和有力道德实践。

(五) 坚持说服教育与法治保障相联动

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离不开教育和法治这两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教育者和知识分子进行知识传播、注重价值引导、加强道德感化的作用。要遵循教育规律,注重方式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以正面教育、说服教育、经常教育为主,充分结合教育对象的特点,立足教育环境的实际,统筹教育载体的整合,说到根子上、说到人心上,在答疑解惑中整合思想观念,在排忧解难中凝聚思想共识,力促达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效果。另一方面,发挥法治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和践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依靠法治力量促进精神文明水平整体提升,推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六) 坚持守正继承与创新发展相映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精神支撑和有利文化条件。守正继承,就是要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自信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贯通起来,形成聚合效应,厚植文化实力。创新发展,要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博采众长、发展自己,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结 语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既需要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也需要精神文明充分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断,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着眼“两个文明”的互融共促、动态平衡、互持发展,进一步提出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过程,渗透融会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各方面,持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互动中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及其正确运用,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丰润道德滋养、良好文化条件。

责任编辑:李亚强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王晓青, 陆 森

摘 要: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 也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科学回答了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等重大理论课题, 并从根本立场、战略重点、制度保障、时间表和路线图等实践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作出了突出的原创性贡献, 为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关键词: 邓小平; 中国式现代化; 原创性贡献;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4)03-0013-0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所开辟的一项伟大事业。它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所不同, 是基于中国国情特点的现代化范式。邓小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开拓者,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宝贵的理论经验。当前,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系统梳理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有助于我们解锁现代化成就背后的成功密码, 对于在新征程上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列宁认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科学的理论指导往往能够引导实践取得预期的结果。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在于阐明了何为中国式现代化, 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必要, 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一)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回答的重要问题, 该理论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小康社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研究”(22BKS088)。

作者简介: 王晓青,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陆森,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列宁:《怎么办?》,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24页。

共同富裕联系起来，并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兼具国家战略层次的需求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①邓小平创造性地将中国式现代化形象地概括为小康社会，并认为这个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邓小平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他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②小康社会总体标准的提出既参照了国际上通用的度量口径，更照顾到中国实情，是落实现代化国家战略的风向标与指示器。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邓小平将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归根结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邓小平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依托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为了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保护合法收入，依法处理非法收入。这些务实举措有效地激发了人民勤劳致富的热情，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必要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邓小平高度重视现代化，他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④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必要最强有力的论断。

近代以来，中国在闭关锁国与被外敌侵略的过程中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必然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多领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邓小平将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等作为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关键，实际上旨在通过发展经济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来提高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立性与可持续性，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⑤邓小平从整体上把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6页。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① 凭借改革可破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开放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功实现现代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② 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能够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引进外资，吸收国外一些有益的要素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此，邓小平指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③ 在国际交往中，邓小平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主张各国应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会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地奋勇前行，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会实现。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强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④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⑤ 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党的领导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从历史使命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提出的，党对这一任务的丰富内涵与实现路径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更为全面的把握。党通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更好地将理论力量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物质力量。从根本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避免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式现代化。从独特优势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优势的来源。中国式现代化较之西方式现代化有两大独特优势：一是先进的理论引领，二是强大的群众组织力。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⑥ 为了使党的领导始终坚强有力，邓小平注重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维度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在思想路线上，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政治路线上，邓小平坚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在组织路线上，邓小平表示要着重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以组织路线来保证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实现。总之，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6—11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70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67—268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8 页。

二、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实践贡献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实践贡献主要在于他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建设经验。

(一) 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与根本立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立场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实践探索中,嵌入其擘画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谋定的现代化战略布局、明确的现代化战略步骤、推进的现代化战略工程。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①站稳人民立场集中体现在其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发力点。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根据邓小平的设想,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翻两番的目标对比世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尚有差距,但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住房问题与就业问题,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对明显的提高。此外,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他指示要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号召文艺工作者们竭力为人民贡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共同富裕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邓小平“两手抓”思想既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有力武器,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动诠释了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二)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涉及多领域、深层次的系统性工程,既要统筹全局,也要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经过审慎的理论思考与艰苦的实践探索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作出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位。他将科学技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引导中国社会踏上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邓小平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②教育与科学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在发展教育方面,邓小平致力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对于中小学教育,他强调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对于高等教育,他主张依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多元化办学,既要办好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要办好师范教育,保障教师来源的同时也能够为现代化建设输送多样化人才。此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提高教师质量,认为提高教师质量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在提高对教师教学要求的同时也要提高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工资待遇。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邓小平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提倡要以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针对部分群众对知识分子的误解,邓小平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端正了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8页。

会认知，也激励了知识分子以学识报效祖国。面对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趋势，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大力支持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高新技术发展，仅“863计划”一项的投入便高达100亿元，占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邓小平勇立时代潮头，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引领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稳固的科技支撑与高质量的人才保障。

（三）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注重建章立制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将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以国家治理科学化为着力点，围绕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多方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设计与完善，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启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注意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坚持以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完善。关于经济领域改革，一是改革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变革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政治领域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①邓小平通过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改革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党的十二大中以党章的形式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确定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长远地保持了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邓小平坚持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加快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四）制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有步骤、分阶段地总结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刻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体现了我们党善于以战略规划引领发展目标实现的优良思维习惯。

“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逐渐清晰与明确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便适时地提出了现代化问题，其设想的“两步走”战略在建设初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文革”的影响，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两步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并渐进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②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地制定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标准。

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

^② 王怀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0页。

行的循序步骤,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明确了发展方向。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着重把握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的目标要求,切实落实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彰显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把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要的当代价值,为新时代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 方法把握:现代化建设要统筹各发展要素

邓小平在继承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四个现代化”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建设实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框架,启示后人要以系统思维看待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重综合发展。

新时代,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实质上是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化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概括,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的重大提升。党的二十大又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目标进一步提炼升华,使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党注重统筹经济、自然、社会等各要素发展,系统协调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 实践路径:按步骤、分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按步骤、分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为现代化事业指明的实践路径。这种阶梯式的跃升方式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也能够有效地满足人民在不同发展时期的需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贯彻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指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①正是在这种“台阶式”发展思路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发展速度,仅在1978年至1988年期间就取得了GDP年均增长10.2%的傲人成绩,为现代化建设的接续递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先后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安排。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细化与分解。在时间段的划分上,“两步走”战略安排将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时间进一步分解为两个15年,每个15年都对对应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遵循了按步骤、分阶段的原则,填补了“三步走”战略在短期规划方面的空白,是适应我国发展实际的必然选择。

(三) 经验借鉴: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充分借鉴这些经验，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邓小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经验借鉴主要有三点。其一，现代化建设必须选择合适的道路。各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但绝对不能照搬照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①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其二，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虽倡导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他更加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当下，现代化建设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进行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流动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无疑会加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但也可能会导致后发国家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面对此种情形，中国唯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谋求战略主动，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好地推进本国现代化事业。其三，现代化建设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被资本逻辑所绑架，不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

总之，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② 他领导党和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毫不松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责任编辑：马弋涵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67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数字技术牵引下统战组织变革研究

——以浙江为例

李 腾

摘 要：面对形势任务的重大变化，统战系统需要进行组织变革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新要求新挑战。本轮统战组织变革以数字技术为牵引，通过构建与数字技术变革相兼容的组织形态，构建与新形势下统战任务相适应的统战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要仔细审视并妥善处理好人本目标与数字手段、多元主体间协同、人工决策和算法决策、变革成本与变革风险这四对关系，谨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和协作主体间的结构性失衡。要着眼于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组织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以“适度性”作为第一原则，控制变革的成本与风险；以“合作共赢”为依归，提升各主体协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提升算法决策正当性为重点，提高人机决策协同性；并在变革中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增强统战干部的变革动机、提升变革能力、创造变革实践机会。

关键词：数字化改革；组织变革；数字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2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百年来一直承担着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使命。当前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与势、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战部门须努力实现技术和组织的双重变革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新要求新挑战。近年来，数字统战工作作为统战工作方向智能化的重要探索，正逐渐应用于各层次的统战实践。尽管研究者们对数字统战工作的内涵并未达成共识，但一致认为数字统战工作不仅拓展统战工作的场域，也延展了统战工作的覆盖半径^①，丰富了统战工作的内涵^②，并在深化民主治理、提升统战效能、凝聚统战成员智慧方面具有特殊价值^③。

然而，当前数字统战工作研究陷入了两重迷思：一是将数字统战工作等同于统战工作的数字化手段，视其为数字技术引入统战系统后的一种手段创新。这种窄化不仅有悖于数字政府建设的初衷，也不利于数字统战工作的长效机制设计。二是将有限的资源投放于优化数字应用，通过建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提质扩面研究”（24BMHZ017YB）。

作者简介：李腾，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网络统战。

① 陈思诗：《网络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创新研究》，《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55—65页。

② 李祎妮：《新媒体时代创新统战工作载体探究》，《领导科学论坛》2021年第7期，第128—132页。

③ 程林顺：《网络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探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59—63页。

立更多数字化软硬件、创设数字化平台及改善数字统战工作路径以期提高统战效能，而忽视了最根本的主体因素——统战系统的组织变革。

大量研究显示，数字技术虽然是政府数字化改革的核心，但并非最关键因素，数字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数字和组织的共同变革及相互嵌套^①。这种组织变革不仅体现在组织边界的重塑、组织功能的优化，同样也体现在组织管理和组织文化的转变上。具体到数字统战工作，其能否带来统战工作效能的跃升绝非仅仰赖于数字应用的革新，更应进行与数字革新相匹配的组织变革。然而和绝大多数部门一样，统战系统目前依然处于“数字技术先行，组织变革滞后”的数字统战1.0阶段，对于在数字化改革牵引下，统战系统变革的目标、方向、机制、路径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本文以浙江为例，探讨上述问题，分析统战系统本轮变革的动因和方向，探讨统战系统的变革管理、变革的实践路径及需注意的问题，并给出一些建议。

一、以数字技术为牵引的统战组织变革方向

组织变革（Organizational Change）是指组织从当前状态转化为所期望的未来状态的蓄意活动。组织变革的意图在于通过组织战略、结构、文化或流程等的革新，增强组织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力。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必然触发组织变革，而这种变革又将进一步保障政府数字化战略的成功实施。从其他公共部门组织变革的经验来看，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将触发组织在组织理念、组织行动、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等多个层次上的持续变革。首先，数字化将公共部门的组织理念由一元管理引向价值共创。本轮数字化改革除了创设各类数字平台，更重要的是将数据视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产。这一改变突破了过往“规则—权力—行动”的管理逻辑，鼓励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使价值共创成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支点^②，将关注点重新回到“人”上。其次，数字化推动公共部门之间产生更多的跨组织合作和协同行为以解决跨边界治理问题。“以人为本”要求公共部门以回应公民诉求为核心重塑组织行动，以更多的联合行动或协同合作消除以往由于专业分工、功能分割和层级节制所带来的碎片化行政，转向更为整体性的公共服务。而数字化帮助组织实现了数据共享并降低了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的门槛，高度的信息对称性和沟通便捷性帮助组织降低了跨界合作的交易成本。再次，数字化促使公共部门转向更为扁平 and 适度开放的组织结构。数字化帮助政府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从机构、信息和服务等方面进行整合以弥合各要素的界限，重构组织横向和纵向的边界。最后，数字化倒逼公共部门转向人机互助的决策方式。数字赋能赋权重塑了党委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方式，在激活个体能动性的同时不断激发多主体互动，海量行动数据的汇集、使用提高了公共部门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效率^③，并为部门决策提供了循证依据，敦促公共部门的领导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人机互动中提高决策的精准性和高效性。显然，这些经验都为统战系统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将统战系统本轮组织变革指向了构建与数字技术变革相“兼容”的组织形态。

针对统战对象规模激增、思想多元交锋、诉求复杂多样等新情况，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也从凝心聚力谋发展拓展到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统战系统将工作理念由以“部门为中心”变革为以“成员为中心”，将工作内容从“做少数代表人士少数方面工作”迭代到促进“全体统战成员全面

^① 雷刚：《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电子政务》2023年第8期，第73—89页。

^② 保海旭、陶荣根、张晓卉：《从数字管理到数字治理：理论、实践与反思》，《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53—65页。

^③ 沈费伟、诸靖文：《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4—115页。

发展”，将工作场域从线下拓展为线上线下并行，将统战资源从“碎片化利用”调集为“集成作战”，这都要求统战系统在组织架构、工作机制、平台建设上有所创新和变革，更好地发挥传统统战工作和数字统战工作的叠加效应，最大范围实现“区域一体、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实现统战工作全域化、平台化、资源化集成和开放性共享，推动统战工作向精准化智配深刻转型。因此，构建与新形势下统战任务相适应的统战系统是本轮统战系统组织变革的最终目标。

二、以数字技术为牵引进行统战系统变革管理

事实上，这并非统战系统的首次组织变革，统战系统始终在根据内外部环境和统战任务的变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比如，在最近一次机构改革中，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并在各层级都进行了相应调整。本轮由数字化所触发的统战系统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构建高效、协同、智慧、专业的统战系统，以提高统战工作效能。然而数字技术推动政府变革的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①。如要令组织变革符合预期，需要对这一变革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具体来说，需遵循以下五个步骤进行变革重塑：（1）识别数字化机会；（2）设定数字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3）确定数字统战工作的参与者；（4）创建数字统战工作变革路线图；（5）执行和监控。

（一）识别数字化机会

本轮统战系统变革的数字化机会主要源自三点：一是来自供给侧的机会。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战略为统战系统本轮变革提供了方向和依据，统战系统推行的数字统战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的资金支持。各部门共同推进数字化为本轮统战系统数字化变革降低了协同成本，也提供了可借鉴方案，大大提高了变革效率。近年来，对数字化改革的持续宣传及统战工作者的年轻化大大提高了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二是来自需求侧的机会。统战对象规模激增、体制外占比增多、网络化行为倾向明显，对统战系统数字化变革提出了需求，也为统战系统的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海量的行为数据。统战对象对有效沟通和及时回应的诉求倒逼统战部门必须采用数字手段来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效能。对多元群体利益的协调，要求统战部门对统战对象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有效归集和深度挖掘，从而实施更为精准有效的统战策略。三是来自数字赋能理论日趋成熟的机会。数字赋能理论快速演进为统战系统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已有的数字赋能理论详细论述了数字化变革的内涵和优势，为统战系统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清晰的图景及可供借鉴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当前研究所总结的实践问题也为统战系统数字化变革敲响了警钟，降低了本轮变革失败的风险。

（二）设定数字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

在数字技术的牵引下，本轮统战系统变革的具体任务可以拆分为以下七个：一是迭代完善数字统战工作组织架构，构建“四横四纵”的系统架构。其中“四横”是指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和业务应用体系；“四纵”是指政策制度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组织保障体系和网络安全体系。二是构建“统战大脑”。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推动统战领域和相关部门数据归集，强化标签化管理等多维能力集成，贯通统一战线业务链、执行链、服务链；构建智能算法模型，深化数据治理，形成决策辅助系统，赋能统战工作，打造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数智赋能平台。三是开发综合应用。以“问题清单”重大应用为牵引，形成统战领域重大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和部门协同责任，形成“问题发现→分析评估→‘问题清单’应用→整改→督评销号”的工作闭环。四是厘清主要跑道。以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

^① 高翔：《决策权集中与行政科层化：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8—19页。

战为依归，聚焦重要战略和特定统战对象，设置同心共富、多党合作、党外人才、民宗智治、两个健康、为侨服务六条主跑道。五是加快推进统战数据仓建设。按照“统一规划、协同共享、安全可靠”原则，加快推进统战外网数据仓和内网数据仓建设，实现安全可控的融合贯通。六是推动理论制度创新。在“点”上聚焦指标任务迭代完善形成定义集；在“线”上以重大应用为突破，形成一批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在“面”上推进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运行机制系统重塑、建设变革型组织等重大课题研究，努力打造标志性成果。七是全面提升塑造变革能力。按照“职能优化、业务梳理、多跨协同、综合集成、整体智治”的路径，推动统战部门组织机构变革、运行机制变革、干部能力变革、团队文化变革，建立以实绩为导向的干部日常考核机制、科学评价机制，全方位重塑组织新形态。

（三）确定数字统战工作参与者

数字政务的经验显示，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不能仅依靠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完成，需要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多主体协同参与，主要包括数字技术的提供者、数据的提供者及数字工具的使用者。具体到数字统战工作建设，以省级层面为例，参与者应至少包括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系统单位（社会主义学院、民宗委、侨联、工商联）、民主党派、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统战团体、统战成员（尤其是代表人士）、数字技术开发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字统战工作需要众多参与者，但是这些参与者在参与程度、参与广度和参与中心度和参与限度上都存在差异。从实践来看，上述参与者在数字统战工作的实际参与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圈层结构（见图1），而这一结构也将进一步影响不同参与主体的变革速度、变革创新度和变革程度。数字统战工作的中心层参与主体为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一主体将负责数字统战工作整体架构的设计及“统战大脑”建设。数字统战工作的第二层参与主体为省委统战部，其在配合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将具体牵头负责优化提升综合应用、推进统战数据仓建设、推进理论制度创新及提升统战系统变革能力。数字统战工作的第三层参与主体为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统战系统各单位、各民主党派省委及各级统战部门，这些部门将与省委统战部协同执行数字统战工作变革的任务，管理和监控数字化变革的过程，提供和贯通各类管理数据。数字统战工作的第四圈层为统战团体、统战对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一圈层主要为统战系统各类应用的参与者，他们将在其中扮演数据提供者、行为反馈者和变革创新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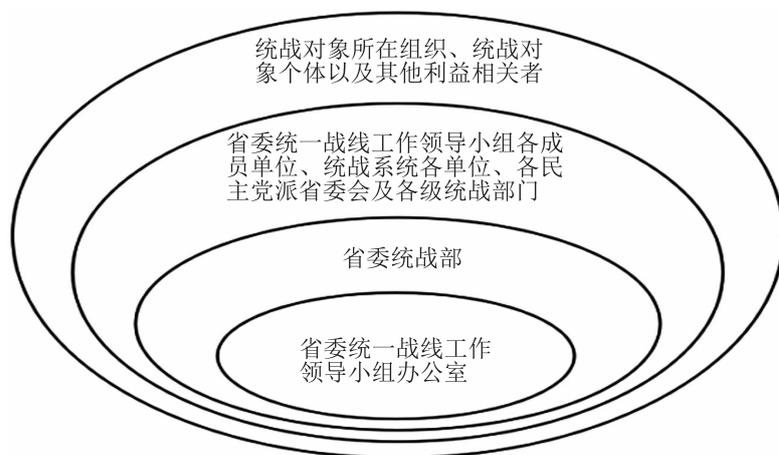


图1 统战系统数字变革参与者的圈层结构

（四）创设一个数字变革的路线图

已有研究显示，数字变革路线一般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评估组织内部的数字化基础；二是分

领域进行单点击破；三是在参与者中实现局部同步；四是在单一主体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后实现全面同步；五是形成变革文化，将这种文化作为组织持续保持适应的长期动力^①（见图2）。

具体到统战系统本轮数字变革，在第一阶段，需进行现有数字资源的全面评估。除了对本轮数字统战工作中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应用支撑体系、可供卷入的数字来源进行评估外，还应对统战系统所有工作人员、统战对象的数字意识、数字能力和数字接受度进行全面的评估，并确定组织变革的速度和程度。在第二阶段，研判各领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通过数字应用开发和数字场景设计加以破解。针对当前各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需通过谋划建设分领域的重大应用，在民主党派成员发展、代表人士管理服务、惠企助企、宗教治理等多个子场景使用迭代。在第三阶段，通过制度引导、标准规范建立、结构调整试点、流程整合，实现系统内变革局部同步。在有限范围内探索敏捷结构、半开放式合作机制、人机协同决策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总结规律，制定可供参考的组织变革实操手册，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建立数据采集和使用规范，在局部范围内做到组织结构、组织流程和管理决策的同步。在第四阶段，通过推进“统战大脑”建设和推进数据归集实现系统内外数据联动，实现统战系统上下内外的数据全面贯通。按照“按需归集、应归尽归”的原则，及时归集公共数据、社会数据，以及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统战系统单位等统战工作全领域数据。做好数据治理、共享交换、数据分析建模等工作，形成统战数据仓基础库、主题库、专题库，并根据数据的共享属性，以接口调用、批量数据使用等方式共享数据，推动数据回流，一体化支撑数字统战工作场景应用，实现各区域、各领域、各主体之间的知识流、数据流、服务流的全面同步。在第五阶段，建设包容失败和彰显人本主义的变革文化。组织变革并非必然成功。有研究指出，70%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失败。组织变革本身会对变革者（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造成压力，而变革失败会致使组织管理者对进一步变革持回避和观望态度。因此统战系统在进行文化塑造的时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营造一种鼓励新思想并鼓励干事创业的氛围，允许失败、包容失败；二是构建一种敏捷性的文化，强调小步迭代和快速适应以提高组织变革的成功率。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过程并非完全按照顺序进行，其中存在部分的交叉和重叠，在每一阶段中，具体的实践也并非一直向前推进，而是会在反馈中不断往复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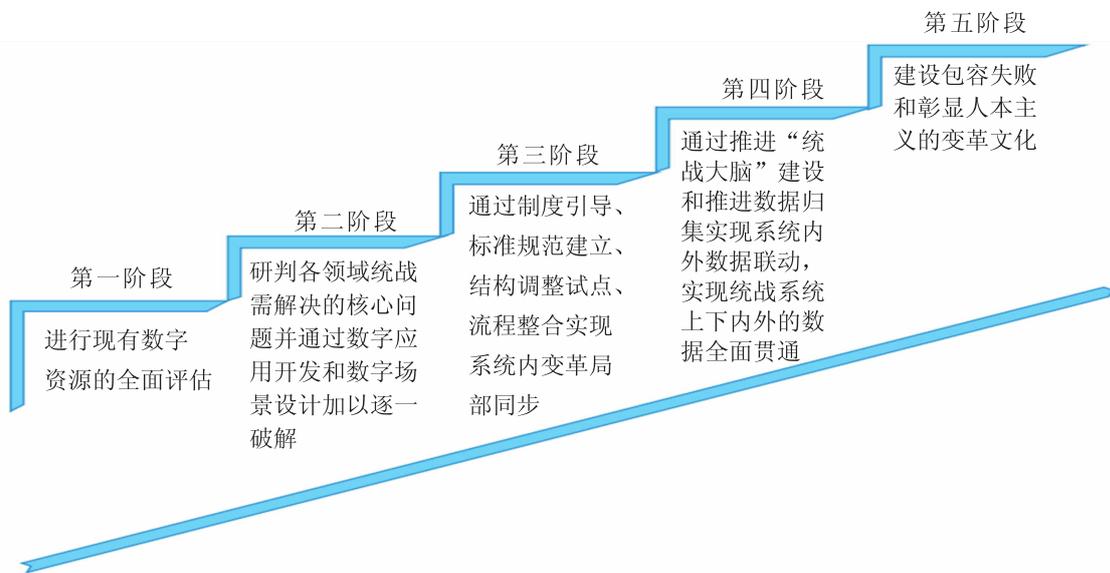


图2 统战系统数字变革路线图

^① [美] 托尼·萨尔德哈：《数字化转型路线图：智能商业实操手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55页。

（五）执行和监控

虽然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组织的协同性、价值性和创新性，但是其实际效果取决于该过程的执行与监控。具体到本次变革，必须谨慎对待以下几点：一是要注意变革的优先序。虽然在本轮数字化改革中，党委政府反复强调要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变革，但是在实践中必须注意任何组织的变革都是从局部同步过渡到全局同步的。尤其是在统战系统这样一个众多主体参与的变革中，不同主体的变革速度和变革创新度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组织，在不同层次上的变革也并非同时发生。因此，将有限的资源调配到复杂的数字化变革中时，一定要注意根据变革任务的紧迫程度、重要程度、特定组织的资源禀赋制定的优先序，小步快跑，逐步迭代，切忌在初始阶段进行大规模的同步变革。二是把握变革的幅度和范围。不同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部门在数字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持原有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不宜进行过于颠覆的创新。与此同时也要注意统战系统的组织变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要兼顾党委系统内其他部门的变革程度和变革速度，破解统战系统内部的痛点难点并非唯一依归，也需要将统战系统的变革置于一个更大视野下进行统筹和平衡。三是重视变革效果的评价并进行及时调整。变革效果的评价不仅来自于党委政府的领导、同行、统战对象，也来自于统战工作者和组织变革的专家。虽然本轮统战系统数字变革将“以统战对象为中心”作为变革理念，但是来自于统战工作者和组织变革专家的声音同样不能忽视。统战工作者对本轮数字化改革的接受程度、适应程度及匹配程度将影响改革的顺利与否，而组织变革专家则会提供前沿的知识及变革问题的应对策略。只有重视各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并进行及时调整才能在多元变革主体中谋得共识，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潜在变革阻力。

三、推进统战数字变革需重点关注和着力处理的四对关系

作为一个任务复杂、机构庞杂、主体多元的部门，统战系统的数字变革速度相对较慢。在统战系统的数字化变革中，既存在目前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中的普遍困境，也遭遇了自身独有的数字悖论。因此，在变革过程中需仔细审视并妥善处理以下四对关系。

（一）妥善处理人本目标与数字手段之间的关系，警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错位

当统战工作理念从“部门中心主义”转向“以统战对象为中心”，工作任务由单向度的政治引领转向更立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时，需要一种更包容和强调伙伴关系的统战模式。虽然已有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将促使统战力量和统战对象走向价值共生，但是必须避免进入将“数字化改革”作为统战系统组织变革最终目标的陷阱。数字统战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即使是在算法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也应审视数字统战工作应用的范围、对象和程序，需建立相应的管理和监控机制，以防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应该指出的是，行为数据不可以作为统战对象行为观察的完全替代，“数据跑”并不能完全取代“人跑”，和统战对象的线下交往依然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另外，需警惕数据刚性对统战对象多元化和统战手段多样性的冲击，必须要认识到大量统战工作没法完全被清单化、指标化和量化，算法无法完全取代现有的工作范式，尤其是在针对特定场域、敏感人群及突发事件的处理中，“面对面”依然是统战工作的方法与艺术之一。

（二）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警惕出现协同主体间的结构性失衡

虽然采用数字技术增加主体间的协同性是进行数字化改革的基本预期，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不同主体由于组织结构、资源禀赋、权力分配上的差异，其在整个数字赋能过程中并非处于均衡地位。具备数据资源、算法资源、权力资源优势的主体将在本轮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引发协同主体间结构性失衡风险，这种失衡至少表现在三个层次。第一层失衡表现在省级统战部门与下级统战部门之间。对“统战大脑”、算法及规则的掌握，使得省级统战部门的权力在数字变革中被不断放大，决策权的向上归集可能会致使原本相对同构的关系呈现出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

这将极大抑制基层统战部门实践创新和配合数字变革的积极性。第二层失衡表现在统战工作部门、统战团体和统战对象之间。虽然数字变革意在提升统战对象的获得感,但是统战工作部门在数字变革的过程中受到的数字赋权远大于统战对象,伴随着海量数据的不均衡流动,掌握数据的统战部门在数字权力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将进一步凸显,而不掌握数据的其他主体的地位将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赋能结构的失衡可能导致“数字利维坦”的出现。第三层失衡可能出现在统战系统和相关部门之间。党委政府内部的数据开放将进一步加剧部门间权力的不平等。这些都要求在接下来的数字化改革中更加仔细地思考数字变革的限度及未预期的后果,并通过数字确权、数字限权和数字分权来化解这些可能的风险。

(三) 处理好人工决策和算法决策的关系,探索人机协同决策模式

虽然人机协同决策已被公认是现阶段数字化变革过程中的最佳决策模式,但是当前统战系统变革显示出较大的人机协同困境,这里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担忧。客观上,一是当前掌握的数据质量不高,数据不完整、数据冲突、数据碎片化问题十分突出,使得“统战大脑”的学习缺乏高质量数据基础;二是当前的算法成熟度不够且存在“算法黑箱”,使得机器学习隐藏着“暗箱操作”的隐蔽空间,令程序正义和决策伦理遭遇挑战。主观上,由于缺乏决策中主体责任归属、决策权限的界定及决策程序兼容方面等的制度性指引,决策者对依赖算法决策后产生的问责具有极大顾虑。与此同时,“统战大脑”的决策介入会导致决策逻辑、决策依据的变化和决策威权的转移,容易引发决策者的认知失调和负面情绪,使决策者对“统战大脑”所做的决策产生进一步的排斥。因此,当前算法决策始终停留在简单、重复性和机械决策的层面,无法在反复使用和验证中得到训练和进化,远未达到科学决策的建设预期。当然不同于政务领域,统战领域里的机器决策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即使在客观条件成熟以后,算法决策也仅仅只能局限于少数特定环节。但是到底是哪些领域、哪些对象、哪些环节需要依赖算法决策、依赖程度到底如何、人机之间应如何协同,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 谨慎考虑变革成本和变革风险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组织提升动态能力和学习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变革需要耗费巨量成本。这些成本不仅体现为经济成本,也体现为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组织需要额外支出一笔费用用于数字设计、系统开发和后续维护,投放专门的人力组建数字专班,这会使得原本就处于“小马拉大车”状态的统战力量更加紧张,对其他统战工作存在挤压风险。另外,数字化对既往管理流程、工作方式和治理逻辑的改革(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会增加统战系统内工作人员的认知成本和心理成本(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可能会带来系统内从业者的消极对待甚至抵抗行为,极大地增加内部管理成本。以上都值得管理者仔细评估和谨慎考虑变革的成本及收益之间的关系。

除却变革成本,变革风险是在本轮变革中另一个需要留意的问题。虽然在现在的设想中,统战系统将基于数据仓建设实现内外数据的共享、开放和流通,并由此带来决策速度和质量的提升。但是有别于政务数据,统战系统中的很多数据相当敏感,不宜公开。这意味着在数据流通的过程中必须以“安全优先”为第一原则,谨慎考虑数据开放的范围、程度和规则。此外,也需重视当前技术外包下可能产生的隐私保护和数据泄露风险。在引入技术支持公司时,除了做事前的背景调查,必须做好全过程监督,在最大范围内进行数据脱敏。

四、以人为核心推进统战组织数字变革的若干建议

统战系统数字变革的主体是人,变革的目标也是人,本次变革事关每一个人,变革成功与否也最终取决于每个人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除了应着眼于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组织制度的适

应性调整，还应以人为核心，进行本次变革实践路径设计。

（一）以“适度性”作为第一原则，控制变革成本与风险

变革势在必行，但是必须审慎思考统战系统变革的程度和速度。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自身战略和功能的相对稳定性是部门责任和义务之一。虽然近年来不断强调政府决策者需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公共部门改革，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企业家精神绝非今天广泛认为的冒险精神，而是“有成本意识的创新”。在推动数字统战工作时，统战系统决策者仍需尽力压缩变革成本和变革风险，以“适度性”作为第一原则进行变革战略设计。具体来说，一是厘清数字统战工作的战略意图，明确数字统战工作与传统统战的适配性和接入点，确定可进行清单化、指标化和量化的业务范围及可数字化、算法化的安全范围，并根据收益边际和安全边际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迭代。二是在统战系统设立首席数据官，依托专业力量对“统战大脑”建设、数字统战工作运营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与测算，统筹质量管理、安全管控、规范执行等工作。三是建立成本预警机制，按月度进行预算编制，在“统战大脑”中增设成本预警功能，构建成本预警指标体系，实时及时预警和调控。四是建立风险监控机制，规避算法错误风险和算法操纵风险，通过立法、监管、审计等手段完成数据使用、因素保护、算法建设等全流程管理，选择可靠的数据支持公司进行开发维护一体化运作，引入监管审计机构对算法模型、算法伦理、数据隐私、信息化控制等方面进行规范性核查，对数据泄露、算法权力滥用等引发的安全风险情况进行及时处置。

（二）以“合作共赢”为依归，提升各主体协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针对协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衡，需一方面增加各主体数字参与的安全感，并在实际操作中为各主体“减负”，使数字变革不会成为日常工作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要增加各主体数字变革后的获得感和效能感。一是新增一个与“统战大脑”相对应的机构，以平台思维破除由于科层组织条块分割而造成的信息孤岛，这一新机构既需要负责与党委政府的其他大脑进行协同对接，也需要在统战系统内建立一套独立于现行科层体制的数据流通网络，并建立相应的数据流通和共享机制，增加系统上下、内外在数据流上的整体性、系统性。二是厘清系统内各主体在数字改革中的权责关系，通过分层统筹机制对各主体的应用维护、运行维护、风险防范、问题处置、权益维护等主体责任进行系统性的规定，通过“交往性资质”对系统内各主体是否实质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展开进一步的资格认定，即权力是否能够提供服务，将各主体权益和义务相对应。三是基于开放共享原则，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将部分数据和算法对各参与主体开放，应定期对相关参与者公布数据使用情况，分享数据挖掘成果，以供各参与者进行实时监督和精准决策。但需注意所有进行反向流动的数据都应进行脱敏，以强化对数据提供者的信息保护，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

（三）以提升算法决策正当性为重点，提高人机决策协同性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规定，科学决策是党委政府决策的基本要求。在数字变革中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的循证逻辑为“社会事实→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形成大、小数据并转化为决策信息→经过法定程序和证据标准检验→转化为个性化证据→再经过循证方法排纳甄选→转化为决策参与者的共识性（法定）证据”^①。因此，必须不断提高算法决策的正当性以确保人机协同进行科学决策的可行性。一是提高数据质量。在统战系统各主体间推行统一的元语义模型、关联模型、数据约束规则和采集标准，采用同一套数字系统进行采集，提高数字的合规性；简化数字采集程序，增加数据输入；对海量异构数据进行清洗和降噪，进行及时的转化和归类，增加数据的可复制性；对数据进行正确的挖掘，构建能够自我进化不断迭代的数据模型，赋

^① 刘光华、赵幸、杨克虎：《循证视角下的大数据法治决策证据转化研究》，《图书与情报》2018年第6期，第32—38页。

予数据智能化属性，使其可进化、可升级，能与其他部门有效融合，降低数据后期维护成本。二是立足机器学习算法生命周期，建立统合预警机制、评估机制和救济机制为一体的规范体系，对算法决策进行全面正当性控制。设置电子监察系统，对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行为进行质量排查及技术改进。定期评估当前算法的性能、透明度、对工作的可解释性、对统战对象权利和其他公共利益的影响、效率及可持续性，有限度地开放代码并接受公众及第三方机构的监督。此外，应提供渠道接受系统使用者的投诉、应用反馈，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得到主张。三是提升决策者的数字领导力。通过数字领导力开发培训、与数字专家合作、学习其他部门数字化改革成功经验等方式提高决策者的数字思维与数字意识。四是加大“人机协同”的法律保障。建立人机协同决策的制度，明确人机合作的合作边界、权责归属及决策程序。此外需给予决策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祛除算法刚性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也需加大对“拍脑袋”决策的问责力度。

（四）强调人在变革中的主体作用，增强统战干部的变革动机，提升变革能力，创造变革实践机会

一是通过提升数字化意识、构建数字文化及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试增加变革主体尤其是统战干部的变革动机。通过加强数字化改革宣传、数字化工具对日常工作的嵌入、将数字化使用情况纳入考核、出台配套的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等增强统战干部的数字化意识。建设敏捷文化、学习型文化、共生文化优化改革氛围。通过心理教育、思想沟通、正确引导等方式，缓解和调适统战干部由于变革所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二是在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同步提高数字变革能力。在个体层次，通过数字化专题培训、数字化能力开发、数字任务认领等不断提升统战干部变革管理知识、数字技能和数据分析能力。在团队层次，引入技术支持团队和变革管理咨询管理团队，组建基于数字任务的敏捷团队进行更为顺畅的数字知识共享与迁移，强化团队的数字学习能力和数字合作能力。三是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这既需要决策者让渡一部分数字参与权，帮助普通统战干部加入数字战略增加数字实践机会，也需要通过“常态+任务”“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混合型组织设计，不断融合数字和传统工作的边界，为更多的统战干部提供数字实践的工作场域。

责任编辑：念兴昌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境遇、 核心要义及当代启示

——基于《论联合政府》的文本解读

颜苗苗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1945年，中国和世界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内容。《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文本。毛泽东在理清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语境的基础上，科学考察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场样态，即联合政府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共同纲领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领导是根本保证、“抗战、团结和进步”是总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揭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策略原则，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党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等，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学习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对于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丰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新时代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29-10

1945年，中国和世界同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在中共六大召开十七年后，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抗战形势实际，科学总结抗战爆发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设经验，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也离不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强有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新中国政治蓝图进行憧憬和规划，提出成立“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的、正式的联合政府的思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即“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4CDJ04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与叙事体系研究”（2024SJSZ0797）。

作者简介：颜苗苗，江苏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聘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1030页。

一、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语境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从国际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从国内视角审视，中华民族面临两条路线、两个命运的抉择，只有不断壮大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才能走向光明。

（一）胜利抑或失败：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就国际军事形势而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指出：“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①国际上，英美法意等国在太平洋和其他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同时，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反攻德国取得重大胜利，德国法西斯即将被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也终将走向灭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这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合作，这也是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胜利的重要环节。

就国际政治形势而言，尽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前夜，但反民主、反解放和压迫其他民族等反进步势力依然存在于反法西斯阵营当中，许多国家中的反进步势力不愿意看见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美好局面。在这一国际形势基础上，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国际形势的曲折面，指出应当“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即使实现国际和平，“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②对此，他也对世界未来局势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世界历史走向进步这一“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③，经过长期努力，一定能够消灭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最终取得人民斗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必须深刻审视影响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影响因素。既要认清日本法西斯是阻碍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最大消极因素，打倒日本法西斯势在必行；又要认清美苏两国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道路走向有重大影响，要实现中国国家统一，对待两国的态度应结合发展实际，坚持又斗争又联合的策略。因此，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既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

（二）光明抑或黑暗：“两个中国之命运”

国内军事形势：好坏两条路线的抉择。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努力下，战胜日本法西斯已成定局。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共七大召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发生实质改变。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予以沉重打击；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国共两党共同走向抗日战场，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的光明前景。尽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但中华民族仍面临严重危机，摆在人民面前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胜利的，即“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一条是失败的，即“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选择哪一条路线，答案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全中国的抗日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量，与同盟国配合作战，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

国内道路走向问题：好坏两个前途的抉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中华民族独立带来曙光。然而，胜利的钟声还未敲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和谐声音却已出现。1939年，蒋介石提出要在中国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溶共、防共、限共”的法西斯专制主义。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对此，毛泽东指出：“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①在这种特殊国情下，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是选择民主的、光明的前途，还是选择专制的、黑暗的未来，这一困难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针对抗战胜利后道路的选择问题，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国内外形势及两条路线的基础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确把握影响国家统一的主要矛盾，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阐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②

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在场样态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为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

（一）联合政府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就是提出用民主联合政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这是《论联合政府》报告的主旨思想，也是党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提出的建国方案。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道，“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③“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④。党的七大召开之际，中国正处在抗战紧要关头，亟须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广泛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作战；抗战取得胜利后，仍需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因此，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抗日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成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⑤。周恩来也强调：“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⑥

（二）共同纲领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由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无固定组织形式，也无为统一战线内部成员所认可的政治纲领。因此，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为满足统一战线阵营中各阶级、党派等的利益和要求，不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必须有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10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5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0页。

低限度的具体纲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①将统一战线内部成员不同的利益和要求统一到共同的纲领路线上来。这就要求纲领路线必须科学反映客观实际，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而当时最大的实际，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对此，中国人民需团结起来，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和团结抗日力量。因此，共同纲领中必须包含两点内容：一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二是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既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任何其他党派、集团或个人企图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都是自取灭亡。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积极引导全体人民为坚决贯彻执行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及为大家所认可的纲领路线而奋斗。

（三）党的政治领导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

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提出并积极推动形成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一切以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都是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牢牢把握政治领导权，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②，“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③。同样，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不复存在，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将遥遥无期。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抗战方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内部出现防范和敌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态度动摇和妥协时，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国民党企图破坏统一战线内部团结时，党强调只有抗战、团结、进步的统一战线才是真正的统一战线，也是抗战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正确的联合策略，是稳定和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只要“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④；在处理各党派关系上，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当抗战统一战线阵营内部出现问题时，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联合其他进步力量对投降、分裂和倒退等退步力量进行监督、批评和斗争，有效维持合作抗日局面。可以说，党正确灵活的联合策略有效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统一战线，“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⑤。

（四）抗战、团结和进步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⑥。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需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即要求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投降”；“为着防止内战”，即要求全体中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于团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1页。

而非统一于分裂”；“为着建设新中国”则要求在抗战、团结的基础上“统一于进步而非统一于倒退”，而要达到抗战、团结和进步的局面，其基本前提就是“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即不断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结果和发展方向就是达到抗战、团结和进步的良好局面。因此，抗战、团结和进步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其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坚持抗战是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取得民族独立。面对国民党企图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党喊出“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①的总口号，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不断扩大抗日力量，为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奋斗。其二，“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团结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法宝，也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在特定的时局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②，而团结的最直接形式就是始终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取得民族独立而奋斗。其三，“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进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中国抗战局势的未来方向。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就是“进步”，也就是取得民族独立，建设新中国。党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思考和把握中国未来发展局势，认识到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只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消灭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因此，必须始终以抗战、团结和进步为总方针，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策略原则

抗战时期，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定无畏的革命气魄和机智敏锐的洞察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党性和人民性相结合，有效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策略原则。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③ 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空洞无用的理论；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同样，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实践的检验，就会停滞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④ 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尤其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策略原则体现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一,体现在领导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从同一切违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①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倡导者和实际领导者,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内作风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促进党内团结,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起着表率作用。其二,体现在联盟对象的关系处理上。为最大限度联合一切可以联合力量,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力量保证。其三,关注民生问题,尤其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的民生问题^②。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依旧初心不改,实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③的良好局面。毛泽东还提出,为解决好民生问题,抗战胜利后要“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④。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人心力量,为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所谓原则的坚定性,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保证政党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有原则的让步。所谓策略的灵活性,即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制定和转变策略,以取得最优化斗争结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即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科学把握时局动态,并灵活作出策略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革命策略和斗争艺术,准确分析国内外革命形势,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并运用在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上,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定无畏的革命气魄和机智敏锐的洞察力,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其一,抗日的坚定性与盟友选择的灵活性。党在盟友的选择上,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中,坚持抗日是底线,如果反动分子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么“中国人民在向他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同时,要准确识别、区别对待那些不怀好意的怀疑者、敌视者和善意的怀疑者,给予不同的解决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⑤“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⑥其二,阶级斗争服务于民族斗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当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受到威胁时,阶级斗争要适时从属于民族斗争,国共两党要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只是党根据国情适时调整斗争策略。其三,施行具体纲领的坚定性与认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9页。

一般纲领的灵活性。一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主张和目标，而具体纲领则是党制定的为各抗日民主党派相互同意的最低限度要求。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提出最低限度的民主的具体纲领，有原则的让步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及个人，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

所谓党性，就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中对党性的直观概念作出界定，即“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①。所谓人民性，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基于人民利益的角度而言的。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是政党在开展工作中要把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同时坚定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一方面，党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出来，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与解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党依靠人民一路攻坚克难，书写佳绩，靠的就是人民对党的信任与支持，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党将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结合。其一，在党的工作作风上，全党坚持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坚持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联系，“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③其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相信群众才能赢得群众。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也为抗日积聚了雄厚的战斗力量。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④

四、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立足我国国情，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抗战胜利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战思想。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仍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学习毛泽东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

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建设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没有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这表明，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没有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新时代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新时代加强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需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完善党的建设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其一，增强党性锻炼，巩固党内团结。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线，团结也是确保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坚定喊出“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口号。加强和巩固党内团结，需要增强党性锻炼。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出，党要进一步成为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全体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就要增强党性锻炼，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② 这既是有效解决党内现实问题的举措，也是建党20年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内团结仍然是我们党的重要课题，是提高我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只有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内团结，才能进一步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其二，切实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发挥好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③ 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以及处理各方面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当前，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要求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④，就能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其三，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党的领导，还要抓好思想教育。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⑤ 新形势下要切实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教育经常性、常态化，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并使之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更加有利于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激发活力的作用。其四，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毛泽东指出，要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⑥ 统一战线是由不同政党、派别、团体组成的政治统一联盟，要实现其巩固和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必须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开展统一战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统一战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抗战胜利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⑦ 坚持群众路线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抗日民族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战线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群众路线，最广泛地凝民心、聚民力、集民智，推动统战事业蓬勃发展。

其一，关注民生保障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民生保障问题。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把改善民生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发挥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民主协商的政治优势、协调关系的功能优势和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等，为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广泛的智力支持、力量支撑和环境保障。其二，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统战工作当中，这要求广大统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远离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错误倾向，改进作风、提高本领，密切干群关系，真正做到为民服务，最终达到惠民、便民、利民。其三，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理念，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①。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才能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三）加强统战话语与叙事体系建构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②因此，话语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承载着某种思维和思想的现实表述，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是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对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形势变化和中国国内抗战局势、社会各阶级状况等综合分析，灵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妥善表达抗日救国话语，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统战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使党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进一步重视话语体系构建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价值，不断优化统战话语与叙事体系建构。

新时代优化统战话语体系，须坚持将统战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等相结合。一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发展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体现在统一战线各领域各方面，强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推动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二是在承认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平等对话。统一战线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党、派别和团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要及时了解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动态，在坚持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前提下，搭建党外人士对话平台。三是采用灵活的话语表达方式。毛泽东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针对各阶级、党派、团体等的特质采用相应的言语，如针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口号要通俗化、口语化。构建新时代统战话语体系，同样要采用灵活的话语表达方式，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引领群众，让党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统一战线的时代拓宽和延伸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建党初期的反对英法等国际联盟，到抗战时期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统一战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10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精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传承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主义精神”，最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国际战略思想。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和平发展为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一方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最广泛壮大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对待国际力量，毛泽东强调：“国际和平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①。进入新时代，世界迈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云跌宕，如何调整国际外交政策、引导世界格局正向发展，实现同各友好国家携手共进，共御百年变局之下世界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对此，应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争取联合可能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一边的“中间势力”国家，特别是同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致力于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力量，尽力遏制各种反人类、反和平势力的扩大，推动构建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②。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和价值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发展总体趋势和中国外交战略洞察和展望而提出的新理念，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需求，也是新时代统战思维在国际外交领域的融通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积极推动构建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10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 关系探究

——以“三三制”为视角

许奕锋，曹璐

摘要：“三三制”是准确把握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早期制度之源。“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建立并运用统一战线的实践载体，初步实现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三三制”的实施过程主要表现为积极回应并有效处理政权内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和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问题，其原则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统一。抗战时期，党的统战目标构成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动力，其逻辑基础主要在于以民主政治建设来分享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党的统战工作也伴随统战原则的贯彻深入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党的科学和民主执政。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团结人民和突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此外，做好党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落实于政权建设之中。

关键词：“三三制”；统一战线；民主政治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39-10

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研究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问题的重要基础。“三三制”作为正确认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制度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认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问题的早期探索。基于客观的历史发展，深入研究“三三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厘清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深化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并对当前准确把握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三三制”初步实现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建立并运用统一战线的实践载体。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只有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全体抗日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

作者简介：许奕锋，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党制度、统战理论；曹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政党制度。

政权,才能形成坚实、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对全体抗日民众的团结和动员。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始朝着抗日民主模范区的目标前进。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开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猛烈进攻。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转变了自身的统一战线策略,强调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①。也正是这一统一战线策略的改变,推动了“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出现。

(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华北事变以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就必须形成“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囊括全体革命民众的民主联合政府^②。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筹备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并在推动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上做出重要贡献。

在国共合作形势基本明朗后,中国共产党转而争取推进国内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共中央强调,当前的工作中心是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实现。毛泽东认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巩固和平,要巩固和平就必须争取民主。他明确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③。张闻天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全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可能的。他指出,“现在全国民众普遍要求实现民主……我们应该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这是在客观上有可能做到的”^④。此外,中共中央一致认为,要达成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就需要党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一方面,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充分调动全体爱国人士的民主热情,“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逼迫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全体爱国人士的压力下,放弃一党独裁,推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⑤,另一方面,党还需要在根据地实现“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从而“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⑥。

为达到在根据地打造抗战民主模范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推进各根据地的改制工作。这次改制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再逐渐扩展至党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地。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确定在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共和国制度”,保证一切抗日阶级和团体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其后,边区政府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开始筹备边区各级议会的选举工作,预计在年内完成边区的民主选举任务。同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推行根据地的普选工作。此后,直到1939年1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1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④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⑥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第147页。

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标志着肇始于1937年4月的各种改制的完成”^①。这次改制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普遍施行了普选制度，充分保障了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等有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抗日民众的民主权利，建立了拥有完整立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半独立司法权的“两权半”政府，取得了局部执政的合法地位及不同阶层的赞同和支持。

（二）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推动了“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出现

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在改制工作上的顺利推进，国民党政府的民主制度改革不仅没有太大进展，反而有所倒退。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部分回应了全国人民的民主诉求，组织了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国民参政会。可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进一步推动民主制度改革的兴趣不大，在这一问题上抱有消极和抵触情绪。在国民党的抵制之下，国民党政府的民主制度改革始终没有得到太大发展。此外，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投降”和“反共”倾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开始主张对日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提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言论，并开始“处处算计，不断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甚至狠下毒手，企图消灭共产党”^②。这一现象极大阻碍了国民党政府的改革步伐，并一度使全国的民主事业发展陷入停滞。

面对国民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调整了统一战线策略，认为当前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对中间势力的团结和动员。此时，毛泽东正在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他指出，虽然中国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已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③。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④。结合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特点与争取中间势力目标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并认为以“三三制”原则为基础的根据地民主政权，既有利于在革命年代达到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治目标，也有利于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进而适应当前有效应对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尝试探索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形式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强调，“三三制”原则主要指的是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确保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结构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概言之，“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理念，也是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一项统一战线政策。

二、“三三制”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三三制”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将“三三制”原则贯彻落实于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改变了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精神和理念充分融入根据地民主政权之中，体现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这一过程

^① 黄正林：《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第17页。

^② 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二）》，《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第19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8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3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2页。

主要表现为对两个方面问题的积极回应与有效解决。

(一) “三三制”政权机关内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自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广泛推行普选后，政权机关的人员便由各地民众的民主选举产生。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各地的民主选举实际反映的是不同阶级围绕政治权力展开斗争的情况。对根据地内的各革命阶级来说，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代表的数量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本阶级在政权内的地位和利益。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政权的领导核心，因而根据地内选举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内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在对选举不加干涉的情况下，各地往往出现中共党员在政权机关内人数过多或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在“三三制”政权机关内，如果中共党员人数过多，就无法为党外人士提供施展才干的足够空间；如果中共党员人数过少，则无法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内的领导地位。如何合理把握二者尺度，在政权机关内落实“三三制”人数要求，是实施“三三制”原则的首要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在已分配土地的革命老区，由于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程度较高，因而这些地区政权机关内的中共党员人数普遍超过三分之一。陕甘宁陇东地区的一份报告显示，1940年末陇东分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在总人数上各占一半，并且共产党员人数要略多一些^①。而在1941年北岳区十三个县的统计中，党员在县议会的人数普遍超过三分之一，最多的县党员人数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②。另一方面，在未分配土地的革命新区的乡及以下政权机关中，由于部分地主豪绅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因而时常会出现地主豪绅把持政权的情况。如在1941年安塞、绥德、吴堡等八个县的参议会中，各乡的共产党员平均占比为19.8%，最高占比也只为29.1%。这些地区的乡政府委员会甚至出现“在银城市与附城区的十五个乡长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镇原三区清水乡全部政府委员和乡长都是地主富农”的情况^③。

针对“三三制”政权机关内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从两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首先，针对革命老区中共党员人数普遍超过三分之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党员主动辞职、为党外人士提供选举担保和依法聘请党外人士加入政府的方式加以解决。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提道：“中间分子和国民党员之进入县级三三制，大都经过三种形式”，或是“人民自动选举”，或是“党组织指明保证选出”，或是“为上级所聘请”^④。例如，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由于共产党员的候选人较多，谢觉哉等12名党员自动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同时，由于选举后的政府委员中比预定人数多出一人，共产党员徐特立即宣布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⑤。其次，针对革命新区乡及以下政权地主豪绅把持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提高中共党员在政权机关内的人数、使党员干部在政权内占据更重要的职务与积极挖掘、团结有较高政治素养和较强工作能力的党外干部加以解决。林伯渠认

^① 《陇东分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的一些经验教训》，《共产党人》（1939—1941），1941年第19期（影印）。

^② 彭真：《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

^③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00—102页。

^④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04页。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为，要适当提高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在乡及以下政权的人数，使二者在乡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以上，并确保中共党员在乡长等重要职务中占大多数，使党能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提高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的识别能力，在选举前做好对不同性质党外人士的识别工作，明确区分左派、中间派和反动派，熟悉已经在政权内工作的党外人士，以便在后续的选举活动中决定其适当的去取^①。

通过上述两方面工作，“三三制”政权机关内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在革命老区，“经过土地革命的其他各县，去年乡选结果，虽仍是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但今年乡选时，据安塞、甘泉等县材料，共产党员所占比例，已接近到三分之一”^②；在革命新区的乡及以下政权，“经区村民选举，各级干部健全，逐渐由革命的新兴力量代替了地主豪绅的优势”^③。

（二）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合作共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基本解决“三三制”的人员构成结构问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问题。在“三三制”政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尽管已有许多党外人士在政权内工作，但仍有不少党员干部对“三三制”精神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一偏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的同志不重视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仍将政府工作作为党的内部事务，这使得党外人士难以在政权内发挥应有的作用，违背了“三三制”团结和动员中间派人士的精神；有的同志又过分迁就党外人士，在群众工作上有所松懈，这不仅导致群众利益受到损害，也无益于稳固党在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有的党员同志不重视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仍然在工作上大包大揽。有的同志认为“三三制不过摆摆样子，对外好影响……拉几个上层人物凑凑数吧”^④，还有的认为“（三三制）只是宣传一下就了事，主要的是为缓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麻痹地主；即使执行也不能全部执行，因为边区发展不平衡，故需灵活运用（打折扣）”^⑤。其结果是部分地区政权对于引进的党外人士不给予实权，不虚心考虑他们的意见，“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仗势欺人，爱包办，喜垄断，宁左不右，好大喜功，只走直线不走曲线的残余，还是十分浓厚的存在着”^⑥。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过分迁就党外人士，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斗争和批评。如在1943年的北岳区，有些地方政权和司法机关在处理地主所造成的多起土地问题时，“竟强调‘双方自愿’与‘契约’期满，片面的执行政府法令，不保障农民的既得利益”^⑦。又如在平北抗日根据地初创时，由于党在拉拢上层的方法上只有争取，没有教育，也没有发动群众给予必要的斗争，故而导致在形势严峻时，“某些上层分子，敢于轻易叛离，无所顾忌”^⑧。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02、105—107页。

② 李维汉：《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

③ 刘澜涛：《全面彻底的实现双十纲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页。

④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05页。

⑤ 刘澜涛：《全面彻底的实现双十纲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6页。

⑥ 刘澜涛：《全面彻底的实现双十纲领》，第38页。

⑦ 刘澜涛：《打退地主的反攻，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土地政策》，第372页。

⑧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三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29页。

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问题，共产党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坚持以民主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培养民主的工作作风。邓小平强调，“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①。此外，林伯渠还指出，在大会的协商讨论中应尽可能“不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一切重要问题，全靠或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或座谈方式决定”^②。其次，给予非党人士适当职务并尊重其职权，提升党外人士在政权机关中的主人翁精神。林伯渠强调，要“给党外人员以适当的职务”，“参议院和政府委员中，能够工作的，要尽量吸引他们参加适当的工作……在实际中培养一批非党干部”；要信任对方，对于在对方职权范围内的事应放手让他做，在这一过程中，又给予对方必要帮助，“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责任心”；要在各地广泛推广由乡政府委员、行政村主任、自然村村长，以及共产党支部的干事都参加的“一揽子会”，通过大家共同商议、共同行动的方式来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③最后，在合作中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党外人士，针对不同性质党外人士的特点，相应采取不同的合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林伯渠强调，做进步分子工作，不仅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还要“以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之”。做中间分子工作，要注意区分他们的政治立场，有针对性地开展。做反动分子工作，也要注意区分反动分子的政治态度，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④

通过上述三方面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在陕甘宁边区，林伯渠表示“一部分党外人士（进步分子和更开明的中间分子）更加靠近我们，认识我们和相信我们；一部分坏分子则被清查出来，清洗出去，三三制比以前更加巩固了”^⑤。在晋察冀边区，宋劭文指出：“从乡村到边区政府各级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及其民主制度已臻于健全，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已稳固。”^⑥

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历程来看，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结合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力量，充分考虑了团结中间力量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政权内的阶级关系，根据无产阶级领导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精神和理念，能动地调整了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权力运行方式，使得根据地政权的权力结构有效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要求，在保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充分保障了党外人士的民主权利，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政治局面。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非均衡性，即民主选举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保证统一战线的人员组成，同时统一战线的人员组成也不能完全保证权力运行过程必然符合民主精神。为了解决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非均衡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和敢于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开展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探索，发展出了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早期实践，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政权内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②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第119页。

③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第110、117页。

④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第120—121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第116页。

⑥ 宋劭文：《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三、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的提出与实施过程体现了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成为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引，同时，如何在确保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党外人士的民主权利则成为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重要内涵。基于“三三制”的提出与实施，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相融合，推动形成了兼具统一战线元素与民主政治特点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具体运作过程来看，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民主政治建设是团结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孤立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手段

在战略层面上，民主政治建设是团结和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形成坚实、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体抗日民众和抗日团体意志和力量的聚合，是全国政治势力走向统一的结果。建构坚实、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广泛凝聚人民意志，建立全国人民普遍认可的、单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政府。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借以维持既有的政体和统一，以免国家分裂和社会散乱……的体制一定是现代的民主共和体制”^①。民主共和体制要完成对社会力量的整合，广泛吸纳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政权建设，必须借助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基本完成巩固国内和平的阶段性任务后，马上开展争取全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活动。毛泽东强调，“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②。从实践情况来看，尽管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并没有实现，但在革命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成功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团结广大中间势力的目的。这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建设在团结和动员广大中国人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策略层面上，民主政治建设是孤立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手段。在国民党出现反动倾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也受到极大威胁。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革命力量进一步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以有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进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抗日问题上的两面性，认为可以通过孤立国民党亲英美派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立场。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将“三三制”作为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政策。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认真了解和执行根据地内的“三三制”原则是与顽固派围绕政权问题展开的斗争，这将“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另一方面，通过贯彻落实“三三制”原则，党得以利用在政权内给予党外进步分子职务和职权的方式进一步动员小资产阶级，借助为中间派人士留有位置的形式团结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争取这些阶层又“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③

^①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第2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3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1—742页。

(二) 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运用统一战线,保障无产阶级同盟军切实掌握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是决定阶级行动的经济基础,而“政治权力是实现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手段”^①。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要充分保障根据地内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经济利益,必然要切实赋予其用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权力。从根据地政权的阶级结构来看,切实赋予他们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阶层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代表开明绅士与中等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合理地分享政治权力。在独裁统治下,与他人分享政治权力会改变权力的最终归属。独裁者可能因此丧失在政权中的独裁地位,从而导致政权性质发生改变,这正是国民党一直拒绝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缘由。而在民主政治下,权力的分享更多的是一种量的变化,并不会在根本上动摇执政党在政权内的优势地位,改变政权的民主性质。在“三三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着民主政治这一平台,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在充分保障无产阶级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左派和中间派分享政治权力,以达到既保证无产阶级在政权内的领导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其他阶级经济利益的目的。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区别于国民党政府,在根据地内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民主权利,真正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三) 统一战线工作是改进和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理念。要使民主的价值理念真正落于具体实际,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现实载体。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三三制”民主政权便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念的现实载体。“三三制”的实施过程是体现“三三制”内涵的民主精神贯彻落实于具体政权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统战工作不仅要确保政权运作的民主性,也要注意彰显统战工作的民主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党外人士通过民主政治广泛参与政权建设,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内原有的地位,推动共产党进一步优化自身的领导方式,改进了工作作风。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必须更多地通过提出正确主张和做好模范工作的方式,才能得到党外人士的支持与认同,以及团结有较高政治素养和较强工作能力的党外人士。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工作上更多展现民主精神,依赖民主的工作方式行使职权。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充分稳固的前提下,党外人士若想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中共的重视和帮助。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仅要给予并尊重党外人士的职位和职权,还要注意与党外人士的日常交往,加强与党外人士的精神交流,合理兼顾党外人士的利益,热情帮助党外人士解决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只有这样,党外人士才有可能广泛参与民主讨论,切实参与政权建设,使根据地政权真正体现和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凝聚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和交往中彰显民主精神,与党外人士在工作之外结成深厚的友谊。

四、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当代启示

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研究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问题的重

^①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要基础。“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在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同时，也为研究新时代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团结动员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需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①。“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表明，一方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促进政治整合、凝聚人民意志，广泛吸纳民众参与政权建设，团结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形成坚实、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三三制”这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通过实现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人员名额的合理分配，有效团结了广大党外人士，并籍此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壮大。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面对日益多元的思想观念和日益复杂的社会阶层环境，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重要功能，达到团结动员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的，就必然要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而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是要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强化民主制度的制度吸纳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够广泛容纳不同的声音，吸纳更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其次，要持续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主人翁精神，重视发挥一般民众在基层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他们对党和政府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在政权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要针对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有针对性的容纳或激发不同群体的民主热情，积极发展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人士参与政权建设；团结部分对社会主义略有成见，但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人士；鼓励政治态度模糊，利益关系复杂的人士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坚定政治立场，实现自身的发展进步。

（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回击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打破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围堵

在前段时间所谓的“民主峰会”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民主话语霸权，将中国定义为他们所称的“非民主国家”，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围堵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②“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表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团结政权内外广大真正热爱民主的民主人士，巩固根据地的团结和孤立打击反动派。这启示我们，在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民主失灵”的当下，我们更要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和政权建设中自主发展起来的民主，是最符合中国政治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的民主。新时代，要打破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围堵，关键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页。

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而有效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有民主权利。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利用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团结广大受西方民主话语压制的国家,联合国际社会广大真正热爱民主的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孤立打击西方霸权主义思想,打破西方在国际社会的民主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是要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广泛团结国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人士,孤立打击国内受西方民主蛊惑的少数个人和团体,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 新时代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有利于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①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表现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相应的制度安排,进而以一定方式将其转变为可操作的实践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需要注意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找到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② “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表明,统一战线工作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起着落实民主理念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确保政权运作的民主性,促使中共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多地体现民主精神。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使统战工作成为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的现实载体,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这充分体现了统战工作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首先,要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反映到统战工作中来,切实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拓宽党外人士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有效渠道,使党外人士更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其次,要在统战工作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形成一种民主作风,强化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互信,保障党外人士切实享有民主权利。最后,要完善党外人士参与政权建设的相关制度体系,畅通党外人士利益表达渠道,激发其的创造活力,使其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7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59页。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侧重点和优化路径

——基于L省和N市各民主党派的实证研究

崔晓彤, 王君

摘要: 民主党派加强内部监督是探索与国家监察有效衔接,厘清衔接环节和衔接要点的需要。通过以L省以及N市各民主党派为对象,开展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仍存在被监督主体对内部监督认识不到位、内部监督对象不明晰、内部监督机构运行存在空转情形、内部监督组织体系不健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系统性不足等较突出问题。推动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有效运作,要提升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效能,强化党派成员监督意愿,提升监督实效性和针对性,构建内部监督机构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完善内部监督组织体系,探索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系统衔接,促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持续规范化,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民主党派; 内部监督; 侧重点; 优化路径;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4)03-0049-09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履职实效、工作质效,也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的通过实施,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加强内部监督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件的颁布出台,不仅为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提供法律依据和必要遵循,也释放出将内部监督机制从执政党向参政党延伸,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治理效能的强劲信号。从根本上看,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实践逐渐深化拓展,对民主党派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①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求各民主党派从深度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在推动内部监督制度创新上积极作为,切实提升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效。

一、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战略价值

通过开展内部监督,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参政党建设“四新”“三好”要求,是

基金项目: 民进辽宁省委员会2023统战理论研究立项课题“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侧重点和优化路径”(KT2023004);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南省统一战线理论学会2023年度研究课题“构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效衔接创新机制研究”(HN20231215)

作者简介: 崔晓彤,辽阳市社会主义学院科社教研室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王君,民进辽阳市委专职副主委,研究方向为参政党建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参政党实践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是其坚持“以党为师”,借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经验做法的积极探索,对于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建设高素质参政党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一) 坚持党对多党合作实践领导是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①开展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前提。通过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借鉴党执纪监督成效成果和有效做法,推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走深走实,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及机制健全的各环节和全过程。这与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统一性。从根本上说,开展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有利于在观念上提升党派成员的思想共识、在政治共识上提升其责任担当,进而从实践维度为促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实践创新的源泉,进而促进制度本身的理论拓展。

(二) 探索与国家监察有效衔接是厘清衔接环节和衔接要点的需要

实现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拓展和完善,是推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与国家监察实现内外衔接贯通的关键环节,是推进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从概念维度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是民主党派对其组织、成员遵守民主党派章程、履行民主党派职责情况的自我监督”^②。可见,民主党派内部监督需要辐射到各级组织、涵盖到每名成员。同时,民主党派内部监督聚焦的是被监督对象对民主党派章程遵守以及民主党派职责履行等基本情况,并对这些基本情况实现全程、全域、全面监督过程。这对探索与国家监察有效衔接提出了具体方向和需求。一方面,需要通过厘清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基本情况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弄清楚监督侧重点和发力点,进而打通与国家监察有效衔接的核心节点。另一方面,需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明确与国家监察有效衔接的基本范畴和战略定位。

(三) 提升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推进自身建设制度化的需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民主党派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化发展建设提供了动力上的依据。民主党派要适应国家治理发展进程加强内部监督,在此进程中,民主党派需要更好回应如何提升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这个现实问题。而加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正是促进民主党派提升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实践。具体来说,要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组织领导、权责分工、成效反馈等环节的工作制度机制和组织体系,尤其要细化制度流程,出台引导和规范民主党派成员观念、价值以及行为等的政策文件,这些举措对推动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可见,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是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建设制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

二、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基本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基于L省及N市各民主党派的实证研究

为了提升本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课题组共发放调查问卷《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开展基本情况和基本认知》共1060份,回收率为100%。一部分问卷向L省各民主党派省委发放,共发放776份,其中,加入民主党派1—3年的有186人,占23.97%;政治身份取得3—5年的有159人,占20.49%;加入民主党派5—10年的有187人,占24.1%;加入民主党派10年以上的

^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5—36页。

^② 王玉军:《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与国家监察衔接的思考和实践》,《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S1期,第88页。

有244人,占31.44%。另一部分问卷向N市各民主党派市委发放,共发放284份,其中,加入民主党派1—3年的有90人,占31.69%;加入民主党派3—5年的有32人,占11.27%;加入民主党派5—10年的有63人,占22.18%、加入民主党派10年以上的有99人,占34.86%。基于此,问卷样本涵盖了L省省市两级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对于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基本认知情况。

(一) 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现状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且涉及多个环节、多个流程。当前,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处于初步探索时期,在实践推进中,仍需要统筹考量系统性体系建设、实质性作用发挥、重难点问题破解等诸多方面。

1. 实践开展基本概况

当前,L省内省市两级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处于向“全覆盖”“全落实”的发展过渡阶段。关于内部监督开展情况,被调研成员作答“您所在的党派是否已经开展了内部监督工作实践”一题时,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成员选择“已经开展”选项的共665人,占比为85.7%。N市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成员选择“已经开展”选项的共248人,占比为87.32%。(见图1、2)。可见,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全覆盖”的要求积极推进,但仍未完成,且实践初期仍然存在许多需要破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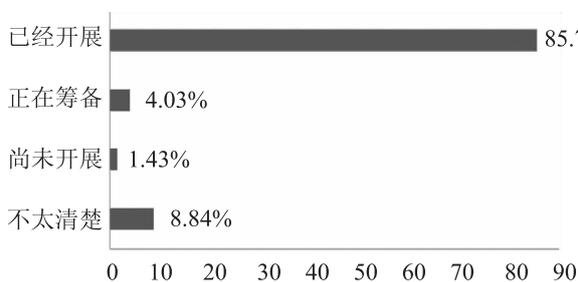


图1 对“您所在的党派是否已经开展了内部监督工作实践”的回答概况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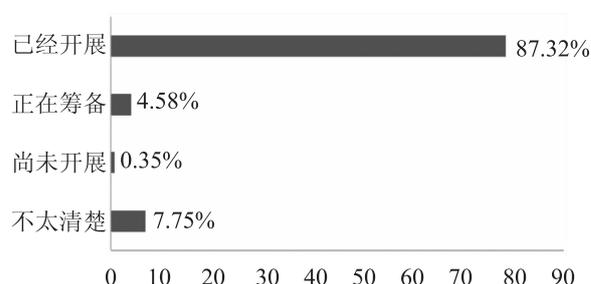


图2 对“您所在的党派是否已经开展了内部监督工作实践”的回答概况
(N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

2. 成立机构以及实践运行

内部监督委员会是各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重要机构,L省以及N市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概况如下:省级层面,截至2015年,L省八个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内部监督委员会全部成立,各自成立的时间和当前届期详见表1。

表1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内部监督委员会成立情况表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内部监督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当前届期
民革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3年	第十四届
民盟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5年	第十五届
民建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4年	第十届
民进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3年	第十三届
农工党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5年	第八届
致公党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4年	第八届
九三学社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09年	第九届
台盟L省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4年	第六届

市级层面，截至2024年1月，N市六个民主党派全部成立了内部监督委员会，各自成立的时间和当前届期详见表2。

表2 N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内部监督委员会成立情况表

N市各民主党派市级内部监督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当前届期
民革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0年	第九届
民盟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4年	第九届
民建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2年	第十届
民进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2年	第十三届
致公党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16年	第八届
九三学社N市市委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3年	第十届

各民主党派N市市级组织的内部监督委员会都“注重把那些热心党派工作、具有正义感、具有一定法律和纪检专业知识的同志选拔进入监督委员会”。^① 内部监督工作实践运行主要体现在：第一，明确内部监督工作目标定位，明确为什么要开展内部监督；第二，健全监督制度，制订内部监督工作计划，明确依靠什么制度开展监督；第三，确定并持续完善监督内容，明确监督什么。

3. 监督效果和典型案例

(1) 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委员会通过切实找准内部监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开展工作。首先，加强对领导班子及成员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监督。其次，在发展成员，党外代表人士推荐，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先进个人推荐，机关干部职级晋升，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强化监督力度。以致公党N市委员会对专项资金进行内部监督为例。从2010年起，致公党N市市委会在沈阳工业大学辽阳分校设立每年总金额2万元人民币的“致公自强”奖学金，奖励10名优秀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帮助其完成学业。这一活动得到沈阳工业大学辽阳分校的大力支持，至今已连续开展14年，受益学生120余人，累计捐款264470元。从2022年起，捐赠活动监委会全程开展监督工作，确保专款专用。内部监督委员会有关同志列席致公党N市市委会2022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注重调动监督委员会委员的积极性，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2) N市各民主党派组织已经开始探索与国家监察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衔接，为内部监督实践开展提供必要支撑。其中，致公党N市市委会已经与市纪检监察委进行内部监督衔接探索。具体而言，市纪检监察委将问题线索抄送致公党N市市委会，市委会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召开支部会议、总支工作会议、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会议、市委会主委会议，并按照《中国致公党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对有关违纪成员进行处分。可见，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虽刚刚开展，但可拓展的空间、潜力很大。

(二) 民主党派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现实问题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是推进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关键领域。一方面，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是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不仅要实现对民主党派内部组织、成员遵守民主党派章程、履行民主党派职责等情况的普遍监督，还需要细化自我监督事项，实现精细监督。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日益深化背景下，必然要求民主党派接受外部监督以规范、推进自身发展。当前，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存在监督组织体系不健全、监督主体覆盖程度不够、监督机构空转、与外部监督衔接不够、主

^① 民进北京市委课题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制建设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研究》2016年，第77页。

体认知不足等问题(见图3、4)。由此,对于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现实问题可以从监督观念、监督对象、监督机构、监督体系以及监督衔接等方面加以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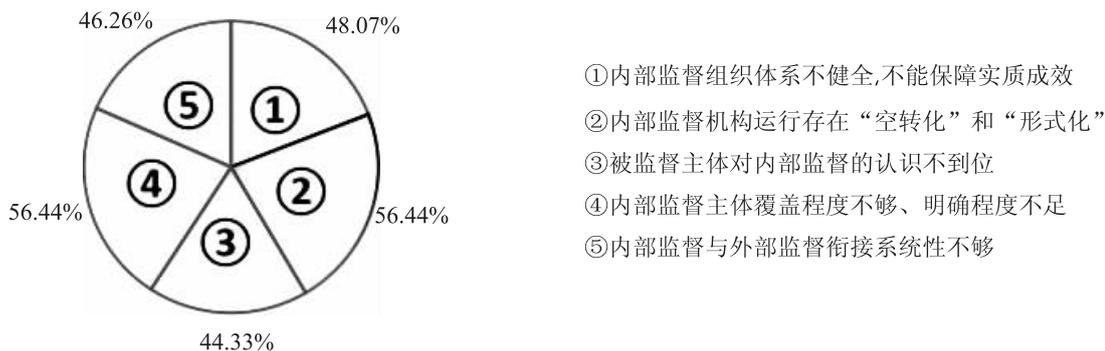


图3 对“以下哪些是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回答概况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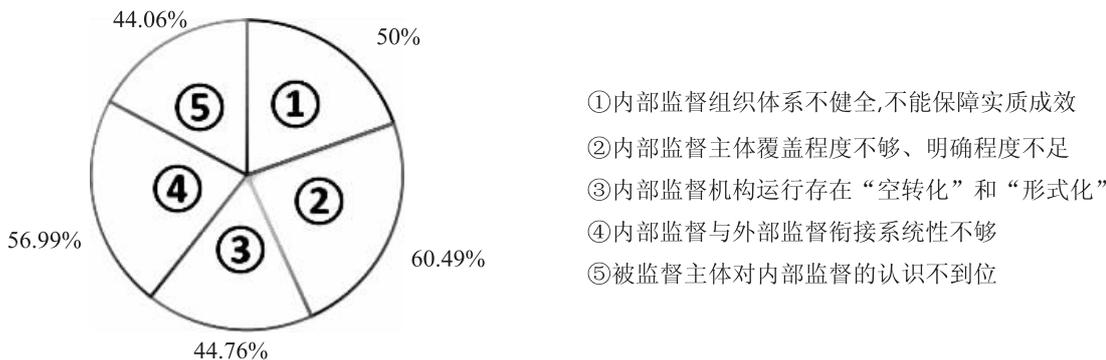


图4 对“以下哪些是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回答概况 (N市各民主党派地市级组织)

1. 监督观念层面: 被监督主体对内部监督认识不到位

民主党派成员正确认知内部监督的战略价值和重要地位,是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前提。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回答中可知,选择“被监督主体对内部监督的认识不到位”选项的,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选择占比为46.26%,N市各民主党派地市级组织的选择占比为44.06%(见图3、4)。由此可见,近一半的调研对象认为党派成员存在对内部监督认识不到位的情况。若各民主党派成员尚未能“将内部监督同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民主党派履职能力以及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联系起来”^①,势必影响参政党建设的实质性成效,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及时纠偏。

2. 监督对象层面: 内部监督对象明晰程度有待厘清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深化需要在厘清监督对象基础上推进。一是民主党派监督主体是在监督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员,例如民主党派中承担内部监督职责,组成监督委员会的党派成员。这部分人员按照内部监督概念也被确定为内部监督的对象。由此,就出现了监督主体被监督对象部分交织的情况,需要对相应的职责进行明确的分离和划定。二是按照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概念规定,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对象应该实现“全覆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的监督范围是涉及国家公权力的人员,但“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的内部监督……通常不涉及国家公权

^① 张师平、宫捷:《国家监察法实施背景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问题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33页。

力”^①。这就提出了民主党派中部分没有公职、不行使国家公权力人员（例如部分民建会员是无公职身份的民营企业家、部分民进会员是没有公职身份的教师）是否以及如何适用相关监督规制的问题。可见，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对象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和厘清，否则必然对内部监督工作开展造成诸多阻滞。

3. 监督机构层面：内部监督机构运行存在空转情形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委员会是内部监督机构，但是当前内部监督委员会在运转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空转化”“形式化”，甚至“摆设化”。内部监督委员会实际运转中制度化建设程度不高的情况相对普遍，特别是在监督范畴、监督内容的细化和探索上制度化规定不多。此外，对于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绩效的评价体系亟待健全完善，内部监督实际效果保障不足。特别是存在与外部监督（国家监察）衔接的难点尚未解决、重点尚未明确、程序尚未划定等不足，这些都是造成内部监督机构运行存在空转的主要原因。

4. 监督体系层面：内部监督组织体系不健全，监督成效难以保障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尚未形成闭环，即没有解决好怎样监督这个重要问题。一是当前，内部监督开展实践主要集中在列席会议等方式上，具有阶段性、节点性等特点，没有对民主党派日常事务建立起内部监督网络，例如在对会费使用内部监督等方面。二是从省级到市级再到支部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例如，合力开展贯通组织体系的专项攻坚、重点任务的内部监督尚未探索；也没有与国家监委联动构建起贯通监督事项始终的事前到事后全过程监督组织体系，监督实质性效果难以保障，容易流于形式。

5. 监督衔接层面：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系统性不足

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开展相关研究是一个相对新的实践课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能力素质建设的根本，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开辟的全新篇章。推进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是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需要突破的难点工作。鉴于国家监察法通过实施的大背景，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必然要与之贯通。但是当前并未出台明确的党内法规、实施办法等作为衔接保障，由此导致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系统性不够的问题较为突出。

综上所述，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受到监督主体的观念认知、监督客体的明晰程度、保障机制不完备、运行不顺畅、监督组织体系以及监督方式不完善、监督衔接系统性不足等短板制约。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如下：一是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理论发展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对实践指导成效有限；二是规范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党内法规以及相关条例并不完善，与形成系统化体系差距较大，法理依据较单薄；三是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发展、经验总结等还是处于初步探索期，特别是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衔接、保障机制构建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为后续抓准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侧重点提供了方向，也为提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优化路径提供了指引。

三、提升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质效的侧重点以及优化路径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是一个全新课题，在诸多方面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提升认知程度。在开展此类研究时，明确工作侧重点是基础，通过被调研人员对“您认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的侧重点应该在哪里”的回答，可以看出，内部监督若要行之有效，必须通盘考虑系统谋划，从内部监督主客体到流程细则以及外部衔接各个环节都要予以重视。（见图5、6）。在明确认识基础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着眼优化路径选

^① 张师平、宫捷：《国家监察法实施背景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问题研究》，第136页。

择。(见图7、8)鉴于此,结合上述实证数据,从制度政策、监督观念、监督主体、监督机构、监督体系以及监督衔接层面提出实践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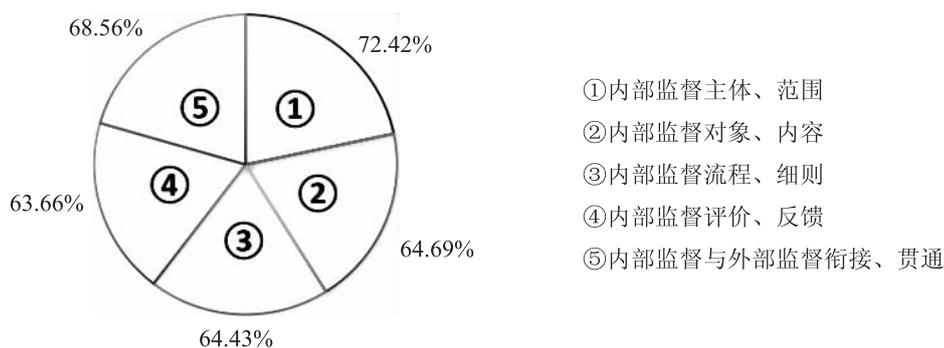


图5 您认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的侧重点应该在哪里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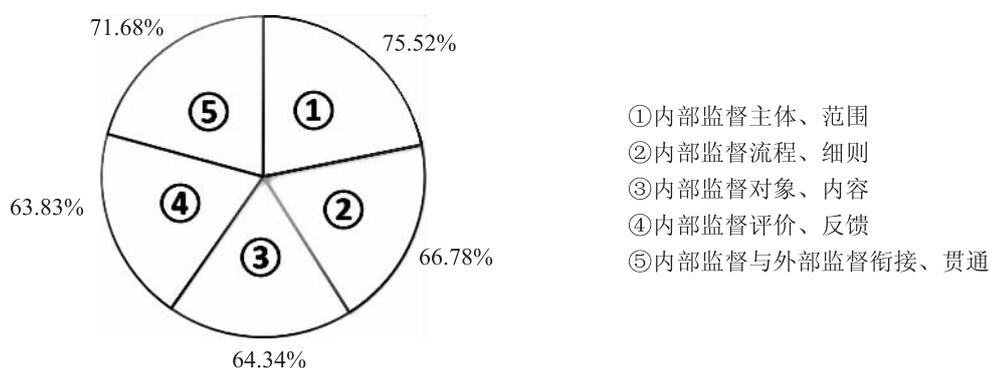


图6 您认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的侧重点应该在哪里 (N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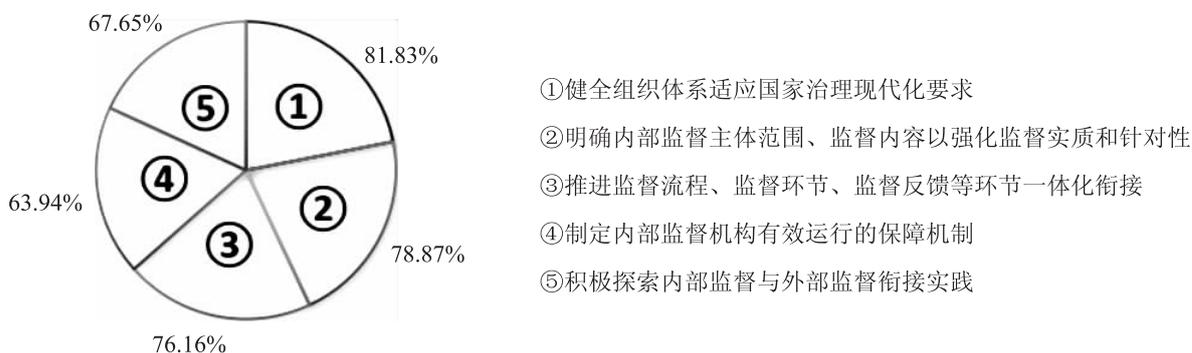


图7 您赞同以下哪些促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优化的实践举措 (L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

1. 强化制度建设和政策出台针对性,提升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效能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深化迫切要求从强化制度建设和政策出台维度促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作用提升。具体来说:

首先,制定与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成效提升相配套的制度。通过问题梳理、集中攻坚、成果巩固等制度构建实现成效切实提升。其次,制定开展深度调查研究促进内部监督实效提升的制度。特别要将内部监督相关的深度调查研究与法律运用、党派实践、思想深化等关联,特别要明确梳理出其中有无难以落实、思想困惑、监督无力等问题。最后,构建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以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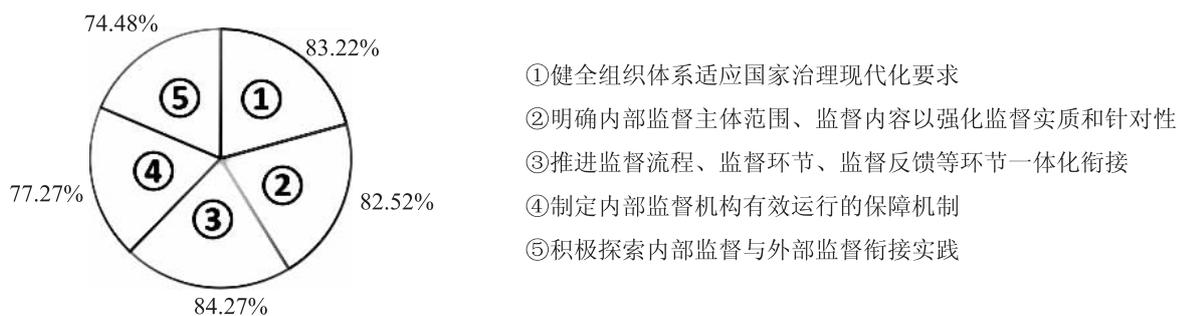


图8 您赞同以下哪些促进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优化的实践举措（N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

升内部监督效能。出台规范属性、保障属性、指导属性、发展属性兼备的政策文件体系，对内部监督各环节深入推进。

2. 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增强党派成员监督意识

民主党派成员正确认知内部监督的战略价值和重要地位十分必要，这关系到参政党的自我提升、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要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强化党派成员内部监督意识需要着眼以下几方面：一是要以党为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引领，推动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持续深化。通过提升民主党派成员对这一重要论述思想魅力和实践伟力的自觉感悟，夯实共同的政治共识，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使命认知，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二是要依托主题教育常态化机制强化思想共识。要着眼构建依托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中国政党制度史、民主党派史等开展主题教育常态化机制，筑牢党派成员正确认知内部监督极端重要性的信念之基，进而认知内部监督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肌健体、提升活力、生态净化的重大意义。三是要以中国共产党内部监督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强化党派成员的理解和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治党管党、从严治党实践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持续深化并形成了诸多成果和创新理论。应通过专项学习、理论研究、经验借鉴等方式，搭建党派成员汲取借鉴中国共产党内部监督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平台，进而达到结合自身建设实际强理解认识的目的，促进内部监督实践走深走实。

3. 明确对象范围内容，提升监督实效性和针对性

开展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实践，关键在于明确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划分和职责，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首先，明确分离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结合实践，把握内部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难点堵点，进一步细化完善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办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将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分开并细化各自职责和义务，特别是针对国家监察法规定范畴和民主党派章程规定范畴不一致的情况作出明确说明，厘清内部监督领域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范畴界限。由此，解决“谁来监督”“监督什么”以及“怎么监督”等一系列影响操作实效的问题。其次，坚持“以党为师”，积极探索落实监督主体权责义务，厘清监督对象范畴和类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拥有丰富的内部监督经验，参政党内部监督可以借鉴其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加以运用。在监督主体权责义务方面，要结合国家监察法和党派章程相关部分，以及实践最新要求加以规范。在监督对象权责义务方面，要根据国家监察法要求和民主党派实际明确其类别划分，进一步提升监督实效性和针对性。

4. 构建内部监督机构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委员会作为内部监督机构属于同体监督、同级监督。要破解上文提及的内部监督委员会运转存在一定程度的“空转化”和“形式化”，甚至“摆设化”现象。首先，要立足内部监督委员会职能，理顺机制，促进与外部监督有效衔接。要进一步推进内部监督与外部监

督衔接，特别是通过线索衔接、问题衔接等方式构建内外监督的贯通，进一步提升内部监督委员会实际运转效率。其次，构建内部监督机构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特别是通过构建提示机制、约谈机制、奖惩机制、反馈机制以及跟进机制等，扩大保障内部监督覆盖面、可行性，提升约束力和震慑力，避免不了了之，讲求落地有声。

5. 完善内部监督组织体系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取得实效，需要构建贯通性的监督环节，各环节之间形成闭环，做到没有断点、衔接通畅，从而保障监督体系发挥实质性作用。一是构建三级联动监管运转体系。根据内部监督事项影响程度和监管范畴，细化为三级联动监管运转环节。例如，将党派中央交办的监督事项实现三级贯通联动，影响较大的监督事项（党中央交办的事项等）进行三级联动，并明确各级联动的监督重点、内容和责任以及工作开展进度和阶段性目标等。二是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组织体系的完善，推动内部监督组织体系运行步入常态化。建立贯通事前、事中、事后联动监管制度，力求环环相扣，进一步规范组织体系之间的协调与管理关系，确保事前、事中、事后联动衔接顺畅。

6. 探索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系统衔接举措

监督实践取得实质成效需要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同向发力、互相支撑。当前，推进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已经进入实质性探索时期。首先，要明确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的必要性。明确为什么进行衔接是开展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协调考量的起点。主要应从衔接的政治定位、衔接的理论依据、衔接的实践成效等进行综合考量。其次，要明确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衔接的领域。明确在哪些方面进行衔接是保障衔接效果的根本。要推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效衔接，必须将两者之间的衔接领域和内容明确下来，特别要直面衔接难点和重点，例如围绕民主党派成员违规违纪情况、接报的问题线索情况、遵守党派规章情况、党会费收支情况等开展；同时也要着眼于内外监督衔接的具体运行情况以及实际成效等开展，在动态实践中进行必要的完善。

四、结语

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处于动态发展阶段。同时，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已经成为参政党建设的重点领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监督的基本理论，立足现阶段问题以及未来工作重点难点，通过深入挖掘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机构、监督组织以及监督衔接之间的内在关联，力求形成内部监督最大监督合力。同时，回应时代呼唤，着眼于回应内部监督面临的问题，将其置于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关键环节、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位置，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新篇章。

责任编辑：罗 雷

新时代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路径创新研究

史世奎, 李浩然

摘要: 密切联系界别群众是政协委员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履行委员职责的重要方式。当前, 政协委员在通过委员履职、岗位工作、行业交流、专项民主监督等方式联系界别群众的过程中, 存在内生动力不强、组织形式滞后、制度缺失、作风有待改进等问题, 制约着政协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制度效能的发挥。各级政协组织要不断加强党对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领导、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履职能力培训、优化界别设置、强化界别活动、推进联系平台建设、创新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 不断推动我国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持续提升政协制度效能。

关键词: 政协委员; 全过程人民民主; 联系界别群众;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4) 03-0058-08

界别群众是指在被归纳不同界别中的团体组织、群体代表及其他人民群众, 通常在一定行业或领域、一定区域拥有一定社会威望和群体代表性。^①政协委员由界别产生, 亦具有密切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的义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 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 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 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②根本而言,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不仅是人民政协桥梁纽带作用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然而, 当前仍有部分政协委员在思想认识、组织认同、制度维护、作风素养等方面存在不足, 不仅影响了当前相关工作的推进, 同时也削弱了界别群众与人民政协的制度性联系, 制约了界别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鉴于此, 学界有必要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 深入总结传统路径的经验与不足, 不断创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路径与机制, “实现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与实效化,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③, 吸纳参与、汇聚众智, 助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基金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河南研究中心课题“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研究”(2023ZXLL010)。

作者简介: 史世奎, 郑州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康养产业发展; 李浩然,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① 严旭:《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现状及机制创新的意义》,《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4期,第51—54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③ 姚兵:《政协委员要更好联系服务界别群众》,《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18日,第8版。

一、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动因分析

2022年9月，全国政协发布《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首次对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范围和内容进行了规范，从制度层面回答了‘联系谁’‘联系什么’‘怎样联系’的问题，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提供了指导”^①。该文件是各地政协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不仅保留了全国各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传统路径，而且基于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特点、新趋势、新要求提出创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方式与方法，保证了相关工作的连续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基于委员履职要求联系界别群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在此指导下，政协委员通过参加政协组织的调研或独立开展社会调研，不断加强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反映民意心声，并协调社会矛盾。一定意义上，政协委员履职是其联系界别群众的最重要、最基础的路径。地方政协为推动相关工作、确保政协委员对相应界别群众的代表力和引领力，纷纷出台了地方规章。如，贵州省、甘肃省、重庆市等多地政协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建章立制、创新方法，不断推动有关工作做深做实。

（二）基于业务岗位职责联系界别群众

一般而言，政协委员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有着具体的工作和职务；但其又不同于一般的行业从业人员，具有一定任期的政治身份，承担着联系界别群众和表达民意的职责。这种双重身份为政协委员开展界别群众联系工作提供了便利。众多政协委员立足自身业务岗位职责，结合其专业知识和感受，能够更加准确地体察界别群众的关切和利益，做好政策宣传和矛盾化解工作，并提出科学、可操作建议。这种方式成本低且与委员自身资源紧密结合，是我国众多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基于行业交流需要联系界别群众

政协委员在开展本职工作时，也会经常参加行业交流，与界别群众进行集中、广泛的交流。这种方式能够突破组织环境对联系对象的限定，使得政协委员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情民意信息，进一步提升和验证建言献策的针对性、科学性，不断提升政协这一国家治理“良器”在界别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近年来，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经常组织一些行业会议，为政协委员搭建联系平台，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基于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要求联系界别群众

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政协会按照“少而精、专而深、准而实、活而新”的原则，“充分利用政协组织形式，加强民主监督组织化程度，发挥界别、专委会专业优势”^②，“围绕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专项工作、重点项目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组织专门力量，集中时间和精力开展监督”^③。专项民主监督涉及专业领域和专业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协委员不仅可以对特定问题开展专业、科学诊断，同时也能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从而间接达到联系界别群众的目的。

^①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答卷》，《人民政协报》2023年12月6日，第12版。

^② 项雪龙：《发挥专项民主监督独特优势 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贡献政协力量》，《江苏政协》2024年第1期，第10—12页。

^③ 王焦成：《专项监督要在“专”上发力出彩》，《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52—54页。

（五）基于日常交往需要联系界别群众

日常交往也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政协委员通过日常会谈、问候、聊天，从界别群众那里获得相关信息、了解具体诉求；另一方面，“界别群众主动上门或通过信函、微信等向政协委员倾诉心声、反映问题、寻求帮助”^①。该路径联系方式较为灵活、交流效率高，也克服了其他类型联系途径单向联系居多、互动不足的问题，更有利于促进界别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经常性、及时性，助力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但同时，基于日常交往的联系也存在交流内容片面、感性因素较浓厚、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联系成果向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成果转化。

二、当前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存在的不足

“新时代政协委员更好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积极反映界别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推动解决界别群众的困难与问题，是政协使命的内在体现，是政协功能的内在彰显，是政协担当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做好政协工作的必然要求。”^②在联系界别群众方面，各级政协委员做出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时代不断创新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不容否认，当前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内生动力不足

一是对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存在认识误区。通过联系界别群众，“人民政协既有效缓解了社会政治参与的压力，又能通过选择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政治理性的精英来有效整合社会利益诉求，扩大社会支持的来源”^③。然而，我国政协代表中，少数委员对界别群众联系工作的重要性领悟不够，不能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深刻把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也就难以以界别代表的身份自觉参与界别活动，更遑论认真听取界别群众意见、建言献策。

二是对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效能感不足。“政治效能感是一国民众在与其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系统回应力的内在的、比较稳定的评价系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④，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调节变量。当前，某些委员政治效能感不足，对有效代表界别群众的利益缺乏信心，不确定自身参政议政行为能否进一步推动实现界别群众的利益。在这种心态下，一些政协委员有意无意地疏远界别群众，回避界别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导致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无法得到很好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⑤。政协委员是按照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行业等不同界别协商推荐产生的群体。这种产生机制目前仍不够健全完善，其操作运行仍存在一定模糊性，导致一些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性不足。一些委员更加关注委员身份能够为自身带来的政治附加值，亦比较重视政协委员间的横向联系，却疏于履行委员应负的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职责。

① 刘振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政协界别变化的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5—27页。

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时代政协委员更好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内在逻辑》，《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6期，第34—41页。

③ 董树彬、董鹏林：《政治吸纳视阈下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第1—8页。

④ 李蓉蓉、王东鑫、翟阳明：《论政治效能感》，《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第107—112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tDpOZ-GF3bsWaOxzFajVSw>，2024年9月21日。

（二）界别组织形式发展相对滞后

1. 界别工作相对滞后于形势发展，一定程度制约了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开展。“从社会属性来看，界别群众是社会人群结构的具体界限划分，是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和观念共同体。”^①当前，我国政协界别已经从1978年的29个增加到当前的34个。纵然如此，当前的界别设置仍难以充分吸纳因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而不断分化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同时，界别委员选拔有较明显的精英化倾向，对基层群众的吸纳仍不足。此外，从界别设置标准来说，标准重合或相对粗放等问题导致同一界别内部异质性较强。这些都导致部分界别委员在界别群众中的影响力较弱，政协会议期间“以界别名义提交大会发言、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专题协商报告少，界别的智慧力量没有充分彰显”^②。

2. 界别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相对于党派界别和团体界别，职业界别的组织化水平仍较低，缺乏常设机构，常被视为政协各专委会的协调统筹对象；同时，也缺乏清晰的行为规范，导致“界别协商、界别调研和监督等活动的开展因缺乏基本的行为规范而呈现出随意性、形式化、无序化的问题”^③。除此以外，由于缺乏组织依托和行为规范，当前我国政协中界别召集人只能在政协会议期间开展界别协商和联谊，而在政协闭会期间难以有效组织界别活动。

3. 平台建设仍需优化。平台建设是直接影响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因素。目前，政协委员之家、政协委员会客室、委员联系点、线上服务平台等组织平台搭建了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重要通道。但同时，政协委员各类联系平台建设仍存在不足。一是平台利用率不高。由于兼职特征，很多委员参与界别群众联系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未能经常到这些联系点去接待界别群众。尤其是政治参与意识较低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二是平台的信息化建设不足。平台的信息化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协委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和效率，还能克服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的空间距离，是对各种实体平台的有益补充。然而，当前政协履职平台信息化建设未能较好适配界别群众的工作习惯和信息沟通习惯，制约了平台对界别群众的吸引力。三是平台布局科学性有待提升。界别“大多是跨单位、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域的群体集合，因而组织程度相对松散，界别成员也比较分散”^④。为提升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便利性，平台布局应与界别群众空间分布保持一致或趋向一致。然而，在很多时候，实体平台建设不仅要考虑联系的便利性，还要综合很多额外的因素，导致一些平台与界别群众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这是造成部分委员把“‘居民群众’和‘界别群众’相混淆，把‘进入社区’和‘深入界别’划等号”^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供给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与人大代表相比，政协没有要求委员要定期走访选民、向界别群众工作述职这样的硬性规定”^⑥，也缺乏关于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系统性激励制度和保障制度。

在激励制度方面，当前各级政协出台了履职、培训、考核、提案提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也

① 仰叶齐：《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任务方式、构成要素及方向路径》，《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8—23页。

② 《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提升市（县）政协界别履职效能》，《江苏政协》2023年第7期，第25—26页。

③ 董树彬、董鹏林：《政治吸纳视阈下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第1—8页。

④ 仰叶齐：《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任务方式、构成要素及方向路径》，第18—23页。

⑤ 蓝绍敏：《以完善制度机制为保证做好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人民政协报》2024年1月24日，第3版。

⑥ 武占刚：《让政协委员紧密联系群众》，《北京观察》2016年第7期，第46—47页。

尝试对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进行考核。但总体而言,这些制度重考核、轻激励、刚性不足,不仅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政协委员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也不会影响委员的任职资格与职位晋升。正因为如此,不少委员不愿做这种“劳神费力”的潜绩。

在保障制度方面,由于政协委员的兼职性质,除政协组织专项监督、政协集体调研等活动外,其他类型界别群众联系活动通常较难得到委员所属业务单位的支持。不少政协委员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来开展相关工作,因而很多委员的界别联系工作存在着较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缺乏稳定的联系沟通主题,鲜有委员会对同样问题进行持续沟通和研究;另一方面,很多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缺乏详细的时间安排,导致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时间跨度太大而无法与界别群众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极大影响了委员调研的质量。

(四) 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作风有待改进

一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主动性不足。由于特殊的产出路径以及兼职特征,政协委员与其所在的界别群众联系较为松散,其与界别群众之间的联系较为被动。在多数情况下,不少政协委员通常是通过参加政协组织的调研或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的机会与广大界别群众进行深入的交谈,主动深入界别群众中交心谈心、交友联谊、宣传国家政策、汇集社情民意的意识仍较为缺乏。这种被动性会对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了社情民意、真言良策获取和收集整理,影响界别群众有序充分政治参与的实效,增加不实建言献策的道德风险;同时,还会削弱政协对界别群众的政治整合力,增加界别群众疏离政治体系的风险。

二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方式仍较单一。由于委员身份或者委员履职能力难以给委员带来直接收益,导致一些政协委员在创新和开展多样化的界别联系方式方面缺乏积极性。不少政协委员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资源禀赋以及个性特征选择最熟悉、常用的、低成本的方式联系界别群众,如基于岗位职责、行业交流和日常社交联系等方式,导致一些委员所联系的界别群众常限于较狭窄的范围内,缺乏联系的广度与深度。

三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仍不够深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研,并明确指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①。然而,一些政协委员在联系界别群众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作风,“停留在‘问题’搜集层面,没有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真假性判断和科学性研讨,存在发现什么、报送什么的浅层次现象,对问题发生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均缺乏深度思考”^②。委员调研不深入、成果转化应用成效不佳,不能较好为界别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界别群众接受和配合政协委员调研来访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政协委员能力结构有待优化。政协委员的能力结构直接影响着其与界别群众的联系与沟通的效果。在专业能力方面,少数政协委员专业能力较弱,难以抓住界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难以提出解决问题的较好对策,也难以与界别群众同频共振。在沟通能力方面,并非所有政协委员都能够娴熟运用沟通技术、技巧,做到与界别群众无障碍沟通,准确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调化解界别群众的矛盾。在调研技术方面,一些政协委员未能熟练掌握调研技术和分析方法,从而陷入走马观花的一通迷人眼,很难掌握真实、全面的情况。在写作能力方面,一些委员不懂得如何凝练主题、找准问题、设计对策。

三、新时代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路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

^①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第1版。

^② 严旭:《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现状及机制创新的意义》,第51—54页。

求，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我们要不断创新工作制度、机制与方法，增强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政协在凝聚政治共识、开展政治动员方面的强大功能，不断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提升治理效能。

（一）加强党对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领导

“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已成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必然要求”^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的深入推进必须协调组织、委员个人、界别群众和基层群众等复杂关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一是各级政协在推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时，必须加强政协各级组织党的建设。各级政协应在政协党组、机关党组、机关党委、党支部等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推动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党员委员活动小组的建设，并探索其与联系平台、委员活动小组一体化的建设路径，实现党建与履职的深度融合。同时，党组织要积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结合界别特色，建立党员与党外政协委员的结对制度，共同参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工作，实现界别群众联系工作的常态化。

二是党组织要积极加强对政协委员的政治领导。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政协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③，坚定其“四个自信”，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三是党组织要重点加强对党外政协委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积极推动其突破自身可能存在的“精英主义”倾向，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履职尽责。

（二）加强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培训，提升联系界别群众能力

政协委员能否深入联系界别群众还与其实际履职能力有直接联系。当前，针对各级政协对政协委员的政治培训较多、履职能力培训内容较少，难以充分满足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能力提升需求。因此，各级政协应该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建构以提升履职能力为目标的培训体系。

一是在培训方式方面，应增加新任委员的岗前培训。当前各级政协开展的集中培训和外出培训是一种典型的任后培训，无法保证新任委员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各级政协应该大力开展新任委员的岗前培训。同时，在培训形式方面，各级政协应积极突破课堂教学、讲座等单向培训方式，开发模拟式、实践项目式、讨论式、案例式、工作坊等创新形式教学，提升培训效果和新任委员履职能力。

二是在培训内容方面，根据政协委员履职和联系界别群众的工作需求，应增加调研能力培训、沟通能力培训和参政议政能力培训。在调研能力方面，各级政协应加强政协委员调研选题、调研组织、调研方法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升政协委员甄别、获取、汇集民意的能力。在沟通能力方面，各级政协应重视对政协委员表达、倾听、非语言沟通、反馈、情绪管理等方面的技巧，由此减少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的沟通障碍。在参政议政能力培训方面，各级政协应积极提升委员发现问题、凝练主题、撰写报告和提案的能力，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利益代表、沟通协商与民意表达的功能，切实将界别群众的关切转化为有效提案和政府决策。

（三）优化界别设置，强化界别活动，提升政协委员的界别履职意识

界别设置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重要基础。界别设置的科学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各级政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② 启尧：《准确把握加强政协党建工作的路径和措施》，《人民政协报》2019年8月28日，第7版。

③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85页。

对界别群众的政治吸纳和动员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激发政协委员的界别履职意识，提高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政协应根据形势发展，承前启后，不断优化界别设置，将各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新兴社会群体、新的社会阶层的优秀代表吸纳进政协，并积极创新界别活动，激发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内生动力。在界别设置方面：

一是整体上要“坚持做到横向独立性强，纵向专业性强，内部联系性强，把紧密联系一定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①。具体而言，我国的界别设置要在坚持党派界别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优化和完善团体界别，明确不同团体界别的标准和名称，调整其委员数量，减轻目前界别设置中存在的交叉与重复问题，并积极考虑把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阶层、从业者纳入新的界别。同时，各界别应加大对普通群众代表人物的吸纳，确保界别的包容性和社会利益整合能力。

二是要突出政协履职的“界别”特色。一方面，各级政协可以适当增加以“界别”名义组织的调研和协商议政活动，定期组织界别工作座谈会；另一方面，在政协会议期间，要强化界别委员意见的整合，鼓励各界别联名提交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

（四）推进联系平台建设，巩固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渠道

联系平台建设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重要一环，关乎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深度、广度和效度。各级政协应在加强线下平台建设的同时，加强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开拓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的线上线下多样化沟通渠道。

在线下平台方面，各级政协应进一步提升“委员之家”“委员工作室”的使用效能，调整其空间布局，提高其与界别群众空间分布匹配度，完善其开放、运营制度机制，定期召开委员走访、考察调研、座谈会等活动，大幅增加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频率。

在线上平台方面，各级政协应在微信群等通用平台之外，建立服务各界别群众的专门数据库，推动协商、聚识、读书、宣传等平台功能集成上云，开辟网上会客厅、民意直通车、远程协商等渠道，提高沟通协商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五）创新工作制度，激发政协委员的履职使命感

推动政协委员自觉加强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各级政协需要积极完善责任制度，创新激励制度，优化工作流程，不断优化政协委员履职的外部环境。

一是在责任制度方面，政协机关还应将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纳入委员履职管理考核范畴，建立政协委员的界别联系责任区和重点联系人制度，实行定期和重大节点回访。应多加注意的是，政协委员除走访、调研、座谈、征集社情民意外，还应在把握界别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多办惠民实事，探索界别群众与政协委员的多元关系模式。

二是在激励制度方面，各级政协应建立与界别群众联系工作紧密关联的、多层次的荣誉制度。一方面，在政协委员工作考核中，应对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进行单列，并对表现突出者进行专门表彰、联合表彰；另一方面，应以受表彰政协委员为基础，组建一批品牌“委员之家”，进一步扩大政协委员在界别群众中的影响力，助力相关工作开展。尤其应建立界别群众联系工作与任职资格的联系制度，对于那些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不力的委员限期整改，根据整改情况提请常委会审议是否终止、缩短或保留其委员任期。

三是在工作流程方面，为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其联系界别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应“健全‘主席会议成员—专委会—界别—委员—群众’工作机制，推动委员融入式、下沉

^① 严旭：《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现状及机制创新的意义》，第51—54页。

式、叠加式联系界别群众”^①；另一方面，应“建立政协界别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口联系制度，建立专委会联系界别工作制度，为界别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②。

（六）改进作风，增进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实效

加强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要不断改进政协委员的工作作风。一是要在能力培养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调研的作风，杜绝走马观花式调研，努力与界别群众打成一片，直面界别群众的需求和痛点，做真调研、讲真问题、动真情。二是在界别群众联系工作中，应加强从社情民意调查研究到政策制定的转化，切实发挥政协的社会利益整合协调功能，增强界别群众对人民政协的认同感。三是各级政协还应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对于界别群众广泛关注、急盼解决的问题，应保障政协与界别群众之间的沟通，及时将相关部门反馈的处理结果通报给界别群众，防止界别群众产生政治失落感或政治冷漠感。

结 语

无论何种联系界别群众方式，都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与目标。当前，各级政协组织在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但从整体上看，相关措施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仍有待优化提升，政策间摩擦仍然存在，政策效力衰减过快问题依然突出。鉴于此，各级政协一方面应加强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与机制的适应性，使之随技术进步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系统、持续更新，不断获得新赋能；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制度间的协同，规避政策间的摩擦、对立，使之同向发力。由此，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工作才能更加地持续、深入开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运行，保证人民政协价值、功能充分发挥，制度效能不断提升。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黄巍东：《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探索》，2024年5月8日，<http://www.cppcc.gov.cn/zxww/2024/05/08/ARTI1715137910703250.shtml>，2024年8月6日。

^② 周青山、俞玲：《人民政协界别设置及其发挥作用研究》，《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36—40页。

新时代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 “云南示范”的探索与实践

张志远

摘要：云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全面展现了民族工作的“云南现象”“云南经验”，而且也成为展示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窗口。分析“云南示范”的时代背景、政策成效、目标、现状与创新举措，论述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理论逻辑、形成机理与实现路径，探讨把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云南经验”升华为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更加有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更加美好、各族群众迈向现代化步伐更加稳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紧密、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体系更加健全五个“全国示范区”，对于把云南打造成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样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

中图分类号：D633 (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3-0066-10

云南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民族大省，也是世居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和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边疆省份，民族工作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创造性地推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进步事业、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爱国精神、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项重要民族工作主题和重大社会工程。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就是要云南立足民族大省的省情特征，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通过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机制、社会机制等动员手段、载体来协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实现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实现和谐发展进步，进一步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探索新路、作出示范。

民族团结进步的“云南示范”是基于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在民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云南经验”“云南现象”基础上，充分汲取了内蒙古、广西、宁夏等民族省区的经验，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坚持“立足云南创经验，面向全国做示范”理念，把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云南经验”升华为五个“全国示范区”的创建基础和优势路径。

基金项目：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中缅边境安全治理研究”(24XZZ009)；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4年度课题“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云南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张志远，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社会学。

一、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时代背景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示范是缩小各民族间经济差距、提升生活水平，并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型示范性模式^①。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不仅仅是民族工作，而是全局工作；不仅仅是民族地区发展，而是全省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云南的事，而是国家战略^②。云南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将有助于巩固深化民族工作的“云南现象”“云南经验”，不仅在全国具有引领示范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展示中国民族政策的窗口。

（一）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增进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云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意义重大^③。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通过统筹推进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创建、民族文化繁荣、民族宗教事务治理等各项工作，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行政村等基础设施、市容市貌、城乡人居环境、精神面貌等得到整体提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稳步推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2020年11月14日，云南省11个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摘帽，终结了千百年以来困扰各族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各族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二）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加速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2015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考察云南，均提出把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云南毗邻中南半岛，“东方多瑙河”澜沧江·湄公河把中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连在一起。早在2000多年前，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把内地与中南半岛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和民族连在一起，云南成为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古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沿线地区民族贸易通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让古南方丝绸之路焕发出时代生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也是部分省区促成国家区域性战略实现的内在要求^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是云南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民族之间民心相通、共享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推进云南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均提出把云南建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求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取得新进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当前，云南发展

^① 闫德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16页。

^② 张帆、杨文明：《都是一家人 同过好日子》，《人民日报》2017年9月6日，第11版。

^③ 陈鲁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11页。

^④ 肖究：《从民族团结走向民族融合——对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几点思考》，《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第42—47页。

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民族之间，要花大气力解决区域、城乡、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是云南最鲜明的主题、最大的任务。《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核心要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2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伟大荣光。”云南省委、省政府已把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为推进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而言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局和云南的突出特点，对云南民族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是对多民族省情的历史、现状的全新认识和把握，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科学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不仅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凝聚力，也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现实需要，更是云南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政策、成效与目标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云南民族工作成绩突出，这是云南最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建设小康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民族团结同心、社会和谐同创”的工作理念和要求，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目前，云南各民族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整体提升，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全面增强，各民族文化实现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局面日趋巩固，民族工作机制日益健全。

（一）新时代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立足省情，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程，先后出台《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从2022年5月起，“石榴红”工程、“枝繁干壮”工程和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先后启动实施。2022年，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制定了边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建立1个创建联盟、3个共同体意识中心、3条示范带、6个片区的“1336”工作措施，推进边境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

（二）新时代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加强社会治理等一系列举措，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有了新跨越，人民生活有了新改善，基础设施有了新变化，特色产业有了新发展，民族文化有了新繁荣，民族团结有了新巩固^①。在民族经济方面，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年均增长9.5%，高于全省水平；在民生领域，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① 王宁：《中国这十年·今天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篇》，2022年7月21日，<https://yn.yunnan.cn/system/2022/07/21/032197059.shtml>，2023年7月11日。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整体推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在基础设施方面，民族地区道路硬化、饮用水、电、互联网、5G、物流、邮政等稳步推进；在产业方面，云茶、云蔬、云花、云果有了新发展，烟草、茶叶、鲜切花、咖啡、中草药、畜牧业等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形成产业集群；在民族文化方面，《幸福花山》《独龙天路》《宾弄赛嗨》等优秀民族文化有了新繁荣；在民族团结方面，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巩固深化。

（三）新时代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十个模范省”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目标体系》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维护核心坚定省、共同体意识模范省、良法善治阳光省、对外开放前沿省、高质跨越发展省、乡村振兴样板省、民族文化繁荣省、和谐稳定平安省、生态环境最美省、奋斗共享幸福省”的战略定位，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统整体设计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①。笔者认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局和云南突出特点作出的重要部署，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现代化边境小康（幸福）村建设，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创建行动，推动云南民族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作出示范引领。

三、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方法与现状

民族团结进步的“云南示范”基于多民族省情的历史与现实，通过持续夯实创建的基础，传承民族团结重要遗产和精神财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扩面提质、改革创新，覆盖面、影响力、感召力都有了新提升。同时，也要及时查找与中央要求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一）一线工作法：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创建基础

云南民族工作一线工作法就是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础、扩大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覆盖面，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1. 云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云南是民族大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世居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独有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汉族的温厚、藏族的壮美、彝族的刚健、白族的亮丽、傣族的柔美、布朗族的淳朴、基诺族的豪迈、佤族的奔放、纳西族的浪漫、哈尼族的热情……云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

2.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战略谋划。“十大示范”“三个跨越”^②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建设战略，也是推进云南民族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的云南民族工作道路，即创新民族政策，创新规划指导，创新示范机制，创新示范工程等^③。

^① 木胜玉：《云南编写〈目标体系〉：致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2020年4月2日，<http://yn.people.com.cn/n2/2020/0402/c372450-33923380.html>，2022年10月18日。

^② 在民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保障、民族文化繁荣、民族教育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干部培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工作创新、民族关系和谐“十大示范”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新跨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边疆繁荣开放实现新跨越“三大跨越”。

^③ 赵新国、毛燕：《新时代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实践创新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5—11页。

3.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研究基地成立。2006年以来,云南省先后有云南民族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等10个人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数量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各州(市)、县建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研究中心)80个。全省还建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主题公园127个、现场教学点19个、示范基地11个、主题教育成边馆6个、基层实践站(讲习所)3个,不断引领各族群众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行动自觉。

(二) 项目工作法: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创建传统

云南民族工作项目工作法是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责任主体、进度时限和工作措施。

1. 完善示范创建工作机制。云南省形成“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领导,完善示范区建设工作体制机制,“一把手”领衔、“一盘棋”布局、“一体化”推进,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第一群众工作来抓,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供制度保障。

2. 实施典型示范工程。实施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石榴红”工程、“枝繁干壮”工程、“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工程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等。通过以深度贫困县和贫困村为重点,按脱贫攻坚和示范区建设“双融合双促进”的思路,组织三轮“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工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十一进”活动常态推进长效机制,景区、村寨、学校、医院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联盟,通过主题教育馆、主题公园、主题街道、主题广场等载体,建设强化宣传教育。

3. 建立州市、县市、乡镇、社区“四级联创”机制。坚持全面创建、全域创建、全民创建、全程创建理念,推动创建工作提质增效;坚持统筹创建全局,抓住重点、聚焦难点、打造亮点,多策并用、整体发力、推动创建工作纵深开展;坚持抓项目推进,推动创建工作持续发力。

(三) 典型引路法:示范引领的辐射效应

云南民族工作典型引路法是深入调查研究,从中归纳、提炼、规范其经验和规律,通过示范引领,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推动工作整体提升。

1. 民族团结进步典型人物。在新中国70余年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代表,例如: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录了李保用生命捍卫自己“永远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誓言,“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拉勐,西双版纳州“老州长”召存信被誉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定海神针”“压舱石”,怒江州奋斗在独龙江畔的“老县长”高德荣(独龙族)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2.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创建。在城区,开展“城市基层党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双推进工作,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推动实现各族群众和谐共居。在乡村,积极开展多民族决策议事、多民族当家理财、多民族约定村规、多民族群防群治。充分用好“互联网+”“旅游+”“文化+”等新技术、新业态,使创建工作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3.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联盟。云南省通过行政接边跨区域村寨联盟、行业联合的景区联盟、企业联盟、医院联盟、学校联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从个体创建到抱团创建,从抱团创建到

行业创建，从行业创建到全域创建，从全域创建到跨区域创建。

（四）问题导向法：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全面推进

云南民族工作问题导向法以对标对表国家民委最新修订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查缺补漏、提质增效，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1. 在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方面。应深刻认识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云南民族工作重大任务，把示范区创建纳入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议程，纳入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察、政绩考核，压实责任，各司其职、优化整合。

2. 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在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方面。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云南要花大气力解决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着力解决民族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美好生活、共同迈向现代化。

4.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各民族在居住空间上有机互动、交错杂居，建立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互嵌、政治互嵌、居住互嵌、社会生活互嵌的社区结构。

5. 在增强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方面。云南毗邻缅甸、老挝、越南，境外“三股势力”长期以来危及边境地区民族宗教安全，要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加强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研判及引导处置，增强民族事务治理能力。

新时代民族领域的示范创建工作，“创”的是团结进步的理念和模式，“建”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符号，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民族社会的具象化过程^①。建的是各民族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机制，符号则是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等，通过建筑、影视、标识、表演等不同艺术形式展现，也要善于从各民族文化符号中深入挖掘提炼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文化符号。

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云南示范”的创新举措

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来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经历了注重对单一民族发展转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从关注民族区域发展衔接到中华民族整体繁荣进步，从关注民族问题中单一民族问题上升到整体中华民族发展的全局问题^②。云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核心和本质要求。创建工作的核心是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三个离不开”思想深入人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③。

云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策略与经验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目标体系》“十省”战略目标为定位，持续推

^① 李若青、赵敏：《塑造示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结构—行动”实践解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50—56页。

^② 李若青、赵敏：《塑造示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结构—行动”实践解释》，第50—56页。

^③ 王延中：《对如何认识和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几点思考》，2019年3月22日，<http://www.min-wang.com.cn/mzwhzyk/674771/689891/689892/753094/index.html>，2021年4月15日。

进组织领导、制度设计、法制保障、规划引领、项目推动等方面构建起示范区建设的“四梁八柱”，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十五年大跨越，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2035年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一）党对民族宗教工作全面领导更加有力的“全国示范区”

民族平等不仅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石，也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根本。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全面领导的“全国示范区”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党的民族宗教工作领导的机制和推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推进奋斗共享幸福省建设。

1. 建立健全党对民族宗教工作领导的机制。云南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推动民族宗教工作融入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了“1+1+N”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主体而言，党委、政府、统战部门、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各部门、全社会等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文化引领力、社会凝聚力、民生保障力、法律支撑力、工作创造力及奖惩激励力。以政治领导力为核心，七个动力共同组成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机制^①。建立健全党对民族宗教工作领导机制对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2. 推进民族地区云南党的建设示范。云南深化边疆党建长廊建设，要在“五个深化、推进五边”上下功夫，开展自强诚信感恩教育活动，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到党的周围。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配强党组织班子和选好基层干部，把边疆基层党组织发展成战斗堡垒，通过组织强边，选派党建指导员、强边固防第一书记等；通过建立国门社区“大党（工）委”、开展“云岭先锋”系列创建活动，整合资源扩大优势；通过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党员模范岗提升服务开放水平，切实推进开放活边；通过领导干部定期走边关和深入推进“党政军警民共建”，加强边防连队与党政机关创建，切实推进守土固边；抓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大力推进电商扶贫、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切实推进富民兴边；通过拓展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功能、结合民族文化凝聚服务群众，切实推进和谐稳边。

（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更加美好上的“全国示范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主线。培根铸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目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国示范区”，就是讲好云南情、民族情、边疆情以及讲好各族群众心向党、心向国家、维护民族团结的故事，推进维护核心坚定省建设。

1. 讲好云南情、民族情、边疆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五次〔（2014（独龙族）、2019（独龙族）、2021（边境村老支书）、2023（云南大学）、2024（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给云南各族群众亲笔信，体现了对云南各族群众的关心关爱，始终牵挂云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始终牵挂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始终牵挂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彰显了独有的云南情、边疆情和民族情。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省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引领各族群众热爱领袖、拥戴领袖，在人民领袖的旗帜下感恩奋进，

^① 苏韦铨、付蕾：《新时代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七个动力——基于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 Nvivo11 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7—26页。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省发展方向的指引，建设美丽家园、维护民族团结、守护神圣国土，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讲好云南各民族跟党走、维护民族团结的故事。云南有16个跨境民族，各民族自古有爱国固土守边的优良传统。例如：深入挖掘、广泛宣传班洪、片马抗英共同抵御外侮等民族团结故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享有“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美誉。新时代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坚守初心、奋斗筑梦”，要大力弘扬新时代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讲好西双版纳永远的“老州长”召存信“一生跟党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奋斗终身的故事。讲好“县际互帮、东西互助、城乡互联、干群互系、村组互包”的新型“宾弄赛嗨”故事。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心向北京、拥护核心”主题实践活动。

（三）各族群众共同迈向现代化步伐更加稳健的“全国示范区”

云南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主题。各族群众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全国示范区”就是把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切实提高民族地区发展质量的民生成色，推进对外开放前沿省、高质量发展省、生态环境最美省、乡村振兴样板省建设。

1.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云南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生态为鲜明底色，要在重点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要聚焦产业强省，推进“两型三化”和打好“三张牌”，发展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新材料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八大产业”。以改革创新为第一动力，以产业建设为主攻方向，加快烟草、茶叶、鲜切花、咖啡、中草药、畜牧业等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通过产业集群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2. 切实提高民族地区发展质量和成色。边境兴则云南兴、边民富则边防固。2023年，云南边境八个州市，除红河州2889.42亿元位列第三（GDP总量占全省30021亿元的9.6%），其他边境州市排位都靠后，占全省GDP总量均在2%—5%之间，怒江州仅占到0.8%，德宏州受疫情影响逐步恢复。此外，在基础设施、教育科技、产业发展、边境贸易等方面均存在较多短板。如云南省的25个边境县（市）中，仅有9个通高速公路，还有3.33%的自然村不通公路，8.87%的自然村未通自来水；16个“直过民族”中的劳动力的文盲率接近10%；边疆群众内迁趋势明显，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①。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开展374个沿边行政村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形成产业支撑、文旅融合、生态宜居、边贸助推、睦邻友好5种类型，筑起了一道“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现代化边境小康村，成为富边的样板、稳边的示范、守边的屏障。

（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更加紧密的“全国示范区”

云南历史文化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根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国示范区”就是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讲好各民族做得了隔壁邻居、搭得起亲家、结得起美好姻缘的故事，推进共同体意识模范省、民族文化繁荣省建设。

^① 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发展报告（2020—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9—51页。

1.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① 茶马古道蜿蜒于川、滇、藏崇山峻岭之间，以茶为媒，茶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使者，沿途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汉、藏、白、回、彝、纳西、普米、傈僳等多民族，茶马古道是沟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维护民族团结和谐的文化对话。茶马古道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而且为沿线各民族和谐共生、精诚团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民族团结一家亲。长期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云南秉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理念，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云南现象”“云南经验”。各民族语言互通、习俗互通、婚姻互通、文化互通是傣乡大地上“民族一家亲”典范。各民族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郑家庄各民族相互通婚占60%，有的家庭甚至由3个不同的民族组成。人们经常发现：在郑家庄，白族大嫂出门买菜时总是问一下藏族阿妈需不需要捎点什么，彝族老爹在湿地公园边喝茶闲谈边帮看着学步车里的纳西族小孩，傈僳族大哥送小孩上学时顺便把隔壁家上小学的傣族小姑娘一起送到学校……在云南，像郑家庄民族一家亲的故事随处可见，描绘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美丽画卷。

（五）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的“全国示范区”

云南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构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动力和保障。提升民族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全国示范区”就是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创造良性秩序和发展活力，推进良法善治阳光省、和谐稳定平安省建设。

1.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式”立法工作，在新制定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中，充分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要求，推动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合法权益。加强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始终坚持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广泛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引导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遵规守法。

2.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高民族宗教事务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民族事务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共治机制、协同响应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过抓党建促强边固防、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产业发展、促民族团结的“党建+”，开展“守边有我、请党放心”等主题党日活动，“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德治、法治、基层自治的“三治合一”；强化“五级书记抓边防”，用好“智慧边境”等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跨境非法活动，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加强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研判及引导处置，切实维护生态安全，加强生态护林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928/c1024-31377932.html>，2023年4月15日。

员队伍建设，发动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

五、思考与结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不论是全国还是云南民族工作都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将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云南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强边固防、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润滇”行动、数字云南建设、打造“三张牌”等结合起来，融入全省发展战略。着力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经验和云南模式，力争做到“立足云南创经验，面向全国做示范”^①。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是民族团结，关键是发展进步提升实力，目标是示范引领。2035年，云南要全面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不仅为全国民族“八省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供有益参考，而且也要成为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成功实践的重要窗口。

因此，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紧扣“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和核心要义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从共筑思想根基、共建美丽家园、共守民族团结、共创善治良序、共护边疆安宁等层面全面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任务，秉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的理念，按照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的总要求，突出创建主题，把握创建方向，深化创建内涵，丰富创建形式，扩大参与范围，提升创建水平，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创建基础和创建优势，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拉玛·兴高：《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社会主义论坛》2022年第7期，第4—6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古滇文明价值探析

薛昊, 陶佳娜, 贾莉莉

摘要: 云南古滇国文化是西南地区的重要早期文明之一, 其从先秦至秦汉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其与周边及中原内地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实。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古滇国文明史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规律, 揭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同构性规律, 展现了大一统政治秩序、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和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效应等历史启示, 是新时代讲好西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故事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逻辑由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的区域性史证案例。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滇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4) 03-0076-07

古滇国文明史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之一, 对于了解西南地区早期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界已有较多研究, 但总体上看多聚力于单纯的考古研究和区域民族史研究等领域, 而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维度的研究尚较为匮乏。笔者以为, 古滇国文明史的历史研究还应着眼于上述维度, 基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视域展开, 从文明探源视角将其纳入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更深层次学术和现实场域。

对于考古与早期文明历史文化遗址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给予高度评价, 曾多次指出, 当代考古与历史学研究肩负着引领中华文明探源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使命。例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①。此后, 在2023年7月参观四川成都三星堆考古文化遗址时,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②。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讲话, 为我们立足于新时代更好研究和解读同样作为西南早期

作者简介: 薛昊, 博士,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陶佳娜,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贾莉莉,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习近平: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2020年11月30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30/c_1126803588.htm, 2024年7月20日。

②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 三星堆考古的新故事》, 2023年7月26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472419492150218&wfr=spider&for=pc>, 2024年7月20日。

文明的古滇国文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整个中华民族史、国家文明史、边疆经略史来看，古滇国文明无疑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大考古文化代表之一，更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宣传阐释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2022年，国家文物局先后将古滇国河泊所考古遗址列为“考古中国”四大重要发现之一，并将其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公园遗址名单。这无疑是对古滇国等西南地区早期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地位的高度肯定。因此，研究好古滇国文明，从其形成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窥探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规律，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度探析其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古滇国文明概述

古滇国文明是起源于我国西南云贵高原地区的重要早期文明之一，其灿烂的考古文化折射了历史上这一文明的繁盛，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区域性形成发展轨迹。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考古发掘的展开和学界研究的深入，尘封千年的古滇国文明得以逐渐向世人展现其璀璨的文明面貌。现依据目前学界共识，从纵向历时性维度对其概况予以阐述。

对古滇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具体时限，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看普遍认为古滇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此后延续至汉代^①。例如，云南省民族史学家、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汪宁生先生便持此种观点，他指出滇国文化起止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1世纪^②。

在形成系列考古发掘成果之前，关于古滇国文明只有相关历史文献有部分记载，始于西汉时期汉武帝赐滇王金印，令其复长其民的历史掌故。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对古滇国及其疆域有较为丰富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滇小邑，最宠焉。”^③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和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土，使得历史上古滇国文明的面貌进一步清晰。据云南省考古学家李昆声先生研究，古滇国的考古文化遗存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今云南中东部地区，其中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是古滇国考古文化遗址的核心区^④。在这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与古滇国文明相关的文物与遗存。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亲族墓地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汉王朝颁赐金质“滇王之印”^⑤。这一重要文物的出现充分印证了汉代史籍中所载古滇国的存在，而随之出土的一系列青铜器、陶器、金器等文物也逐渐将历史尘封已久的古滇国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

此后，古滇国历史遗存的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成果，其不同类型器物的型制和艺术风格在充分展现古滇国文明的同时，亦呈现了中华民族在形成早期多元起源、交流融合的历史特征，为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增添了有力的区域性历史证据，是当前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着眼，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区域性历史文化遗迹。

①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

② 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载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28—329页。

③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1—2997页。

④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五十年》，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2页。

⑤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143页。

二、古滇文明与周边及中原内地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民族实体的发展视角看，古滇国文明的系列历史遗存和考古成果反映了古滇人的民族属系及其与周边和中原内地人群之间源远流长且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实。应当看到，尽管古滇国见诸于史籍文献乃是西汉时期，但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成果看，其与周边西南地区和中原内地的交流很可能要早于汉代，其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亦是一部与周边及中原内地文化相互吸收文化特质、不断交融汇聚的历史。

就民族属系来看，关于古滇人的族源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早期相对缺乏考古依据的时期，很多学者对古滇人的族属源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多将其与我国历史文献上西南广大地区曾出现的一系列人群相联系，其中典型的有“夔人说”“羌人说”“百濮说”“楚人说”和“百越说”等不同观点。但随着相关考古成果的出土，民族史学界关于古滇人族属源流的论争逐渐形成一定的共识，即古滇人中的主体应当属于历史上的“百越系民族”，而其中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便是张增祺、李昆声两位学者的观点。两位学者根据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一系列考古成果，特别是从其中占据主体且器物特征鲜明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镞，以及越民族特有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特质来看，古滇人中占据主体的应当是历史上的百越系统民族^①，这是当前民族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普遍共识。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学界当前普遍认为越文化是古滇国文明的主体，但古滇国历史遗址考古形成的一系列成果却鲜明地折射出滇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多元交融的特征，这在考古文化和系列出土器物型制上有鲜明的体现，说明早期先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活动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

关于古滇国早期历史的史籍文献记载相对匮乏，这使得我们难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全面描述古滇国文明与周边和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但结合相关考古文化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古滇国的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群与周边乃至中原内地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联系。据长期从事西南民族史、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著名民族史学家、云南大学特聘教授王文光先生主编的《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一书记载和梳理，古滇国文化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有很多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痕迹。例如，“石寨山型铜鼓便是古滇文化向外发展、对外交流的最好例证。川南、黔西北、桂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均发现了石寨山型铜鼓，这些形成了该文化的对外辐射圈”^②。除此之外，古滇国文化还呈现出吸收了部分西南古蜀文化和中原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土的戈、尊、钟等器物在型制上显示，古滇国文化与中原内地的殷商末期和周代初期、战国时期以及西汉时期同类器物具有相似性。例如，出土的戈等兵器在型制上留存有“中有圆孔”，无“胡”，以及呈现出类似殷商末期鬃鬃纹等文化特质的痕迹。再例如，殷末周初盛行的酒具“尊”等器物同样在古滇国遗址考古中曾有发掘。而同时期中原地区汉代出现的铜镜、带钩、薰炉等类型器物在古滇国考古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此外，四川地区的古蜀文化对古滇文化也有影响。例如，古滇文化考古遗址出土的节杖、青铜剑等器物都呈现出与古蜀文化的深厚渊源。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人物中，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各种形式，与三星堆青铜雕像人物不乏某些共同之处。此外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短柄节杖等，其在型制上和西南古蜀文明有很大的相似性，呈现出上

^①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148页。

^②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150页。

述西南早期文明之间的某种交流联系^①。

而到了西汉时期，伴随着古滇国纳入大一统国家，以及其与周边和中原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愈发深入广泛，关于古滇国的文字性记载也逐渐增多。相关史籍和系列出土文物则相较先秦时期更为全面地为我们勾勒了古滇国文明的面貌，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维度予以阐述。

从政治维度看，自滇王内附之后，西汉中央王朝的治理体系便深入到了滇中腹地。西汉王朝充分考虑到西南地区地理遥远、民族情况复杂的实际，采取了较为务实灵活且具有弹性的多元化政治制度，即在建立直属中央王朝的郡县制之外，亦承认滇王的统治，授予其封号，确认其封国地位，实行羁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较好地调适和平衡了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郡县制确保了古滇国所处益州郡对中央王朝的隶属和国家的统一，滇王复长其民的羁縻制度又兼顾了管理边疆民族的适应性。而这一富有特色的制度体系也在出土的系列文物中得到印证。例如在晋宁石寨山、河泊所等考古遗址中曾出土有闻名学界的“滇国三印”，即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三枚印章封泥，充分反映了国家统一和民族交流融合的史实。据民族考古学家李东红考证，滇王由朝廷封赐、滇相由朝廷任命，益州郡太守是朝廷命官，滇国等属国均处其治下。此外还有多枚汉代的官私印章封泥被发现。^② 上述考古成果充分展现了古代大一统政治秩序在西南边地的延伸，彰显了汉代以降古滇国在政治维度上与中央王朝的紧密联系，大一统国家的架构在西南边地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和体系的完善，古滇国文明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维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当前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专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已对晋宁石寨山等古滇国历史文化遗址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发掘，其出土的诸如瓦当、简牍、印章封泥等无不展现出纳入大一统国家后中原内地文化与滇国文化的深度交融。

一是大量出土有汉字标识的各类官私印章封泥，显示了汉代以降随着中原内地行政制度在古滇国故地的建立，中原印信制度文化开始在西南边地生根。同时，汉文印章封泥的出土亦折射了当时中原内地汉字文化系统在边疆地区的推广和普及，展现了中原内地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二是出土了汉代内地型制的建筑瓦当。这一考古发现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从现有考古发掘出的瓦当等建筑材料型制来看，汉代中原内地风格款式的瓦当在当地已经有大量生产。同时，从建筑遗址考古来看，古滇国官署行政遗址的布局亦呈现出与同时期中原内地的相似性。例如，其官署对应有宽敞的官道，两旁建筑布局规整，折射了内地建筑文化对古滇国的晕染。三是系列汉代益州郡设立后的行政、司法简牍文物，乃至《论语》等儒家经典。发掘出的司法简牍残片经专家整理释读后发现，相当一部分残片所载内容已经显示出汉代以降古滇国地区内地司法体系的引入^③。

上述文物充分展现了滇国纳入大一统国家之后，滇文化与中原内地汉文化的深度交融，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促进，以及二者相生相伴、同构发展的历史逻辑。

①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151页。

② 李东红、陈丽媛：《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载昆明市晋宁区文旅局主办刊物《石寨山》2023年上半年刊（总第48期），第39—40页。

③ 参见蒋志龙：《古滇国考古重大突破——实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进程》，载昆明市晋宁区文旅局主办刊物《石寨山》2022年下半年刊（总第47期）；蒋志龙、李天虹、雷海龙：《汉代治理西南边地的文献见证河泊所简牍释读取得初步进展》，载昆明市晋宁区文旅局主办刊物《石寨山》2023年上半年刊（总第48期）。

考古文物的相似与特质实则折射了相关考古文化所对应人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古代先民之间的密切交流方才促进了上述多地考古文化上的深厚联系。因此，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当代价值维度来看，古滇国文化考古成果无疑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所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交融汇聚的历史^①，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不息的历史规律。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视域下古滇国文明融入中华文明的价值启示

古滇国文明融入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现实观照，对于新时代讲好民族团结进步历史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是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阐发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一是古滇国文明史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交往交流交融汇聚而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规律，这是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和深刻阐发的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生相伴。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共同开创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文明。因此，秉持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古滇国文明发展史来看，不论是在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时期，古滇国文明都具有多元交融的显著特征，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及中原内地的文化都有密切的交流联系，并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上述地区的文化特质，折射出古滇国人群自古以来即与周边乃至中原内地的人群及其文明之间建立了相应的互动，尽管部分交流联系和文化传播可能存在间接性，但这足以说明中华大地各早期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历史规律。古滇国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对周边及中原内地文化的吸收借鉴，而古滇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也对周边地区及其人群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到了汉代，中原内地汉文化符号的显著增加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史实。从国家发展史来看，古滇国文明则诠释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体两面的同构性特征。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应当看到二者在长时段的历史互动中存在相互促进的同构性逻辑。以古滇国文明发展来看，先秦时期古滇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此后西汉王朝了解到西南各民族的情况，以及进行实质性经略开拓营造了前期条件，而西汉王朝降服滇王并将之纳入郡县体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建活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古滇国乃至整个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古滇国亦由此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维度看，古滇国文明展现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共同开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刻历史哲学逻辑。从当代来看，这一历史故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包容，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启示。

二是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融合，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汉代以降，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西南边疆时都在政治制度上保持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传统，并将这一边疆治理的政治智慧传承延续下来。汉代的羁縻制度便是典型代表，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了直隶中央的郡县制，同时又设立了照顾边疆民族具体情况的封国制度。各少数民族政权以封国的形式存续，但均统一纳入汉中央王朝所设的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19页。

郡县治下，在保障中央王朝权威和国家大一统秩序的前提下，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的灵活性与弹性观照。而古滇国的文明史亦折射了维护统一、保障中央政令畅通与促进边疆民族发展之间的辩证性逻辑规律。例如，前述所谈到的西汉时期滇国政治制度便折射了这一历史智慧。一方面考虑到西南边疆地区民族情况复杂的实际，滇王内附后仍保持了其在中央王朝藩属的地位，但更应当看到的是，这一具有边疆特色的灵活的羁縻制度是建立在滇国完全纳入大一统国家政治秩序前提之上的。滇国及周边的部分地方民族政权均处于中央王朝所属郡县的统一管辖之下，听命于汉中央王朝。除此之外，汉廷向滇国派出隶属于中央王朝的滇相执掌滇国实权的制度也保障了羁縻制度与大一统国家的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滇国属民方才保持了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促成了西南边疆整合到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智慧在后世历代王朝边疆经略中的传承使得西南边疆的整合不断深入，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不断得到巩固，这一历史智慧在当代的边疆民族治理与制度建设也有相应的价值启示。

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是重要前提，亦是上述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启迪。正确理解和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当前做好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前提便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唯有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能富有生机活力。

三是各族人民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汇聚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厚基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亦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前提。古滇国文明史融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便充分印证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到，滇国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具有多维度的整合，除却滇王内附后汉廷实质性建立郡县治理体系的政治维度外，民族实体维度的整合同样值得关注。从前述一系列考古发掘及其成果来看，伴随着纳入大一统国家的进程，古滇国及其属民在文化特质上有了显著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原内地的汉文化持续向西南边疆传播，古滇国在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等器物层面，以及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都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由此反映了这一时期各族民众之间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亦正是如此，古滇国文化融入了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之中，而其版图亦完全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有鉴于上述历史价值启示，立足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度，必须旗帜鲜明地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基础。

四是思想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交融汇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纽带作用。思想文化作为维系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不能忽视的一环，是塑造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古滇国文明的考古发掘成果亦揭示了类似的历史智慧。例如前述曾谈到，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古滇国考古遗址曾出土有《论语》等简牍残片，反映了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在当时当地的传播^①。思想文化具有深厚的塑造效应，对于民族群体的认同具有整合凝聚效用。应当看到，古滇国属地儒学文化的传播无疑是促成其属民文化特质变迁，以及增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精神文化纽带。因此，在新时代铸牢

^① 参见蒋志龙：《古滇国考古重大突破——实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进程》，载昆明市晋宁区文旅局主办刊物《石寨山》2022年下半年刊（总第47期）；蒋志龙、李天虹、雷海龙：《汉代治理西南边地的文献见证河泊所简牍释读取得初步进展》，载昆明市晋宁区文旅局主办刊物《石寨山》2023年上半年刊（总第48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下，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挖掘整理民族团结进步相关历史文化资源，阐述相应价值逻辑，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从古滇国文明史的价值启示来看，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和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大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四、结语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深刻论断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针，更是引领我们审视中华民族发展史、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历史哲学指引。

古滇国文明史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区域性形成发展，鲜活讲述了统一多民族中国不断交融汇聚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古滇文明史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规律，是新时代讲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的区域性史证案例。立足于古滇国文明的历史思考，可以看到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增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2024年9月27日。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 贫困文化的消解研究

陆姝彤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对于推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至关重要。贫困文化的消解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巩固脱贫攻坚时期仍然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具有显著作用。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贫困文化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结构和发展深远影响，凸显出贫困文化消解的紧迫性，并阐明了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强化文化认同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深化、促进民族互融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结构建设、教育与文化赋能促进贫困文化的消解以及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公平与社会发展等系统性实践路径，旨在激发相对落后地区的内生动力，通过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大规模返贫，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文化繁荣，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贫困文化；文化认同；乡村振兴；文化赋能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83-08

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①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是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根本遵循，也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既体现出对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追求，也更深层次地触及贫困文化的消解。

在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②；这一思路在202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延续，会议着重强调要“增强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③，显示出从精神维度消解贫困文化、激活内源动能，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这一层面来看，贫困文化的消解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社会和谐与民族繁荣，为实现全面共同富

基金项目：2023—2024年度全区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的消解研究”（GXSYXTLX202317）。

作者简介：陆姝彤，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学报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乡村振兴。

① 《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人民日报》2023年8月27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③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1日，第1版。

裕的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作为贫困成因的贫困文化

文化在社会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贫困文化的消解来看民族工作问题,能够为欠发达地区参与构建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贫困成因的多维视角与贫困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贫困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其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促使着众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找到更为全面和有效的解决策略。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理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贫困的成因,多认为是因制度的不平等或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导致了贫困。这类理论各有侧重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相关研究结果局限于经济领域,反过来揭示出单一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援助对贫困的消除是不可持续的。贫困的出现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根源于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另一部分学者尝试使用社会学等非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贫困问题,当中就包括“贫困文化理论、贫困的功能主义理论和贫困的冲突理论”^①。在20世纪末期结构主义转向文化主义的解释中,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最先由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他通过对墨西哥贫困家庭的田野调查,描述了城乡不同群体与个体的差异化生活方式,首次提出了一种超越区域的、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贫困文化^②。贫困文化是指贫困人口具有其群体的独特社会行为与人际关系结构,且在社会结构、心理定势、文化价值观、消费模式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独特性,这些表现构成了贫困人口产生与社会主流文化脱节的独特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一种具有群体默认与代际传承特质的文化范式。对家庭成员来说,贫困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既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也是自成一体亚文化^③。

国内学术界关于贫困文化的研究趋向,多从比较研究的层面进行,不仅有丰富可见的描述性经验,更有理论上的深入分析^④。有学者一反刘易斯受人诟病的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所具有的更为内在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人民往往忽视了这层联系的存在,以及这种联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的含义。”^⑤与国外学者不同,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贫困文化不是农民自身的选择,更不是一种反文化,而是社会的产物^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贫困文化,虽然其曾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农耕文明时期)具有合理性,但从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还是阻碍大于推动。

(二) 贫困文化的多维度特征及其对社会结构与发展的深层影响

要探讨贫困文化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潜在羁绊,首先需要深入剖析其特有属性。学界普遍认为,贫困文化深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与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其蕴含的价值观和心理模式往往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结构不平等是贫困文化形成的根源。贫困文化通常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形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些群体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和资源获取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刚性限制

①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消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49—63页。

② Lewis Oscar,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4 (1966), pp. 19 - 25.

③ [美]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④ 方清云:《民族乡贫困文化自觉——以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为例》,广州: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4页。

⑤ 吴理财:《论贫困文化:上》,《社会》2001年第8期,第17—20页。

⑥ 王兆萍:《解读贫困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第173—176页。

了教育、医疗和就业的发展，进而影响社会流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状况的持续和代际传递。在这种结构下，个体和群体往往发展出适应性行为和价值观念，以应对期望落差和社会机遇的不平等。

2. 相对贫困群体的消极心理定势与防御机制。相对贫困环境中的人们往往采取心理防御机制应对困难，如可能拒绝承认贫困或寻找理由解释困境，以减少心理负担。同时，通过沉迷某些爱好或紧密联系同样处境的人群以寻求慰藉和归属感。这些防御方式有助于他们将贫困影响与个人价值分离，保护自我形象，并可能展现出过分强调尊严、独立等与贫困相对的特质，作为抵抗手段。

3. 文化价值观差异导致脱贫动力不足。贫困文化的独特性常与主流价值取向形成对比，并可能削弱个体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具体体现在对即时满足的偏好大于对教育和长远规划的投资；在长期逆境中形成的生存策略，促成了对传统的坚守，相较于探索未知和接纳新鲜事物，更趋向于维持现状；文化环境的相对封闭限制了其与外界的互动，使得文化传承偏向保守，缺乏创新活力。此外，一些地区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和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加之家庭结构的多元化，不仅促进了社区内部的相互扶持，也反映了贫困文化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互动模式中嵌入并表现出其独特性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状况的持续。

4. 生存导向消费模式体现资源稀缺心态。贫困文化中的经济行为和消费模式显示出明显的生存导向性，强调即时且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如频繁的小额交易、长期循环使用物品的习惯等。这些行为反映出即便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人们仍保留着深刻的资源稀缺思维。同时，消费行为趋向于强调非市场经济逻辑，如注重对人情往来、宗教仪式、节庆活动及祖先祭祀等传统仪式性消费的投资。这类遵循传统文化导向的支出不仅消耗了家庭有限的财务资源，还可能抑制家庭将资金投入生产性活动以实现长期生计改善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固化现象。

5. 社会参与度低下延缓乡村发展进程。在贫困文化背景下，个体倾向于减少社会参与，表现为回避政治活动、村集体事务及融入社会组织，对公共领域的贡献度不高。这种对外界的消极态度，不仅抑制了他们改变命运的积极性与创新动力，还削弱了其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热情与投入，进而拖延了乡村经济社会进步的步伐，降低了发展项目的实效性和村民整体福祉的提升。

（三）贫困文化制约与社会发展潜力的激发

发展是社会全方位进步的综合体现，任何单一要素的缺失都可能成为制约整体发展的瓶颈，从而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社会的发展实力是指通过人的素质、科技和教育、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文化的创新能力等要素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核心是人的素质状况。因此，在评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时，不应只关注物质基础和经济指标，还应重视人文因素和精神力量。通过提升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稳固的支撑和深远的影响。

贫困与发展的問題，本质上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是一个嵌入复杂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中的综合性挑战。要充分认识到贫困文化的多维性，将其视为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性议题进行考量。一般而言，主体自觉的程度越高，其对社会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就越明显，越能促进社会发展。通过发展的眼光来剖析较为滞后农村区域的现况，可以发现其往往更加显著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变迁的顺应及被动适应的特征。作为社会动态演化大背景下的组成部分，迫切需要提升这些区域主体的自我赋能认知与实践创新能力，这是推动其转型成长的核心要务。

在此背景下，推进相对贫困区域综合性发展进程的关键一环，在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认同。此过程既是文化与心理的融合，更是策略性构建，旨在通过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

价值观念及发展目标,提升区域内民众的集体意识与使命感。这不仅促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与资源的有效整合,还有助于激励相关主体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科学理性地认识自然规律与社会变迁趋势,从内在激发相对贫困地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其实现由被动响应向主动规划与执行的质变,推动相对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步入更自主、可持续的轨道。

(四) 消解贫困文化的紧迫性

在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当下,民族地区的工作重心已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其中“心志培育”成为关键一环。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治理潜在的相对贫困现象,从根本上矫正与转化根植于部分社区的贫困文化,打破“贫困心态”的循环,扩展相对贫困人口的认知“带宽”^①,确保经济增长的红利能公平分配,从经济增长的“量变”迈向共享发展的“质变”,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内涵与时代要求。

民族地区因其特有的地理与资源条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已有研究表明,在这些区域,经济收入虽是衡量贫困的一个标准,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足、基础设施缺乏等文化与社会因素,以及民族间在减贫能力上的差异,构成了多维贫困的主因^②,凸显了文化层面在脱贫任务中的重要性。为了稳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复贫,民族地区的贫困文化消解任务尤为紧迫,它不仅牵制了个体与社区的发展步伐,也阻碍了全社会的全面进步。

因此,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消解策略的有机结合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这意味着在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通过正面引导和价值观重塑,借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深入剖析并有效干预贫困文化的消极影响,开辟文化引领的发展新路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消解的内在联系

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民族团结的关键。贫困文化的消解与此紧密相连,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

(一) 战略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贫困文化消解

2014年5月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并列为同等重要的概念。随后,在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单独强调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则正式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战略层面看,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在全社会构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目标追求,这种文化凝聚力是推动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③这一高瞻远瞩的论断,凸显了激活中华传统美德,如勤劳奋进、自强不息、诚信公正和厚德载物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指明了依托内在动力转化消极文化观念、树立自立拼搏向上的信念与决心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贫困文化的消解同属于“管脑子”范畴,二者协同并进,共同致

^① 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55—63页。

^② 毕晶晶:《基于多维识别体系的民族地区贫困测度》,《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3—28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力于社会意识的深层次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为使命，其本质是民族意识，是用以区隔内外进而获得内聚力的重要力量^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②方针，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整合与效能提升提供了方向，也明确了德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德治作为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的支柱，通过价值观引领与道德建设，强化了社会的内在凝聚力，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撑。在这一框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连接德治与贫困文化消解的关键纽带，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激发了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动能，更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运用德治思维和方法，促进社会文化深层次的革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长治久安打造坚实的思想基础，体现了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对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建设的深切关注与前瞻部署。

（二）共同体认同强化与贫困文化特征的转变

共同体认同的强化与贫困文化特征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密切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强化认同感不仅是贫困文化特征转变的催化剂，也是构建更加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1. 认同感构建与文化价值观重塑。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共同体认同的强化能够促进共享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形成，这是文化特征转变的基础。当个体感受到自己是更大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其对于传统贫困文化的依赖性和消极性更可能被集体的积极向上的氛围所取代。这种认同感的提升，有助于在相对贫困群体中树立起重视教育、积极奋斗和长远规划的价值取向，从而逐渐改变原有的文化特征。

2. 社会资本累积与积极行为激励。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规范和互惠行为是社会行动的重要资源^③。强化共同体认同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旨在通过增进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间的协作与相互支持来达成目标。这种合作可以激发相对贫困个体从被动接受援助到主动寻求发展的转变，减少依赖性，增强自我提升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推动贫困文化向自强不息、主动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文化形态转变。

3. 文化适应性与认知框架转换。贫困文化的闭塞保守往往源于信息闭塞和对外界变化的适应不足。强化共同体认同，意味着通过文化交流和知识普及打破认知壁垒，促进开放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与传播。随着共同体内部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和外部世界新知识的吸收，相对贫困群体的认知框架得以扩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而更加积极地探索脱贫路径，主动适应并利用外部资源进行自我发展。

4. 长远视角与可持续发展导向。贫困文化中的短视行为，与缺乏对未来的明确规划和信心密切相关。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教育、职业规划等途径，逐步培养相对贫困群体对个人与社区长远发展的责任感和愿景。长远视角能促使个体不再局限于眼前的生存挑战，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教育提升、技能获取等途径，为自身及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实现从短期利益追求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

^① 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面相：地位、使命与实践逻辑》，《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4—2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1月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trs=1，2024年2月17日。

^③ [美]詹姆斯·S.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消解贫困文化的互动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与贫困文化的消解相互作用，通过文化认同的深化和经济机会的均等化，共同推进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结构的优化。

1. 加强社会团结。贫困文化的消解能促进社会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共筑共享价值观念与发展目标，有效巩固了社会的凝聚力，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2. 推动平等与公正。消解贫困文化的实践确保了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关键领域的资源分配更加公正，有助于破解社会阶层固化的难题，缩减贫富差异，让各民族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追求发展，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

3. 提振文化自信。随着贫困文化的消解，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得到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得到显著提升。基于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了多元而又统一的文化格局的构建，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4. 激活内在发展动能。消解贫困文化，激励相对贫困地区依靠内部潜力寻求发展，激活了内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最终形成强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高级形态。

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解贫困文化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贫困文化的消解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互为支撑、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贫困文化根源的深刻剖析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依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需求，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唤醒民族发展的主体意识与内生潜能，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强化文化认同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深化

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一些乡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文化秩序的稳定，也对乡村社会的活力造成了影响。与此同时，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是历史积淀的生存智慧，对推动乡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挖掘和转化乡村文化资本，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还能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同时，培育积极的文化观念，转变消极的价值取向，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既能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也能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强化文化认同，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并丰富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具体而言，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构筑乡村文化新生态的理论基石，形成以深厚文化认同为联结纽带、涵盖并深入乡村社会各层面的新时代共同体模式。要强调文化治理的综合性、层次性和普遍参与性，培育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有效激活乡村内部的文化创造力与传承力，从根本上消解贫困文化，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开辟崭新的道路，从而在更深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二）促进民族互融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结构建设

社会结构建设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具有深远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结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

^①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了坚实的基础，要通过策略的全面性和创新性促进民族互融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结构建设。经济层面上，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产业升级和职业培训等，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社会政策层面上，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和社会服务的完善等，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幸福感；同时加大对心理健康与社会服务的重视，构建全面的社区关怀体系，有助于缓解社会变迁带来的心理压力，促进贫困文化的消解和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生态层面上，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绿色能源，以契合乡土文化中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价值观，不仅能深化文化认同，强化乡土情感的内在联系，还能通过提供可持续生计路径，推动乡村社会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科技层面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普及，为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动力，既能加速乡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经济融合进程，也为乡村文化与产品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总的来说，社会结构建设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在文化、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协同推进基础上，整合生态、科技与人文关怀，共同推动乡村的多维发展与和谐共生。

（三）教育+文化赋能促进贫困文化的消解

在教育赋能方面，第一，实现教育质量与资源均衡化。重点在于改善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如，实施“薄改计划”确保农村孩子享有与城市孩子平等的教育资源。通过“国培计划”加强乡村教师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同时引入智能教育平台和数字化教学工具，如“智慧课堂”等，以科技赋能教育，激发学生潜力。此外，“美丽中国”支教项目通过派遣大量的优秀青年志愿者深入偏远地区教授知识、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法，激励学生追求卓越，有助于从根源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第二，教育公平的实质推进。“两免一补”等政策，可确保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无障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立多项资助体系，通过“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减轻贫困学子的经济负担，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如“雨露计划”专门针对贫困家庭的中高职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和资金支持，助力其实现技能脱贫，走向职业发展之路。通过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生态，为贫困文化的消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教育基础。

在文化赋能方面，第一，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比上年末增加了2092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33932个，增加了1408个^①。不断增加的文化设施成为举办读书会、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的平台，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质量，未来应进一步提高文化基础设施质量。第二，文化传承与创新。在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四川通过推广其独特的川剧艺术和传统手工艺，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文化产品结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成功打入国内外市场，提升了当地村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第三，加强顶层设计。政府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扮演着引领与指导的核心角色，如《2022—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便是以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为支撑单位，通过突出培养青年农民的技能、实践转化等措施，增强相对贫困地区自身发展能力和“造血”功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带动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四）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公平与社会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该体系通过提供各种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7月13日，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tjxx/202307/t20230713_945922.html，2024年2月6日。

救助措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网。对相对贫困群体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效缓解因健康、老龄化、失业等社会风险导致的贫困问题，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1. 构建经济适应型社保体系。通过强化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关键环节，有效应对疾病、老龄化等社会风险，进而缓解由贫困引发的文化疏离与差异，推动社会公平与和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稳固的基石。这一体系要注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与可持续性，确保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减少因病致贫现象，促进社会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2. 提升社会保障标准与覆盖范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标准，使保障更加充分，如积极推进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以确保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022年，政府大力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这一措施有助于提高相对贫困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少因贫困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发展。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健康保障等措施，完善乡村人才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乡村人才管理网络，提高相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同时，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能激励个人和家庭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从而提高贫困社会整体的发展潜力。

4. 增强社会参与和志愿服务的作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社会参与的模式，不仅能有效补充公共资源的不足，还能激发民间的创造力与责任感，共同编织一张紧密的社会保障网。如“千企帮千村”计划通过企业与乡村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还引入技术与现代管理，促进了文化交融，并逐渐消解贫困文化。社会组织和公众人物发起的“爱心助学行动”通过教育援助，既能缓解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压力，更通过知识传播，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助力贫困文化的消减。

结 语

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显著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与凝聚力，同时在文化层面上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成就对国内社会和谐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其经验亦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贫困文化的消解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中国在贫困文化消解方面的进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多维性，强调了文化因素在减贫策略中的重要性。随着贫困文化特征及其影响路径的演进，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将为国际社会开启更广阔的视角，进而激发全球贫困治理的深入对话与策略创新。

责任编辑：杨松禄

茶旅融合视域下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为例

付永丽

摘要：对于云南多民族产茶地区而言，茶旅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渠道。双江县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催生民族文化盛宴、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等方面。而其逻辑机理体现在茶旅融合绽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花、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天地、构筑“同心圆”凝聚各民族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等方面。但要形成长效机制，需要从坚持以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助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乐章、以建设全国茶叶产业中心为目标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双江实践等方面入手，使民族团结之花四季绽放，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茶旅融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双江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91-06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新时代加强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要。对于云南多民族产茶地区而言，茶旅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渠道。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双江县）是世界古茶树起源地之一，勐库大雪山的万亩千年野生古树茶园为世界罕见。勐库大叶种茶栽培历史悠久，是云南大叶种茶的主要代表，曾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被全国茶树良种委员会评定为“全国优良茶种”，有“茶之味精”的美称。历经千年的生长、传承与发展，这一棵棵茶树上的一片片叶子近年来香飘天下，成为云南省“一县一业”示范茶产业和双江县富民的骨干产业。双江县因澜沧江、小黑江在县域境内交汇而得名，境内居住着汉族和23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浓郁，被称为“中国多元民族文化之乡”。当前，双江县紧抓云南省“一县一业”示范茶产业机遇，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全县现有茶园面积34.08万亩，可采摘面积26.65万亩，有机茶园认证面积13.33万亩。2023年，全县毛茶产量2.3万吨，实现综合产值88亿元、税收2277万元，茶农人均收入达1万元^①。双江茶的闻名遐迩，特别是冰岛茶的火爆和游客的纷至沓来，意味着双

作者简介：付永丽，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工商管理。

^① 杨维、王正强、严兴勇等：《茶山“披绿衣”采茶制茶忙》，《临沧日报》2024年3月26日，第1版。

江县成功探索出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子。本文分析茶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形式,梳理其内在的逻辑机理,探究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机制,以发挥茶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能。

一、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形式

(一) 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23年4月,双江县深入学习并贯彻《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做好《双江县2023—2025年“三茶统筹”发展规划》,认真开展古茶树资源调查、科学管护古茶树等,以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为抓手,在云南率先成立“三茶统筹”研究院,8月开通官方抖音平台“中国双江冰岛茶荟”直播间,将茶产业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合发展,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促进双江乃至云南、全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茶产业旅游融合凭借其深厚的品质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双江旅游业的一大亮点。各民族因茶交往交流交融,茶文化已经融入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双江茶早已成为增进双江各民族与全国、全世界其他民族彼此了解、彼此认同的“金叶子”,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有形有感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古茶树认养是双江县探索古茶树保护性采摘的新模式,全县梳理出1万棵有100年以上树龄的古茶树资源,2024年推出3000棵认养,到2026年完成认养。目前,已完成1031棵古茶树信息复核认定以及与茶农委托协议的签订工作,对部分古茶树进行视频拍摄,安装茶园物候信息监控设施^①。纳入认养的古茶树将以“采春茶,夏留养,秋打顶”的方式,实现采养结合、可持续发展,同时指导茶农科学管护好茶树,后续将健全保护和开发利用体系,做到“一树一档”“一茶一味”,让古茶树焕发新生机,让茶友共享古树茶的美好,以古茶树为媒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二) 茶旅融合催生民族文化盛宴

沿着茶旅融合的轨迹,不难发现双江以茶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盛宴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全部。拉祜族的“丁香茶”、佤族的“石板烤茶”、布朗族的“糊米香茶”、傣族的“竹筒茶”在村村寨寨飘香,采茶舞、茶叶煮土鸡、茶叶煎蛋饼等这些代代相传又被不断丰富着的歌舞礼俗鲜活灵动、历久弥新。随着茶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双江的茶文化在纷至沓来的游客心里发出耀眼的光芒。2024年4月14日,第八届“中国双江冰岛茶会”在双江县民族文化广场开幕,来自全国的茶企代表、行业专家、资深“茶友”齐聚双江,赏好山好水,品一杯好茶。茶会旨在以茶结缘、以茶论道、以茶兴业,把茶叶作为兴农富民的主导产业,聚力科技赋能、品牌建设、茶旅融合,加快茶叶全产业链价值延伸,为实现双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力量。每年一届的“中国双江冰岛茶会”通过举办溯茶源、论茶史、游茶山、观茶艺、吃茶餐等系列活动,已经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三) 民族文化盛宴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民族文化特色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沙河乡允俸村景亢自然村是一个傣族人口较多的多民族村寨,在发展甘蔗、水稻、玉米传统产业的同时,依托傣族农耕文化,打造四季不同的稻田景观,深入实施“文旅+民族团结进步”融合模式,为游客提供风景优美、风情浓

^① 金维娜、张正霖、李发良、李贞涛:《双江:千余棵古茶树有了“新主人”》,《临沧日报》2024年4月5日,第1版。

郁的旅游目的地，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和创新发展，景亢自然村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命名为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云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入选临沧市委、市政府“十大优美村寨”。景亢自然村的成功实践还带动了周边村寨的产业发展建设，绘制出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①。

茶旅融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活力，为双江带来了更多的繁荣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边疆地区的生动实践。目前，已打造荣康达乌龙茶庄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公弄布朗古茶园、秀美茶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冰岛国家2A级旅游景区，茶园成为游客体验生态休闲游、风情体验游和茶园观光游的理想场所。结合茶园基地建设，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网、厕”等旅游要素品质，以游客为中心，围绕游客关注的双江知名茶产品，着力打造冰岛茶文化之旅、古茶山国家森林公园探秘之旅、乡村民族风情体验之旅等一批茶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往观光游览。

二、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机理

（一）茶旅融合绽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花

随着双江茶的行情看涨，每年春茶季都会吸引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赴双江县务工，2024年外来务工人员创历史新高，截至4月下旬就已经突破了4万人的规模。“今年已经是我第三年到勐库镇大户赛村打工，进入茶山后村上帮助协调，我们忙完这户人家，又去帮另一户人家，有的帮助采摘春茶，有的帮助茶叶初制所加工，在春茶季的40多天里，天天有活干，每个人能赚到近6000元”来自云县爱华镇的务工人员李忠美说，每到春茶采摘季，她都和其他村民一起来双江县务工^②。双江县沙河乡陈家寨村林木苍翠、气候宜人，坐落在此的国家4A级景区荣康达乌龙茶庄园占地3000多亩，现有标准化乌龙茶园2000亩，其中1005亩已获得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的有机认证和“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是融合乌龙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茶文化休闲旅游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③。沙河乡允俸村那京自然村是一个由170多人组成的傣族聚居村落，这里青山连绵、绿林繁茂、瓜果飘香。近年来，那京自然村乘乡村振兴之春风，凭借傣家风情和山水风光，以“清廉村（居）”建设纬线，串起基层治理经线，打造具有浓郁“廉味”的乡村旅游景点，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廉动力”，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现在，那京自然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村旅游收入30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达2万余元^④。目前，双江县茶叶注册商标1590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2个、云南省著名商标3个，一个个品牌的建立，让双江茶冲破区域化，走向全国各地，吸引游客到店品鉴，形成人气^⑤。显然，双江县以茶为媒介，深入推进茶旅融合，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度交流、情感交融。

（二）茶旅融合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天地

双江县先后承办云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大众组）棋牌项目、云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术项目等多个省级赛事，举办“冰岛茶”杯云南省青少年射击射箭、校际联赛、拓展赛等系列赛事8场。其中，全国原野射箭比赛暨中国双江“冰岛茶”杯“一带一路”国际射箭邀请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94名运动员和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10个国家的25名运动员到双

① 李春林、李彤、隋鑫：《村民齐参与 傣寨绘新景》，《云南日报》2024年7月30日，第7版。

② 赵黎浩、王明世：《云南双江4万余名务工人员聚集忙采春茶》，《工人日报》2024年4月26日，第5版。

③ 王永刚、李雨桐：《绿满山乡百业兴》，《云南日报》2023年8月1日，第6版。

④ 谢进、罗英芳：《为乡村振兴注入“廉动力”》，《云南日报》2023年9月3日，第8版。

⑤ 邵云飞、金维娜、张正霖等：《全渠道运营模式助力双江茶产业可持续发展》，《临沧日报》2024年5月16日，第1版。

江县参赛,赛事经济效益进一步凸显,健康生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通过举办射弩、鸡枞陀螺、蜂桶鼓舞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参与人数逐年递增,全民健身意识普遍增强^①,更促进了各民族的沟通和互动。茶旅融合加快发展,勐库镇冰岛村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邦丙乡被评为“云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景亢自然村被评为全省最美乡愁旅游地。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深入实施,荣康达乌龙茶庄园被列为全省绿美景区标杆典型;建成省级森林乡村35个、市级示范精品森林村庄17个;“五彩澜沧江”保护发展全力推进,国家储备林项目列入市级试点县,古茶山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通过省级复核^②。此外,双江县共建成省级文明村7个、市级文明村44个,勐勐镇闷乐村、沙河乡允棒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③。2024年1—5月,双江县完成接待旅游10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4%;旅游总花费9.6亿元,同比增长23.97%^④。

(三) 构筑“同心圆”凝聚各民族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双江县老年大学把老年学员“聚起来”,把党的好政策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将党和国家的关怀带进少数民族村寨和老同志心里。民语讲师团深入挖掘红色史料,进村入户开讲20场次“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彩故事,覆盖全县6乡(镇)、2农场,他们用最亲切的民族语言带人民群众一同回顾家乡变化,忆感人瞬间、话发展变迁、晒幸福生活,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真正发乎老百姓内心。“党旗红”引领“晚霞红”,“红起来”的老年教育与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同频共振,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⑤。2024年6月,双江县“中华魂”——毛泽东崇高精神风范主题教育活动启动。“我们将把毛泽东崇高精神风范融入平时开展的思政课、语文课教学之中,让学生们诵读《毛泽东的故事》这本书,使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和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崇高精神风范,从而引领孩子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来自勐勐镇千蚌完小的教师赵正菊说^⑥。双江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为重点,以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为加持,提振人心,团结奋进,画出了最大的“同心圆”,凝聚各民族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三、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机制

(一) 坚持以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助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

双江县的一座座茶山是金山银山,一棵棵茶树是乡村振兴之树,一片片茶叶是一方百姓富裕的“金叶子”。要深刻认识实施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从加强组织领导、政策支撑和宣传引导方面,凝聚推进茶旅促进双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合力,精准谋划茶文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务实举措,持续推进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双江走深走实。以文载道,以茶铸魂,双江县要持续做好《茶宫殿——双江普洱茶记》等的宣传,从不同的角度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让每一个茶人、每一个游客在感受双江多元的民族文化和体验茶山的神奇之美中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都成为茶旅融合的贡献者,都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在景亢自然村创建的“云南省作家协会双江创作基地”,要定期不定

① 赵万清、陈建荣:《双江:建好身边“健身圈”扩大居民“幸福圈”》,《临沧日报》2024年5月17日,第3版。

② 吴成光:《双江持续推进全面深化全域改革》,《临沧日报》2024年5月21日,第1版。

③ 赵万清、杨治愚:《双江“千万工程”绘就美丽乡村新图景》,《临沧日报》2024年6月4日,第3版。

④ 查春静茹:《双江: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临沧日报》2024年7月17日,第2版。

⑤ 李巍巍:《双江:让银发教育“动起来”“火起来”“红起来”》,《临沧日报》2024年6月4日,第3版。

⑥ 陶红、陈国瑞:《双江“中华魂”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有声有色》,《临沧日报》2024年6月13日,第3版。

期邀请知名作家、影视艺术家、网络大V等深入双江开展艺术家第二居所基地采风体验活动^①，在文学、影视艺术和茶香的浸润中，向全国、全世界展示双江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茶文化自信，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茶旅融合发展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乐章

茶旅融合视域下，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江县要以游客为中心，打造茶文化体验区、古茶山研学度假区等，以此提升茶文化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把弘扬正气新风、推进移风易俗、留住淳朴民风作为抓手，传播文明理念，破除陈规陋习，为乡村振兴筑牢文明根基。要依托云南双江古茶山国家森林公园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古茶山国家森林公园，充分展现古茶山森林公园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集保护、管理、宣教、展示、游憩、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高水平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基地，让旅游者不仅能够充分体验茶山的壮阔，而且可以尽情享受养眼洗肺的惬意。目前，双江县拥有各类森林景点100余处，休闲步道20条98公里，生态旅游产品种类逐步增加，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农宿、森林农家、土特产自营店等相关产业600余户^②。毫无疑问，当自然之美遇见悠闲时光，必将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乐章。

（三）以建设全国茶叶产业中心为目标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双江实践

茶叶是双江县的重点产业，事关农民增收、企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建设全国茶叶产业中心为目标，构建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茶生态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茶产业体系，打造全域绿色有机生态茶园。要充分发挥勐库20万亩茶园资源优势，加强茶科技成果的转化利用，加快勐库大叶种茶加工园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双江篇章。要建立健全古茶树保护机制，规范古茶树资源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深入挖掘双江茶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因地制宜探索打造各具特色的茶旅融合发展精品，为云南茶旅融合发展提供双江样本^③。要继续举办好“中国双江冰岛茶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加快建设“茶产业双江”，让茶叶不仅仅发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纽带作用，更要成为增进双江各民族与全国、全世界其他民族彼此了解、彼此认同的重要媒介，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要紧紧围绕“青年创业兴乡”三年行动计划，出台相关政策，搭建创业桥梁，构筑平台服务，吸引更多的青年创业者、应届大学生投身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积极培养茶产业类、食品加工类、生物药业类、民族文化类等方面的青年创业者和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彰显特色、延续乡愁的美丽家园。

四、结语

双江县是全国最美茶乡、全国茶产业百强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县、云南省“一县一业”茶产业示范创建县、云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双江茶是“世界古茶树原乡第一标志地”“中国国土古茶树种质基因宝库”的原产地等等，这一块块金字招牌的背后，双江茶的历史内涵、经济价值和文化魅力是最有力的支撑。早在民国时期，双江茶就以“味美色鲜”享誉四方，不仅“维系着双江数万人的生活，也支持着云南政府数万元的税收”^④。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具有明显地域特性和独特品质的双江勐库大叶种茶两次被全国茶树良种委员会审定“全国优良茶

① 赵淑萍：《丰富内涵 聚力打造高辨识度旅游IP》，《云南日报》2024年6月18日，第5版。

② 郑云清、陈登彩：《双江推动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临沧日报》2024年6月28日，第2版。

③ 吴明美、王宏斌：《打造茶旅融合发展的临沧样本》，《临沧日报》2024年7月12日，第1版。

④ 彭桂萼：《双江的茶业》，《西南边疆》1939年第5期，第64—69页。

种”，有“茶之味精”的美称，被茶界专家誉为“云南大叶种茶的正宗”^①。而今，双江县的一座座茶山是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一棵棵古茶树是与生俱来的摇钱树，一片片茶叶是共同富裕的黄金叶。随着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工作开启，“勐库大叶种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每年产茶季节特别是春茶季，双江县各茶山、茶叶门店和茶厂，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客商、茶叶爱好者和游客，他们争相购买自己喜爱和看好的茶叶。不难发现，茶产业遍布于双江县的各个乡镇、各个角落，茶文化与双江各民族水乳交融，茶旅融合有形有感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四季绽放。

双江县充分挖掘茶资源禀赋，深入实施云南省“一县一业”茶叶产业示范县创建工作。凭借冰岛茶入选“中华国茶名片”，“勐库大叶种茶公共品牌标志”^②成功发布的春风，双江县全力推进茶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双江茶园已经成为游客茶园观光、生态休闲体验、民族风情感受的理想场所。通过以茶产业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茶产业发展，持续擦亮“一品冰岛 茶香双江”品牌，为旅游注入新内涵，实现茶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与茶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双江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茶旅融合催生民族文化盛宴，进而激发出乡村振兴新动能，是双江县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形式，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茶旅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机理来说，主要体现在茶旅融合绽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花、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天地和构筑“同心圆”凝聚各民族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等方面。茶旅融合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衔接与有机联系，不仅能发挥茶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能，也搭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以夯实茶旅融合发展基础助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乐章，以建设全国茶叶产业中心为目标，书写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双江实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刀玉龙：《以“三茶统筹”推动双江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2024年第6期，第55—59页。

② 王宏志、殷重阳：《双江茶旅融合绘新卷》，《临沧日报》2024年8月14日，第1版。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与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罗洪启

摘要：党内法规发布的规范性关乎其识别度，党内法规的公开程度影响其权威性和执行力。目前，地方党内法规的发布存在发布形式不规范、发布标题注不完整、发布渠道不固定、发布文本不统一等问题；地方党内法规的公开存在公开比例不高、不透明，缺乏权威固定的网络查询渠道和极少编辑整理公开出版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推动地方党内法规公开，以党内法规公开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规范化。

关键词：地方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发布；党内法规公开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097-09

党内法规的发布与公开是两个关系紧密但内涵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党内法规的发布，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下文简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的党内法规制定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将经审议批准后的党内法规按照规定报批后对外发布的过程；党内法规的公开则指“将党内法规文本及制定过程向党的成员乃至社会公众公开，包括从制定规划、计划到调研起草再到审批和发布的各个环节，以及各阶段的成果和信息对外公开”^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地方党内法规文本层面的公开，党内法规制定过程的公开暂不涉及，故下文“党内法规公开”均特指“党内法规文本的公开”。

党内法规公开以党内法规发布为前提，但党内法规发布不等于公开。《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规定了“公开发布”与“不公开发布”两种发布形式：党内法规以公开发布为原则，但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的党内法规可以不公开发布。因此，只有公开发布的党内法规才意味着公开；不公开发布的党内法规虽然已按规定程序发布，但只在特定范围内公开，并不意味着向社会公开。而国家法则不存在这种区别，所有的国家法都必须公开才能施行，因此，国家法的公布就等于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化建设，重视党内法规发布的规范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的发布形式、发布内容与发布渠道均

作者简介：罗洪启，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党内法规、纪检监察与中国法制史。

^① 蔡金荣、沈在蓉：《论党内法规公开》，《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7期，第27页。

作出了明确规定。相较而言,“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①发布的规范性较强,公开程度亦较高;而地方党内法规发布的规范性不足,公开程度亦较低。因此,有必要对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与公开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此问题,对于提高地方党内法规辨识度,促进地方党内法规公开,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与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规范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推动地方党内法规公开的重要意义

(一) 规范党内法规发布有利于提高其辨识度

根据《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党内法规的名称有“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七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可以使用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的名称”。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党内法规名称都具有“中国共产党”字样,而“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也并非党内法规之专名,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均可以“条例”为名,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均可以“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为名。党内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同样也可以“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为名。可见,仅凭文件名称并不能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区别开来。因此,唯有通过规范其发布形式,才能凸显党内法规自身的特性。如果不注重党内法规发布的规范性,党内法规就会淹没于各种各样的规范性文件之中,缺乏辨识度,不利于提升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二) 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提高其权威性和执行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要坚持以上率下,从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做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带头尊规学规守规用规”;为增强党内法规执行力,2019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而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以党内法规公开为前提;如果党内法规不公开,党员干部连党内法规的内容都不清楚,就谈不上如何遵守和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也很难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推动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遵守党内法规的纪律规矩意识,有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三) 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不仅是根本的政治原则,也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正是党内法规的两大功能之一。因此,党内法规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

^① 根据《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规定,“中央党内法规”特指的是由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不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但本文中的“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概念则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此概念与《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的“中央党内法规”内涵与外延都不一样,使用此概念主要是为了和地方党委制定的“地方党内法规”相区分。

党中央制定（修订）了多部党领导经济、社会、人才、法治等各方面的党内法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领导法规”便是党内法规“1+4”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发布，进一步促进了党的领导的规范化。因此，推动党内法规公开，使党的领导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四）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推动党的建设规范化

党内法规既规范党的领导活动，也规范党的自身建设。对于一个拥有9900多万党员的大党而言，管党治党既不可能寄希望于“人治”，更不能靠“运动之治”，只能依规治党，走改革和制度建党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重大政治论断，这里的“法度”，主要指的就是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依据的党内法规，当然应以公开为原则，如果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不公开，党员干部想学纪、知纪却不知学什么、知什么，自然也就做不到明纪、守纪。因此，推动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规范体系，促进党的建设规范化。

（五）党内法规公开有利于党内法规研究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内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相关论文、论著大量发表出版，“党内法规”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学界有关党内法规的研究，绝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关于地方党内法规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之所以如此，与地方党内法规公开程度不高有直接关系。由于许多地方党内法规都不公开，党内法规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知道地方党内法规的整体情况与具体内容，无法分析研究其立规内容、立规技术、立规特点与立规理念，研究自然无法深入。因此，推动党内法规公开，对于深化党内法规研究、提升党内法规研究的理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与公开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党内法规发布不够规范，辨识度不高

国家法有统一的公布形式与公布渠道，不同位阶的法具有不同的法定公布形式和公布渠道，而且法与规范性文件的公布形式存在清晰界限。因此，具有一定立法法知识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法的公布形式来准确判断其性质与效力位阶。《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对党内法规的发布形式、发布要素和发布渠道有明确规定，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发布相对规范，但地方党内法规的发布却存在发布形式缺乏辨识度、发布题注不规范和发布渠道不固定、没有标准文本等问题，不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辨识度。

1.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形式缺乏辨识度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采用党委文件或者党委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布。”可见，“党委文件”和“党委办公厅文件”是地方党内法规的法定发布形式。实践中，地方党内法规一般都是以“××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的形式发布，因发布主体的不同，具体又可以分为四种：省（市）委文件、省（市）委办公厅文件、省（市）委省（市）政府联发文件、省（市）委办公厅省（市）政府办公联发文件，其中后两种文件既属于党内法规，也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但问题在于，不属于党内法规的其他

党内规范性文件大体上也以类似的方式发布,两者的发布形式并没有明显区别。党内法规的发布形式缺乏辨识度,致使党内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与效力没有本质区别,不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与执行力。

2.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的题注不规范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发布时,党内法规标题应当添加题注,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发布日期。”党内法规标题题注一般由党内法规的审议批准时间、审议批准机关和会议、发布时间和发布机关等要素构成,对党内法规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作用。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的题目较为规范,如2023年12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标题题注为“200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2023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订2023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就非常完整、规范。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收录的中央党内法规题注都比较规范,其他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一般至少会注明制定机关和印发时间。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时标题题注的规范性则不够强。禹竹蕊、奉卓通过对“北大法宝”收录的省级党委制定的149部现行有效地方党内法规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149部党内法规中,无题注法规72部,占比48%;有题注法规77部,占比52%,其中不完整题注法规29部,占比20%,完全题注法规48部,仅占总样本数量的32%。”^①从笔者通过公开途径检索到的地方党内法规来看,禹竹蕊、奉卓的研究成果是符合实际的,许多公开发布的地方党内法规题注确实不规范,有的只有标题,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发布日期都没有。由于实践中许多不属于党内法规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也以“规定”“办法”等命名,与党内法规没有区别,所以,若党内法规没有规范的题注,便很难通过文件名称判断其是否属于党内法规,不利提高党内法规的辨识度。

3. 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渠道不固定,没有标准文本

国家法律的公布方式和发布渠道均为法定,规范性程度较高,如地方性法规一般由人大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的方式予以公布,公布的渠道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规定党内法规的正式发布渠道为“党报党刊、重点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党的媒体”。实践中,地方党内法规一般会在当地的党报、政府公报和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发布,但发布渠道并不固定,也不统一。有的地方党内法规只在党报上发布,没有在政府公报或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也有的党内法规刚好相反,只在政府公报或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却没有在党报上发布。

国家法律均有“标准文本”,如“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文本”;但《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的“标准文本”问题则没有规定,实践中,许多地方党内法规经常会出现不同渠道发布的文本要素不完全统计的情况。如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5年6月27日联合印发的《云南省加强作风建设问责办法》,2015年7月6日的《云南日报》只公布了《云南省加强作风建设问责办法》标题及全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文本则还包括“关于印发《云南省加

^① 禹竹蕊、奉卓:《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实证研究——以149部党内法规为分析样本》,《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22页。

强作风建设问责办法》的通知”及通知全文内容。^①以上各种不同渠道发布的文本虽然实质内容没有区别，但形式上毕竟存在细节差异。不统一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文本的内容及要素，不利于地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规范化。

（二）党内法规公开程度不够，权威性和执行力不强

法作为调整人行为的规范，必须要公开才能发挥其规范功能，人不可能遵守其不知道的规范。因此，现代国家法必须向社会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到现行有效的所有国家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其作为规范党的领导活动和党的自身建设的规范，也应以公开为原则。《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也明确规定党内法规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外，都应该公开，即党内法规应以公开发布为原则，以不公开发布为例外。由于对哪些党内法规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以及哪类党内法规属于“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没有明确的规定与判断标准，从而导致实践中大量党内法规都没有公开，不利于提升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1. 地方党内法规公开比例不清楚，公开程度不够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2021年7月1日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收录了1949年10月至2021年6月出台的党内法规183部，其中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108部，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75部。^②而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的统计，截至2021年7月1日，党中央制定的中央党内法规211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163部。^③由此可见，如果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收录的党内法规数量为统计基准，则中央党内法规公开出版的比例为51.2%，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公开出版比例为45.5%。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公开程度虽然只有50%左右，但至少其公开的比例大致是清楚的。

相对于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各个地方的党内法规数量及公开程度均处于“黑箱状态”，难以进行准确评估。我们只能知道地方党内法规的总体数量：截至2022年6月，全国地方党内法规的总数量是3327部；^④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地方党内法规3385部^⑤；截至2024年6月，全国地方党内法规3485部，^⑥但各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多少部党内法规，各地均未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也没有公布，难以精确统计，只能大略估算：我国内地有32个地方党委拥有地方党内法规制定权，如果取平均数，截至2024年6月，每个省级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平均数量为100部左右。

由于各个省制定的党内法规数量没有公开，其公开比例自然也无法统计，只能从侧面进行一些粗略、不精确的估计。如2020浙江省委办公厅编的《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收录了

① 分别参见《云南日报》2014年7月8日第3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2014年第14期第26页；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yn.gov.cn/zwgk/zcwj/swwj/202104/t20210410_220112.html。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人民日报》2021年8月4日，第2版。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坚持依规治党，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纪检监察》2022年第19期，第16页。

⑤ 李永利：《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同共振效用》，《学习时报》2023年9月1日，第1版。

⑥ 陈文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年，第77页。

2013年至2019年底的党内法规共计36件;^①又如笔者曾通过公开渠道,在《云南日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检索到2012年1月—2022年12月31日的云南地方党内法规共计30余件。虽然不清楚浙江、云南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有多少件,无法确定公开的比例,但整体而言,公开的比例应该是不太高的——事实上,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资料,本身便反映了地方党内法规公开程度的不足。

2. 地方党内法规缺乏权威、固定的网络查询检索渠道

国家法的网上查询、检索渠道很多,既有官方背景“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也有很多民间的法律法规数据库,故而查询国家法非常便捷。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虽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党内法规数据库,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党纪法规》栏目收录了常见的中央党内法规,虽然也并不齐全,但毕竟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权威和固定的党内法规网络查询渠道。

相较而言,地方党内法规没有权威、固定的网络查询检索渠道。全国各省(市)级纪委监委官网虽然大都设立了《党纪法规》栏目,但此栏目的内容有的与中纪委监察网站的《党纪法规》栏目内容重复,或直接链接到中纪委网站的《党纪法规》页面,并不具备地方党内法规查询功能;有的省份如山东省纪委监委官网的《党纪法规》下虽然专设了《省内法规制度》一栏,但只公布了山东省的12份文件,而且2020年以后没有再更新过;^②新疆纪委监委官网《党纪法规》下也专设《疆内法规制度》一栏,但只公布了两份文件;^③有的省份如甘肃纪委监委官网《党纪法规》下虽然专设了《地方法规》栏目,也公布了一些地方党内法规,但没有对地方党内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进行区分。^④因此,各个地方的党内法规即使已经公开发布,也都是散见于党报、政府公报或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体,没有集中、权威和固定的检索查询渠道,查询起来极为不便,不利于党员干部的学习与贯彻执行。

3. 地方党内法规很少整理出版,不利于地方党内法规的普及

中央比较重视中央党内法规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局)、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会定期整理出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目前已经出到第六册,2024年3月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2017—2022)》收录了2017年10月至2022年10月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56部、中央纪委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27部。^⑤虽然此系列党内法规《选编》没有严格区分“党内法规”与“党内规范性文件”,除党内法规外,还同时收录了一些重要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但这是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的首次整理出版,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公开。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收录了1949年10月至2021年6月出台的党内法规183部,其中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108部,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75部,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收录中央党内法规最齐

^① 《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2013年5月至2019年12月印发的40部重要省委党内法规制度文件,其中最后4件不属于党内法规,因此是36件。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② 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 <https://www.sdjj.gov.cn/djfg/>, 2024年7月30日。

^③ 新疆纪委监委网站: <https://www.xjjw.gov.cn/list/511/1.html>, 2024年7月30日。

^④ 甘肃纪检监察网: <http://www.gsjw.gov.cn/category/dffg.html>, 2024年7月30日。

^⑤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的前四册(1978—1996、1996—2000、2000—2007、2007—2012)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共同编辑;最新的两册(2012—2017、2017—2022)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辑,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全的党内法规汇编，为党员干部学习及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除官方出版物外，还有许多学者自己整理的民间出版物，如《党员干部常用党内法规精解》（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新党员干部常用党内法规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高等院校重要党内法规学习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新农村重要党内法规学习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企事业单位重要党内法规学习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公检法系统重要党内法规学习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国有企业常用党内法规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行政机关重要党内法规学习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新常用党内法规（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等，种类非常丰富，而且还分行业和系统进行了整理，对党内法规的宣传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目前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均没有公开出版过本地的党内法规汇编或选编。据笔者检索，目前仅有江苏、浙江两省公开出版过本省党内法规选编：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法规和政法处于2015年编辑出版了《中共江苏省委党内法规选编》，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于2020年编辑出版了《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

官方编辑地方党内法规的出版物都很少，非官方的民间地方党内法规出版物更不可能有。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之所以会有民间编辑出版物，是因为中央党内法规已有官方的公开出版物，或者有相对固定的检索查询渠道，他们编选的都是已经公开的中央党内法规，内容不涉密，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整理特定类型的中央层面的党规进行出版，并不需要党内法规制定机关的批准。而地方党内法规的编辑出版却不完全一样，由于《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而地方党内法规公开程度不够，又没有官方的公开出版物，那些公开发布的地方党内法规虽然已经在地方党报、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内容显然不涉密，但要将其整理出版却仍有相当强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往往需要省级党委办公厅批准，而省级党委办公厅往往会因考虑各种因素而不愿出版本地的党内法规“汇编”或“选编”，从而导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地方党内法规公开出版物都很少，不便于党员干部学习。

三、规范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推动地方党内法规公开的建议

（一）规范地方党内法规发布，增强地方党内法规的识别度

一是要规范地方党内法规的发布形式。党内法规文件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形式应有所区别，而且哪类党内法规通过省委文件下发、哪类党内法规通过省委办公厅文件下发、哪类党内法规通过省委省政府联发文件下发、哪类党内法规通过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发文件下发应有相对明确的区分，逐步实现党内法规发布形式的固定化、类型化和制度化。

二是要规范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时标题题注的内容。标题题注应严格按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二十九条的规定，明确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发布日期”，以省委文件或省委省政府联发文件印发的党内法规应注明通过会议、通过时间和印发时间，如党内法规属于修订，还应注明修订历程；以省委办公厅或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发文件印发的党内法规，应注明审批时间、印发时间，如党内法规属于修订，同样应注明修订历程。

三是要规范地方党内法规的发布渠道与发布文本。地方党内法规发布时，应在党报、人民政

府公报和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同步发布，而且发布文本的内容、格式、要素应当完全一致。

（二）推动地方党内法规的整理出版

地方党内法规的主要内容，部分是对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落实，如《云南省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细则》（2014年3月）、云南的《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12月）、《浙江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细则》（2014年5月）、《浙江省贯彻〈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实施办法》（2016年5月）等；部分则是地方党委结合本地实际，就规范党的组织、领导、自身建设和监督保障活动作出的具体规定。地方党内法规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或自身建设，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推动地方党内法规的整理出版，以方便党员干部的学习和贯彻落实。

整理出版地方党内法规，面临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如何处理党内法规与党内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系。目前已公开出版的党内法规选编、汇编对党内规范性文件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不做严格区别，将党内规范性文件一并收录，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六册）与《中共江苏省委党内法规选编》，就一并收录了党内法规及党内规范性文件；另一种是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较严格的区分，原则上只收录党内法规，不收录党内规范性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只收录党内法规，《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原则上只收录党内法规（也收录了少量党内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为突出党内法规特色，整理出版地方党内法规选编、汇编应采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和《中共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类似立场，即原则上只收录地方党委制定或批准的属于党内法规的“规定”“办法”“规则”和“细则”，但考虑到部分党内规范性文件与党内法规的名称与效力均无本质差异，所以可根据其内容少量收录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密切的党内规范性文件。

整理出版地方党内法规面临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如何对地方党内法规进行分类和编排。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党内法规选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前三册（1978—1996）（1996—2000）（2000—2007）以党章的章节为分类标准进行编排，即将党内法规按照《党章》的章节顺序，分为党章、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和其他等十一部分；但第四册（2007—2012）对党内法规的分类方式作了重大调整，将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及相关法规制度、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机关工作七种类型进行编排，《江苏省委党内法规选编》的编排方式与此类似；《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2012—2017）（2017—2022）两册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都按照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4”的基本框架，将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及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版块；《浙江省委重要党内法规选编》则不作任何分类，直接以印发时间为顺序进行编排。笔者认为，“1+4”党内法规体系是党的文件明确规定的分类体系，如果编辑出版地方党内法规，原则上也应以此作为分类和编排的标准。

（三）尝试建立地方党内法规数据库，为地方党内法规的检索提供便利

党内法规的检索是否方便，对于党内法规的宣传普及，党员干部的学习、贯彻落实，对于推动地方党内法规规范化建设，对于提高地方党内法规的理论研究水平，进而提升地方党内法规的立规质量和立规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地可以考虑逐步建立地方的党内法规数据库，

为地方党内法规的检索提供便利。

建立统一的地方党内法规数据库，无论就技术还是成本而言，难度都不算太大。纪委监委是监督执纪的专责机关，地方党内法规的数据库完全可以整合到各省（市）纪委监委网站之中，在现有各地纪委监委网站上的《党纪法规》栏目进行优化即可：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中纪委监委网站上已经收录，地方纪委监委网站不必重复收录，而应该主要收录本地区的党内法规和重要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在分类上，由于地方党内法规只有“规定”“办法”“细则”“规则”四类，所以，可以参照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将《党纪法规》栏目分为“规定”“办法”“细则”“规则”和“规范性文件”五类，但不必设置现在中纪委国家监委《党纪法规》栏目之下的“国家法律法规”内容。

各地的党内法规数据库建立起来之后，再进一步可以考虑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牵头，建立全党统一的党内法规数据库，进一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规范化。

（四）对党内法规进行动态清理，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的秘密级别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一个重要区别便是国家法均为公开，而党内法规如涉及党和国家秘密或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的便不能公开。实践中，许多有关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的党内法规都是不公开的，如《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中的两部重要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都没有向社会公开的。为推进地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应严格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的党内法规清理工作，一方面要定期、动态清理哪些党内法规应修改、废止或宣布失效；另一方面还应明确地方党内法规的秘密级别，明确哪些党内法规可以全文公开，哪些党内法规可以公开标题但不能公开全文，哪些党内法规可以部分公开，哪些党内法规全部不能公开；对不宜公开的党内法规，还应进一步明确其是暂时不公开，还是长期不公开，如果是长期不公开，也要明确其解密时间和解密程序。经过清理程序之后，凡适合公开的，都应该及时公开。

结语

党内法规的发布似乎无关党内法规的实质内容，只是党内法规制定程序的一个具体技术细节，但对此“技术细节”不可忽视，因为所有党内法规的实施均须以发布为前置条件，如果党内法规发布不规范，党内法规便会与其他类型文件混同，党员干部就会像执行其他普通文件一样执行党内法规，不利于凸显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不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党内法规公开是党内法规发布的结果，也是管党治党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虽然某些特别领域的党内法规不适宜向社会公开，但不涉密的大多数地方党内法规都应该向全体党员公开，让党员更便于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纪律规定，从而不断提升地方管党治党的制度化水平。

责任编辑：马弋涵

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三维耦合性探究

余昊东, 余俊李

摘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三农”工作是强国建设的基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不仅需要科技投入, 更需要文化支撑。中华民族创造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 耕读文化是其重要魂脉, 其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家文化。研究发现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目标同向性、相同价值旨归、实践协同性三个维度的紧密耦合性。由此建议将弘扬耕读文化作为一种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相契合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守住乡村发展的“根”和“魂”, 通过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激发内生力量, 助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

关键词: 耕读文化; 乡村振兴; 耦合性; “三农”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4) 03-0106-10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农业强国, 就要抓好乡村振兴。耕读文化以“耕读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为核心, “耕”以立性命, “读”以立高德, 作为传承千年的乡村发展的“根”和“魂”, 探究弘扬耕读文化与推进乡村振兴的耦合, 有助于弘扬悠久传统文化, 推进乡村振兴。2013年1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 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耕读文化是中国特有乡村文化的体现, 是乡村振兴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耕读文化、乡村振兴释义

(一) 耕读文化概念、含义及历史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 农耕活动的提倡学派——农家出现。出生于楚国的许行, 深知国内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对抗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①, 并在此基础上承认工商活动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云南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典型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 余昊东,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教授, 《创造》杂志副主编, 云南省出版物审读专家, 云南省国学研究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余俊李, 浙江物产道富有限公司营运风控专员, 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与管理。

^① 《孟子批判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滕文公上》), 2018年12月18日,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713550>, 2024年9月12日。

的发展以及建议空闲之余不断学习, 著有《神农》等二十篇, 最终成立当时“九流十家”^①中的农家。农家主张“播百谷, 劝耕桑, 以足衣食”^②, 随后, “耕读传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成为华夏农业文明的渊源。

两汉时期, 耕读的方式不仅仅体现在民间的私立教育, 在皇族中也慢慢受到重视。汉高祖刘邦没有当上皇帝之前, 通过放牛之余的读书学习, 考取了泗水亭长, 说明也或多或少的受益于耕读文化。自此, 耕读文化对刘邦及其后续继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时期, 由于连年征战, 国库有不断亏空之迹, 于是汉武帝接连完善农耕制度, 并且他曾在上林苑试种由西部和北部地区引进的优良作物, 种植成功后推广到全国。读书上则实行“独尊儒术”, 设立了中央的太学和地方上的郡学等。汉文帝刘恒建立亲自耕田的制度, 亲自领人耕种, 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 经常给予他们赏赐, 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③。由此可见, 两汉时期, 耕读文化已不仅仅反映在平民百姓家中耕地、犁田、读书等活动中, 而是朝廷已经将耕读文化作为国家长期推行的文化策略。

耕读文化在汉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最终在唐宋时期趋于成熟。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 使得世袭制的门阀士族被逐渐瓦解,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读书的好处, “农”与“士”之间的阶层距离也被缩短,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成为唐宋时代许多平民弟子通过参加科举而入仕的真实写照。即使是那些没有考上的考生, 依然可以回到乡村, 过着半耕半读的田园生活。明清时期, 耕读文化在村社广泛传播, 宗法氏族又以派别形式形成了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明清小说中常见的乡绅, 有的是隐居乡间的名门儒士, 有的是科举落榜的平民学子, 有的是治学经验丰富的回乡老者。乡绅作为一个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典型群体, 其中的优秀者不仅是知识文化方面的先进分子, 也是道德文化的楷模, 更是耕读文化的躬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清末,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宗法氏族的逐渐隐退、“士”与“农”阶层矛盾的不断加深, 耕读文化出现了颠覆式的改变, 但是作为一个以农立国、以礼治国的国家, 耕读文化始终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更是根植于百姓生活“日用而不觉”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

(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政策及实践成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④, 乡村振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乡村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由此, 需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 发挥农村经济的潜力和优势,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升级, 支撑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人口持续增加, 农村人口减少, 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不足,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步凸显, 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三是乡村民

^① 汉·刘安《七略·诸子略》中把诸子思想分为十家, 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除掉小说家, 就称为九流。

^②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学说之农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2019年10月10日, https://www.sohu.com/a/345742672_120258451, 2024年9月12日。

^③ 乌兹科普院:《漫谈汉史: 汉文帝的农业政策》, 2018年11月13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986724006257083&wfr=spider&for=pc>, 2023年10月15日。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32页。

生问题、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需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的着眼点是以农村群众为中心，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乡村振兴提出了以下基本政策：一是加大包括农村水利、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二是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三是推进农村产业升级和创新。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培育新的产业和业态。四是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和职业教育。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人才流入农村地区，增加年轻人在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和职业教育。五是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保障农民权益。六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增强农民文化素质。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农村生态文明水平等。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经持续实施推进，总体成效显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党委政府大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改进和完善。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党委政府引导和推动农村产业向集约化、高效化、品牌化、生态化方向转变，不断打造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收入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党委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党委政府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使农村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但也应该看到，乡村振兴实施推进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短板、乡村产业结构仍需优化、农民收入增长还存在不平衡、农村社会治理仍有不足等。因此，需要继续加大乡村振兴力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二、弘扬耕读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的耦合维度

（一）目标维度：弘扬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目标同向性

弘扬耕读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乡村的繁荣、进步和发展。一是耕读文化强调耕种和读书的平等性和重要性，鼓励乡村居民不仅要重视农业技术，还应该不断读书学习。而乡村振兴的目的，也是通过发展农村生产技术和提升乡村人口知识文化水平来实现乡村区域的发展。二是耕读文化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倡导乡村区域应当保留和传承本土的优秀文化。乡村振兴同样强调保护和传承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通过优秀文化产业来释放更多经济活力，实现乡村经济的繁荣。三是耕读文化倡导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注重个人与乡村间的协同发展，通过“耕读”使个人不断进步，从而推动乡村整体在各方面不断发展。乡村振兴也强调构建和谐社区，增强乡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使乡村更加和谐温馨。可见，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在目标维度上具有同向性，都致力于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强调农业生产技能、教育知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及社区凝聚力等。弘扬耕读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维度相互耦合，通过传承和发扬耕读文化，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社会进步等目标。

(二) 价值维度: 弘扬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相同价值旨归

实施乡村振兴和弘扬耕读文化在价值层面都在强调应该传承乡村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适度地创新, 与时俱进, 让乡村生活更加繁荣与和谐。一是自古以来, 乡村居民更加重视的是农业的发展, 但是随着耕读文化的发展, 读书并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愈发成为重点。弘扬耕读文化, 不仅可以推动乡村居民通过学习在生活上获得更多保障, 更重要是可以让乡村居民懂得更多农业和减灾防灾知识, 既能推动农业的产出更上一层楼, 也能有效地减少灾害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农业产出和农民整体素质都得到提升。乡村振兴也要求农民巩固既有成果, 探索创新并不断增加知识技能,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创造力。二是耕读文化强调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和弘扬, 重视家庭、社区和乡村的和谐发展; 乡村振兴也注重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倡导乡村文化的多元发展。耕读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互利共赢, 强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也倡导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注重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 做到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两不误。三是耕读文化和乡村振兴提倡人人都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 乡村的发展不是哪一个人的事, 而是每一个人, 所有人的事, 从而助力相关公益事业或是助农活动的发展, 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提升。综上所述, 弘扬耕读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在价值维度上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价值追求和实践目的, 弘扬耕读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的价值维度相互耦合, 通过传承和弘扬耕读文化, 强化农村发展的文化价值, 尊重农村文化传统、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会让乡村变得更繁荣更和谐更文明。

(三) 实践维度: 弘扬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实践协同性

在实践维度上, 弘扬耕读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两者都有相同的场域, 在具体实践和操作中有相近的方法、相似的路径, 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弘扬耕读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都是在广袤乡村空间场域中, 致力于乡村繁荣, 建设农业强国, 不断提升乡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耕读, 重视“耕”与“读”的内在平衡、相互配合。若仅注重“耕”, 则乡村之中人人只为自己, 不注重合作和技术发展; 仅注重“读”, 则大家皆“纸上谈兵”, 不注重农业生产实践和产出, 幸福感和获得感将大大降低。一是耕读文化作为“耕”与“读”的结合, 注重培养农民的道德观念、文化认同和社会责任感, 倡导学习新兴技术, 推动乡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乡村振兴也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和新的农业技术一同发展, 一方面通过挖掘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文化繁荣, 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学习新技术, 在有限的土地中收获最多的成果, 推动乡村繁荣稳定。二是耕读文化和乡村振兴都强调社区参与和社会共治。耕读文化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 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 促进农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乡村振兴也注重社区的参与和民主治理, 通过建立村民委员会、社区议事会等机制, 实现乡村社会的民主管理和社会共治。由此可知, 耕读文化和乡村振兴在实践层面上具有较强协同性, 这种协同性体现了耕读文化和乡村振兴的共同关注点和实践路径, 弘扬耕读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实践维度相互耦合, 通过推动耕读文化教育和培养耕读人才, 如开展耕读文化活动、建设农村图书馆、提供职业培训等, 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文化保障。

三、弘扬耕读文化: 应对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 弘扬耕读文化, 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农业问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问题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粮食安全

问题。乡村地区是我国的主要粮食生产地，要研究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是生态安全问题。乡村地区的土地资源是我国的重要生态资源，要研究如何保护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破坏。三是产业现代化问题。农业产业是乡村地区的主导产业，要研究如何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1. 弘扬耕读文化，提升农民的粮食生产意识和生产技能，进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一头关联国家战略，一头紧系百姓生活。我国不仅是粮食自给率超95%的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国，还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2023年粮食进口量16196万吨，其中大豆9941万吨、玉米2713万吨、小麦1210万吨、大麦1132万吨、高粱521万吨^①。过去五年，我国大豆、玉米、小麦的进口额猛增至2倍到12倍不等，牛肉、猪肉、乳制品、水果类也增加了2倍至5倍。2023年7月，受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和厄尔尼诺事件引发的水稻减产影响，印度、阿联酋和俄罗斯等国颁布大米出口禁令，导致全球大米市场供应紧张、价格飙升。我国历年大米进口约300万到400万吨，2023年1至7月的大米进口大幅下降，只进口了191万吨^②。早在2021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③。耕读文化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和读书学习，要将弘扬耕读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确保产粮安全结合起来，引导农民扎根乡村种好田、产好粮，科技种粮，实现高产、稳产、优产。从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应对国际粮食安全，应在政策、措施上予以统筹考虑。在政策上，重点是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力的机制保障。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政策基础，抓政策引导，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抓责任落实，完成粮食种植面积，以责任落实推动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在措施上，重点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新农田，用现代化农业设施来保障粮食安全；强化科技装备支撑，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聚焦提高单产，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

2. 弘扬耕读文化，提升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技能，促进解决生态安全问题。2022年6月，《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指出：近80%的被访者认为农村地区生活用水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且中部地区生活用水污染严重或较严重的比例较高，为24.48%；农村污水治理效果待提高，只有约40%的村民认为水体干净；生活污水排放较为分散，村里实现集中收集的仅占约10%；66.85%的被访者表示还未充分认识到废弃农膜对土壤的污染和危害；部分村民反馈禽畜养殖粪污产生较大环境影响；西部地区10.71%的村民反馈没有统一垃圾堆放点^④。解决这些生态安全问题，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坚持“从世界看源头”的哲学智慧，从耕读文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追求“天人合一”中寻求方法，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中汲取和谐共

① 国家海关总署数据：@程国强观察，2024年1月22日，<https://weibo.com/1096527161/ND4Aj61Uq>，2024年9月8日。

② 《多国限制大米出口，会影响我国“米袋子”安全吗？》，2023年2月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6644207274907364&wfr=spider&for=pc>，2023年10月15日。

③ 习近平：《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2022年10月13日，<http://www.dangjian.com/>，2023年10月15日。

④ 民生智库：《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调研报告》全文发布，2022年6月5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8433052，2023年10月15日。

生、敬畏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提高农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意识,把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规律,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技术,进而保护好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证乡村地区的生态安全。一要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广清洁能源,加强环保宣传,引导农民树立环保意识,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二要加强生态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产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三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促进城乡就业,推动城乡资源统筹利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四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3. 弘扬耕读文化,提升农民的创新意识,提高农民的创新技能,进而解决产业现代化问题。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没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不宽,文化活动很难开展起来”^①。如何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如何打造乡村振兴新业态?梁漱溟先生曾指出:“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本身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②。这种生机活力就是农民的创新意识,吸收外边的养料就是学习创新技术,而这种创新意识和创新技术的“根”和“魂”就是耕读文化。《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③,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耕读文化本身就是承载传统农业生产技艺、生态和循环农业发展理念、乡村互助生活经验等功能的复合体,能够充分展现乡村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文明生活、教化人心等方面的优势,符合新时代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同时,耕读文化的兼容度较强,能较好地融入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旅居养老等美丽乡村新形态、新业态中,通过器物展示、体验感受、观光采摘、研学教育等产业融合、手段创新^⑤,为推动农业产业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抓手与实践载体。一要在发挥地方优势的“土特产”上下功夫。“土”就是开发乡土资源,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等。“特”就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跳出本地看本地,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产”就是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形成一定规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二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转变,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在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中,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⑥。

(二) 弘扬耕读文化,推动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问题,推进农村现代化

当前乡村振兴中农村存在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从不同视角可以发现不同问题,就影响城乡

①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5984024477299980&wfr=spider&for=pc>,2023年10月15日。

②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6—618页。

③ 《中国的“耕读文化”》,2023年6月17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5953190001_162d6787106601_oexm.html,2024年8月9日。

④ 《中国的“耕读文化”》,2023年6月17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5953190001_162d6787106601_oexm.html,2024年8月9日。

⑤ 李俏、成威:《乡村振兴背景下耕读文化的活化开发与实践创新》,《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34—142页。

⑥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第6页。

同步繁荣难题而言，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口外流、文化凋零、文明散失、治理滞后等方面。

1. 弘扬耕读文化，推动解决人口外流问题，做好产业留人文章。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农村人口逐渐减少。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据此推算，农村户籍人口约4.7亿。据统计，外出农民工17658万人。对比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时，2017年末全国人口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六年来全国人口增加0.2亿，城镇常住人口增加1.1亿，农村户籍人口约减少0.9亿。农村户籍人口减少数，近似农村人口外流量，2017年留在农村的农民为3亿，如今留在农村的农民只剩约2亿。这说明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六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国广大农村仍有1亿多人口流失，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劳力的流失，有的村庄除了老人，所剩无几。弘扬耕读文化，留住人口，一方面要整合农村发展空间，产业兴，百事兴，要树立大农业理念、开发大市场、发挥大生态、构建大网络联通，不但让农民在物质经济和精神陶冶上“双丰收”，也要让到乡村的人得到与在城市里不一样的“双丰收”。只有这样，才能在稳住农村户籍人口的同时，吸引外出人口回流农村。另一方面，要想办法让农民有职业农民的责任感、光荣感，把握现代人对农业的功能要求不再满足于提供吃饱喝足穿暖的原料，更需要一些文化体验、休闲娱乐、教育科普、健康养生等生态文化功能，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商业、休闲旅游、康养、文化、教育”，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到全产业链增值的物质收益和精神富足。

2. 弘扬耕读文化，拒绝文化凋零、文明散失，做好兴文化的文章。乡村社会为现代化城市的繁荣贡献了富足的物质资料和智力支援。但在与城市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农村的被动与相对劣势仍在扩大。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导致文化的边缘化，使乡村文化本身出现虚化。二是经济实力成为乡村场域话语权决定因素，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有经济实力的外出打工年轻人却远离乡村生活，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乡村文化秩序建设弱化导致乡村文化凋零。三是乡村社会在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逐渐从乡村消失，乃至绝迹^①，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已经或者正在全然丧失，乡村现代文明缺乏基础，完全沦为城市文明的附庸，导致乡村文明散失。《大学》中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②何谓“道”呢？群经之首，中华文化典籍《易经》揭示“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跟二是分不开的。解决乡村文化、文明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些农耕文化中汲取智慧，认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科学解围“城乡”二元结构，在顶层设计和具体社会发展中统筹推进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在资本投入、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两翼齐飞”，实现乡村与城镇互补循环发展。二要大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补齐乡村短板，提高教育、医疗卫生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让乡村人才留得住，外面人才进得来，振兴文化有条件。三要落实“切实保护好优秀

^① 刘铁芳：《乡村文化的缺失与反思》，《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1年第1期，第57—58页。

^② 《大学》中的智慧，2019年10月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6876180604661564&wfr=spider&for=pc>，2024年8月9日。

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①的要求，鼓励走出乡村的贤达回归故里兴建书院、举办学堂、传播文化，共同塑造诚实守信、尊老爱幼、救危扶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四要支持和鼓励城镇居民到农村干事创业，或开展文旅消费活动，使城市人与乡村人和谐相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互鉴融合。五要把耕读文化嵌入现代教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开展契合其身心特点的耕读文化教育，让耕读理念进入校园、进入课堂、进入食堂、进入学生头脑，使学生自觉涵养勤俭节约的习惯和品行，激励他们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六要在农村推广读书，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以此改善农村的文化环境，防止文化的凋零和文明的散失。

3. 弘扬耕读文化，推动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做好和美乡村的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②。对标“和美”，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治理体系还不完善，农村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薄弱，社区组织的建设和运行不够规范，导致社区治理能力相对较低。二是缺少有效治理机制，农村社会治理中缺乏多元参与和有效监督的机制。三是社会服务不足，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设施相对不足，服务质量和覆盖范围有限。耕读文化崇尚“和”的理念，农业生产讲求得时之和、适地之宜，农村生活讲求人心和善、以和为贵，村落民居讲求顺应山水、和于四时。在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问题上，要把“和”的理念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一要传承和弘扬忠孝文化，推进忠孝文化发展与社会治理实现有机结合，传承转化、创新发展“天地国亲师”传统文化逻辑，为构建和美乡村治理逻辑体系供给文化资源。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打造“忠孝”模范家庭，用老百姓身边的“忠孝”模范典型带动村民、鼓励村民构建以和谐稳定的家庭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秩序，推广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二要传承耕读传统，培育文明乡风。一方面要坚持传承和发展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公序良俗，另一方面也要坚决抵制和摒弃含有文化糟粕的不良风俗。从农民需要出发，从农民喜好着手，增加富有农耕农趣农味、体现和谐和顺和美的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③。开展乡村科普、政策宣传和移风易俗，培育法治文化，建立农村图书馆，开展农村读书活动，繁荣群众性精神文化生活。三要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促进自治、德治、法治、数治“四治”有机结合。建立有效治理机制的基础，用好改革这个法宝，整合农村资源要素，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金，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切实保障民生福祉。创新村民议事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格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孝亲敬老活动，营造文明和谐乡村氛围。激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三）弘扬耕读文化，推动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农民问题，推进农民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包含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在这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2月4日，<http://www.news.cn/>，2023年10月15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025/c64094-32551583.html>，2023年10月15日。

^③ 朱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3年3月5日，<https://cfnews.org.cn/newsinfo/5559004.html>，2024年7月20日。

其中,农民问题无疑是最为重要且最为复杂的一环。农民是乡村振兴中主体,解决农民发展问题应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造就其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能力,这是决定乡村振兴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传统耕读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倡导亲自耕作和诵读经典,主张劳动与学习的统一,这为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方案。

1. 以耕读文化为“根”,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农民是劳动与学习的主体。他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诵读经典,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新时代弘扬耕读文化,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就要办好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用丰富的农耕文化教育农民,培养新时代农民传承“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等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切实提高农民传统文化素养。

2. 以耕读文化为“本”,推动解决农民培训问题,推进农民职业化。在农村地区,农民往往缺乏必要的培训,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新的农业技术和市场经济时,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耕读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耕读文化倡导的是劳动与学习的统一,也就是说,农民在从事耕作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包括经典的诵读,也包括新的农业技术的学习。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迫切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擘画了“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蓝图。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培育高素质农民,组织参加技能评价、学历教育,设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技能大赛”^①。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②,为开展农民职业化培训提供了相关政策支持。从农民培训实践来看,现行培训仍处于“大水漫灌”粗放型培训阶段,培训目标泛化、培训内容错位、培训绩效难以有效评估,教育培训后难以与职业有效对接。我们要弘扬农耕文化“精耕细作”的精髓,在标准化、精准化、实用化上下功夫,从现代农业产业的高素质需求入手,系统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政策体系、课程体系,制定农民分层分类的职业标准,开展规范化教育培训。农民职业化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由非专业化向专业化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也是农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职业精神的提升过程,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 以耕读文化为“术”,推动解决农民科技问题,推进农民现代化。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密切相关。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力支撑。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我国历来重视农民科技素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③,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意人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年2月21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2023年10月15日。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2月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2023年10月15日。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2月2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2023年10月15日。

才培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①；江泽民同志指出：“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学习先进实用的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技术”^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③我们要弘扬耕读文化，重视农业技术及发明渊源，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有创新精神、掌握专业化规模生产技术和能力，能从事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一要着力对农民进行农业产生的新知识、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二要着力对农民进行农业环境保护、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安全等知识培训，提高农民的环保和食品安全意识。三要着力对农民进行经营、管理、贸易、市场、贸易知识和能力培训，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要着力帮助农民进行信息收集和应用，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五要着力提高农民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提高农民转岗就业的能力。六要着力对农民进行智慧农业培训，切实提高农民科技水平，激发主体科技创新活力。

结语

弘扬耕读文化基于文化传承，必须立足过去、行向未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逐渐减少，使传统耕读文化出现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遗忘的现象。同时，随着科技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也给传统的耕读文化带来冲击。乡村振兴借助耕读文化力量来推动，而耕读文化也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来传承和发展。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必将为我们建设农业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13年10月25日，<https://news.12371.cn/2013/10/25/ARTI1382683138697197.shtml>，2023年10月15日。

② 江泽民：《必须提高中国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1999年12月29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1999-12-29/26/13800.html>，2023年10月15日。

③ 《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吉林考察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人民日报》2020年7月26日，第1版。

“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观点综述

李亚强，罗雷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战各领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不断得到彰显。党在统一战线领域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需要通过多维度的宣传，更好地为大众所了解，这也对社会主义学院刊物做好宣传阐释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做好此项工作，2024年7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了“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围绕社会主义学院刊物的发展定位、特色栏目打造、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提升编校质量等内容进行研讨交流，在统战特色期刊打造、统战特色栏目形塑、数字化期刊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学院刊物；宣传阐释；专家论证会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3-0116-05

2024年7月19日，云南社院在昆明举办“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社院、重庆社院、贵州社院、广州社院等社院理论刊物负责人，省委党校校刊部、《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思想战线》《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大理大学学报》等省内理论刊物编辑部的专家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与会专家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精神，聚焦期刊繁荣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提升学术品位、形塑特色期刊方面分享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

一、明晰的办刊定位是办好刊物的先导条件

与会专家认为，建设好刊物首先应明确其发展定位，高校一般将其所办的刊物划分为社会科

作者简介：李亚强，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云南省党建研究会机关党建研究专委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罗雷，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社科期刊建设。

注：文中所列专家观点整理和提炼自“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交流发言资料。

学版、自然科学版等版本，突出了办刊的学科分类和学术性定位；一些科研院所主办的刊物更多的体现在其研究的专业领域方面，专业定位明晰，主要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其办刊定位应突出政治性、统战性。

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朱虹认为，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对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地位、作用、功能做了精准概括，明确提出“社院姓社”；2018年底，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各省市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的贯彻落实措施，其中都对办好社院理论刊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政治性是社院办刊的本质属性，要把正确的政治导向放在首位，落实好以学术讲政治的工作要求。要着重处理好学术性、思想性、阐释性三个方面的关系，让社院刊物围绕国家重大关切刊发具有思想性、引领性的文章，精准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更好服务共识教育，更好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始终坚持正确思想引领。省委办公厅《云南通讯》编辑部主编顾伟认为，就刊物定位来看，社会主义学院所办的刊物属于党报党刊的范畴，是党在统战领域的理论喉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首要要求，突出的政治性是刊物建设的第一要务。编辑人员应自觉加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常态化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常态化学习，不断厚植自身的理论素养，提高甄别文稿中不正确观点、立场的能力水平，加大对政治类表述、政治类固定搭配的审核把关力度，加大对文稿中数据类文献的审核，从讲政治的高度编审好每一篇文稿，不断提升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作用。

要始终守牢宣传主阵地。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二级调研员尹云从期刊主管部门的角度对做好刊物建设提出三点工作建议：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传承和发扬好“政治家办报”的精神，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精神等内容，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办刊办报；二是要紧扣政策导向，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效能，要紧跟中央决策部署，做好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要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法规的学习，依法依规办刊；三是要加强沟通交流，完善体制机制，要加强同上级主管部门、省内外期刊同行的联系交流，及时沟通解决办刊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堵塞、消除因编辑部门体制机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宣传主阵地。

二、鲜明的办刊特色是办好刊物的立刊之本

与会专家认为，刊物建设要彰显特色，特色刊名、特色栏目、特色装帧设计、特色读者群体等等，都会增加刊物的吸引力、扩大刊物的影响力。社会主义学院的统战特性决定了社院所办刊物应将鲜明的统战特色作为其立刊、强刊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做到开门办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朱虹认为，办好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刊物要树立“大统战”思维，充分发挥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将统战特色和区域特色结合起来，做到开门办刊、特色强刊。要加强同统战系统各部门各领域、全国社院系统同仁、培训学员、期刊评价单位等的联系沟通，主动借鉴吸收优秀办刊经验，逐步建立起具有统战特色的优质作者群，加快推进期刊数字化建设，更好服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培主责主业，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徐映奇认为，办好社院刊物应树立强烈的统战问题意识，刊用文稿的大方向要聚焦和回应统战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致力于把刊物打造成展示统战理论与实践问题最新研究成果的集

散地。要发挥好统一战线智库功能，健全完善专家库，通过设置智库课题，引导专家进行更有统战针对性的研究，并在社院刊物上做好研究成果的吸收转化。

要整合学科力量。《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龚静阳认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策略手段已经历了180多年的历史。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时至今日，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开展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加快了统一战线学科的建设步伐，这为社院搞好刊物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另外，统一战线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有交叉关系，这也意味着各有关学科的力量都可以被整合到统一战线学学科中，既为开展好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带来了丰富多元的视角、提供多样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论，也为社院刊物找到创新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要加强选题策划。《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社会主义论坛》杂志主编、《融媒时代》执行主编刘祥元认为，期刊建设应与时代发展合拍、做到同频共振，要在做好期刊选题策划方面投入更多精力。2022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三个更加重要”，提出了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个必须”，这些创新理论都需要我们做好研究阐释宣传。社院刊物应紧扣时代主题，回应好统一战线领域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要结合中央和省委年度工作重点、热点做好年度主题策划，根据不同时间节点设置分专题，如做好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等重大主题的宣传。《思想战线》·文科学报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副教授张磊认为，好的选题策划是刊物建设获得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社院学报作为政治性、统战性专业期刊，尤其要注重抓好党的主题宣传策划，要发挥好党报党刊的思想引领、价值导向作用，把握好宣传主动权、主导权，阐释好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以文为媒，不断增进全体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要打造优势栏目。省委统战部宣传处二级调研员周先义认为，《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省委《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社院理论刊物在栏目设置上做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华文化”等，具体栏目打造应聚焦《条例》和《实施细则》进行设置，重点刊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文章，特别是做好对该思想统战篇的研究阐释文章的刊发工作。《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教授徐绍华认为，特色优势栏目是打造一流刊物的重要抓手，不同类别的刊物，特别是处于该领域头部位置的优质期刊，其栏目特色是非常突出的。就社院刊物来看，突出统战特色、中华文化特色是打造优势栏目的有效途径，通过对统战主题的凝练，形成2到3个特色栏目，将其打造为反映统战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名片、科研窗口、显示平台是大有可为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沙丽娜认为，社院系统刊物是哲学社会科学系统刊物门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统战色彩具有独树一帜的鲜明特性，在栏目打造上，要做到“两个突出”，即做到突出统战性和突出地方特色，可根据不同地区省情统情的特殊性，设置相应的特色栏目，实现从“特”到“优”“专”“精”的转变。

三、专业的编辑团队是办好刊物的重要保证

与会专家认为，如何从丰富多样的来稿中遴选出观点正确、导向鲜明、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行文流畅、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稿件考察的是编辑的专业和学术眼光，如何对所遴选出的稿件进行深加工、精加工，使发表出来的文章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则是对编辑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社会主义学院办好刊物一定要加大对高素质专业编辑队伍的培养，使其练就审稿的“火眼金睛”、编校的“妙笔生花”等过硬本领。

要涵养编辑情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审杨恬认为，不能把编辑工作简单视为对文稿或文字进行审核、校对、修改，编辑工作的范围和内容是很宽泛的，就期刊工作而言，编辑的案头工作只是整个工作流程的一个环节，一个好的编辑不光要具备精深的专业功底、独到的选稿眼光，同时也应具备高超的沟通技巧和娴熟的表达能力。要培养和提升自己的职业敏感，以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对待编辑工作，着力培树好编辑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沙丽娜认为，做好编辑工作，不仅是手、眼、脑的投入，还要沁入心、腿、情，是全身心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编辑出有感情有深度有温度的精品，才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才能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龚静阳认为，期刊编辑、图书编辑、美术编辑等的工作重点不是简单的文稿、图像加工等，而是倾注自身学术修养、理论修养、人格情怀等内核的具有创造性、创新性的工作，这就对做好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提升编辑能力。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二级调研员尹云认为，从期刊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期刊的编校质量。通过对期刊内容的审核，可以对期刊的办刊质量有一个较为直观的判断。作为期刊编辑，特别是政治类期刊编辑，不仅要学习编辑专业知识，提升技术水平，更要及时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内容，切实提高自身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朱虹认为，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能力，是所有办刊人的共有心声，社会主义学院刊物的编辑要着重提升好“三种能力”，即政治把握能力（守好阵地）、理论修养能力（厚植内涵）、学习新技术能力（自我革新）；同时，要把握好统战类概念的边界，做到精准使用、科学阐释。《思想战线》·文科学报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副教授张磊认为，期刊编辑要把握好“三个关键”，即要严守政治红线，做到导向正确；要严守学术品质，注重稿件的学理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要严把编校质量，精编精校，提升稿件可读性。

要加强对外交流。《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徐映奇认为，编辑工作不是“闭门造车”，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期刊编辑要经常走出去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活动，与学术界保持常态化互动交流，及时了解所办刊物领域学术动态、学术前沿问题、学术领军人物，在联谊交友的同时达到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目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校刊部副主任万泳延认为，刊物建设应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服务教学科研的关系，刊物在坚持正确思想引领的前提下，做到内、外部双轮驱动，主动关注服务本领域专家学者，加强常态化交流，及时反映吸纳本领域内前沿研究的稿件，建立高端人才约稿库、青年学者储备库，为刊物遴选、刊用优质稿件提供“源头活水”，从而不断提升刊物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教授徐绍华认为，编辑人员是刊物建设的直接责任主体，是联系主管主办单位、作者群、读者群的桥梁纽带，要找准刊物建设的发展定位、明确自身的作用功能，不断扩大积聚在刊物周围的作者群、读者群规模，在办好刊物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四、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是刊物长效发展助推器

与会专家认为，时代发展对期刊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原有的办刊方式难以适应和满足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秉持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是推动刊物长效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运用新的编校手段降低差错。《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方飒认为，在每年开展的期刊年度核验、中宣部重点期刊抽检等工作中都将刊物的编校差错率作为一项重要的检验指标，是各类刊物同台竞技中较为直观的质量检测标准，是对期刊编辑部全体编辑基础业务能力的直接检验。近年来，为降低差错率，业内同行在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的基础上，有些已经将审校次数增加到“五审五校”，甚至更多，这其中就大量使用了如“黑马校对”“方正审校系统”等技术手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的校对技术手段虽然无法完全代替编辑校对，但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编辑部可以将其作为传统审校方式之外的有效补充，使编辑人员的精力可以更多地从繁复的文字审校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对文稿的创造性加工中，为提升刊物质量夯实基础。

要引入新的技术手段提升效能。《大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李明认为，21世纪以来，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革命深化拓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ChatGPT、Claude、文心一言、New Bing等智能工具在写作、图像生成等领域广泛使用，给期刊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期刊编辑可以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对文稿进行分析、加工、比对，特别是智能采编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编辑所编审的稿件中开始出现由作者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稿件，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工具功能的日益完善，此类稿件的数量会不断增长，且难以识别。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校刊部副主任万泳延认为，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平台为期刊提供了日益多元的服务，如论文智能排版、智能审校系统、AI编辑助手、个刊统计、期刊评价等等，这些针对期刊的个性化功能，为期刊有针对性地补短板、提质效提供有益帮助。

要使用新的融媒手段扩大影响。《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社会主义论坛》杂志主编、《融媒时代》执行主编刘祥元认为，当今时代是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提高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不仅要靠传统的宣传手段，更要注重发挥融合传播的作用，即在传统纸媒的基础上，链接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平台形成融媒传播矩阵，通过对优质稿件的二次加工编辑进行主要观点、核心要义等方面内容的轻量化传播，最大限度提高刊物优质稿件的社会面传播效率，做到“刊未至，文已远”。《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龚静阳认为，在融媒体平台上做“二次呈现”的精品文稿要做全面的策划包装，使观点更加凝练鲜明、逻辑结构更加清晰完备，在增加学术文章的可读性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延长文章的关注度，不断扩大和提升刊物影响力。

与会专家认为，新时代新征程对刊物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作为期刊人要自觉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常态化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精神，加强对本领域政策法规的常态化学习，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为守好党的宣传阵地、讲好中国故事贡献积极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上接封二)

情况、三个月间学校的办学状况和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不凡经历，乃至国共两党在长沙临大动员广大师生投身抗战的活动。同时，又更为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完成三个月办学后，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光辉夺目的文化长征史。

日文书名中的“长征”一词，源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播迁征战，更源于《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这一句词。因而，这本书所谓“长征”，广义上指从平津迁长沙，再迁云南的这一段艰难困苦的万里征程；狭义上，当然就指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三千五百里的步行小长征，亦即这一著作重点介绍的湘黔滇旅行团的伟大壮举。所以，这部著作，既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史，更堪称湘黔滇旅行团的文化长征史、教育长征史。

在这本书中，楠原教授在搜罗了中日两国印行的大量原版历史文献后，将长沙临时大学，尤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娓娓道来。这增进了日本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真相的了解，也从高等教育的视野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力量。

内迁高校复员后，海内外产生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西南联大主题作品。图书方面，最早出版的是联大外籍教授罗伯特·白英（Payne Robert）的《中国日记》（Chinese Diaries: 1941-1946），不过这本日记集至今没有中文全译本。已经译毕出版的著作中，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的《革命战争中的西南联大》（Lian 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该著作的英文版是1999年出版的。而楠原教授所著这本的日文版，则出版于1997年2月28日，实际上是第一部在海外出版的西南联大研究专著，更是第一部研究湘黔滇旅行团的专书。

楠原教授是从研究鲁迅、闻一多、韦君宜等中国作家进入西南联大研究的。韦君宜曾在长沙与临大师生有过密切接触并在那里聆听过演讲，鲁迅的几位好友（如杨振声、章廷谦、郑婴等）则到了西南联大，闻一多更是联大学生心中大师级的名教授。因此，她的这部译著，是在钦佩这样一批中国文化人的心绪中，怀着景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的心情完成的。她的写作，凝重、沉着、朴素、理性，同时也充盈着对西南联大真情的礼赞。

楠原教授的这本书出版十年后，2007年10月，我刚从大学毕业，在等待正式就业的间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麻研究员从北京寄来了这部著作的日文签名本。那时我关注西南联大已经有好几年，有关湘黔滇旅行团的图书，已购置过《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和《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纪实》（摄影集，云南师范大学印，2001）。更早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也在几年后从旧书网站得以猎获。

程麻先生寄来的这本书，本来只是借我一阅的。不久，楠原教授大概知道我对此书有浓厚兴趣，遂又从日本寄给程麻先生一本，他也就顺手以借改赠。从那时起，在程麻先生的鼓动下，我就开始着手找寻合适的翻译者，以期将这位日本学者的西南联大研究著作译为中文版，尽早尽好地嘉惠学林。

六年后，我从母校云南民族中学调入另一所母校——西南联大遗产的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开始专心为西南联大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工作。在这里，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人，几年的同事经历，使我们相互了解，彼此欣赏，合作无间。我由此又得识愿为这部译著无私付出的几位同人。于是，在程麻先生搭桥帮助下，取得了楠原教授的授权，并由卢连涛领衔与尤伟琼教授合作，开始了这部书的译述工作。

现在，经过他们的辛勤劳作，加以谢锋、蒋晓涵等同人好友的全力协助和张力山等师友的助力，尤其是本书责任编辑胡晓凯女士的热情张罗，这本译著就要付梓了。作为这部著作中文版译事工作的发起者之一，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在这里，要由衷地感谢作者，创作出这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架构；要感谢“媒人”程先生，是他作伐把这一佳作从日本迎到中国来；要感谢译者忠于原著的精到翻译，他们几年来不懈努力终有今日；要感谢编辑，连续数月的精心烹制成就了这本经近三十年时光考验的好书。

最后，要郑重感谢商务印书馆。在楠原教授这部著作的日文版出版前，有关湘黔滇旅行团的两部书，以及反映长沙临大海路迁滇情形的《滇越游记》（胡嘉著，1939），最先都是在这里出版的。现在，湘黔滇旅行团的第一部研究译著也在这一平台问世，这不唯是历史的巧合，更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担当和文化魅力。

本文在图书正式出版序言时有删改。

作者简介：龙美光，云南师范大学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理事。著有《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责任编辑：念兴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YUNNAN SHEHUI ZHUYI XUEYUAN XUEBAO
(季刊, 1999年创刊)
2024年9月 第3期(总第103期) 第26卷

主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 650031
联系电话: 0871-68091598
电子邮箱: ynsyxbjb@163.com
出版日期: 2024年9月20日

定 价: 9.00元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No.3 (Sum.103) Vol.26 Sept. 2024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Tel: (0871)68091598
E-mail: ynsyxbjb@163.com
Published: Sept. 20, 2024